
名帅之死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内幕
家琦　智涛编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名帅之死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内幕

家琦 智涛 编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名 帅 之 死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内幕

家琦　智涛编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燕宁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24千字　2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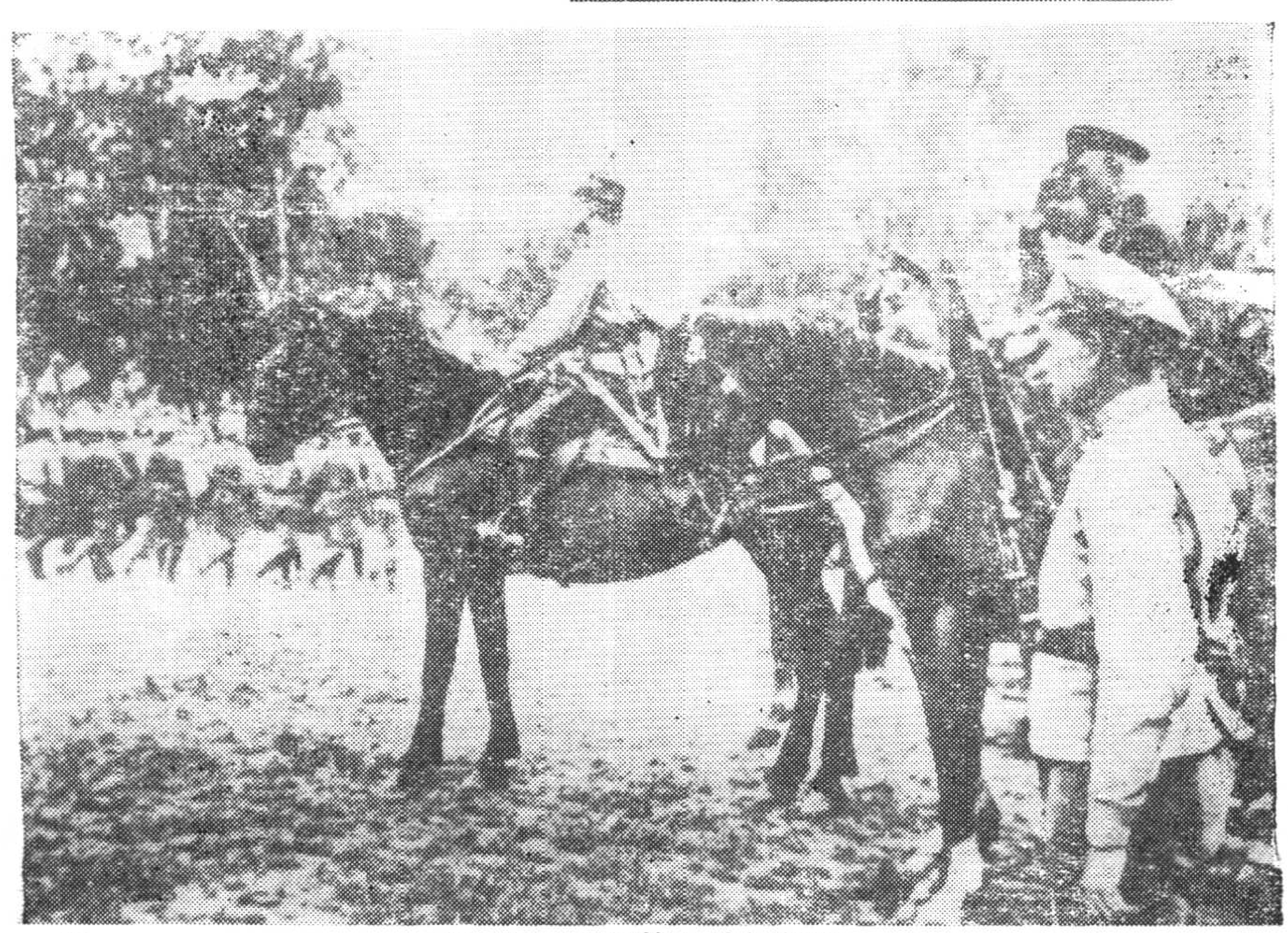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册　　定价：1.90元

ISBN 7-5043-0178-7/D·33

①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夫人尼娜·叶夫尼耶夫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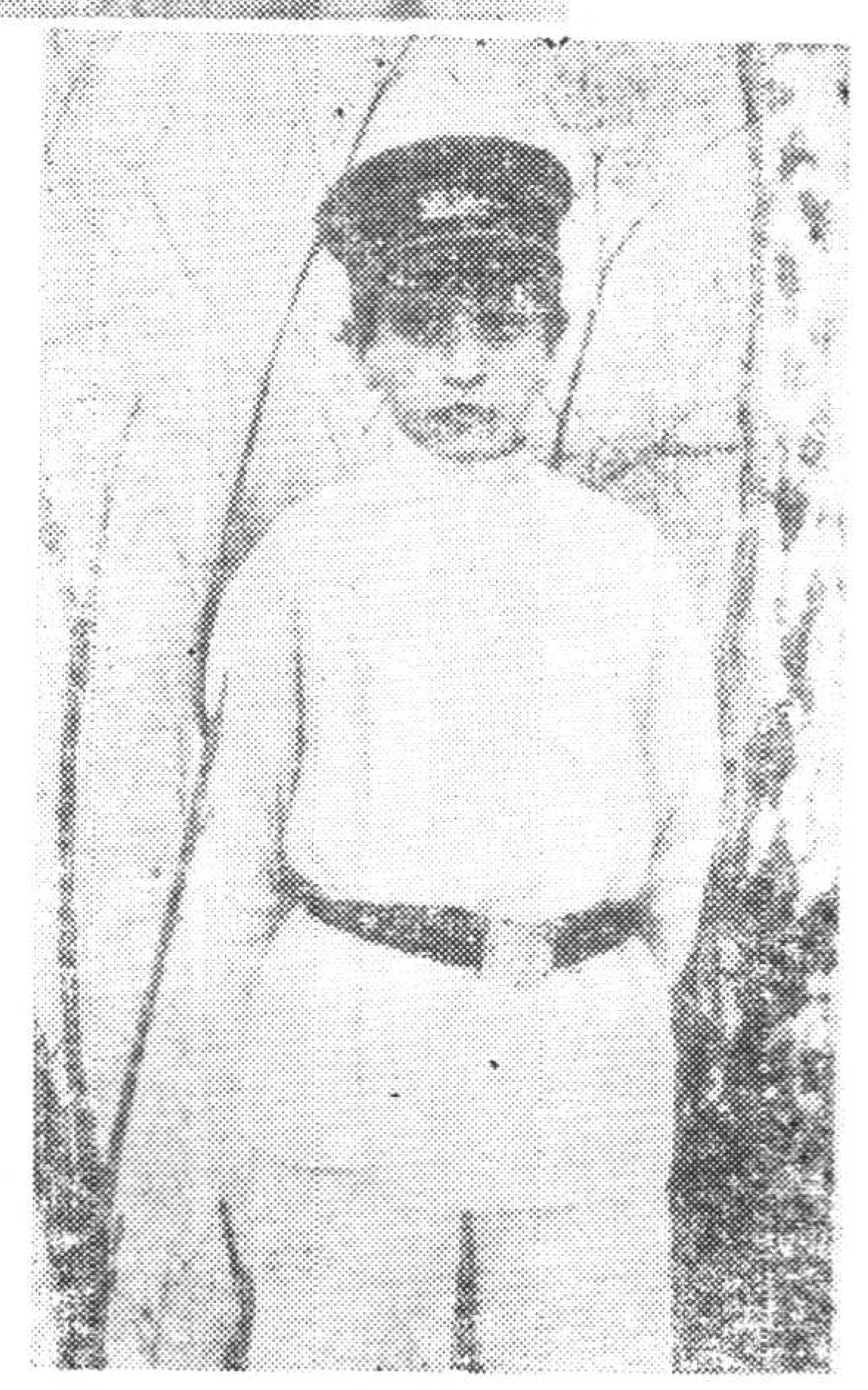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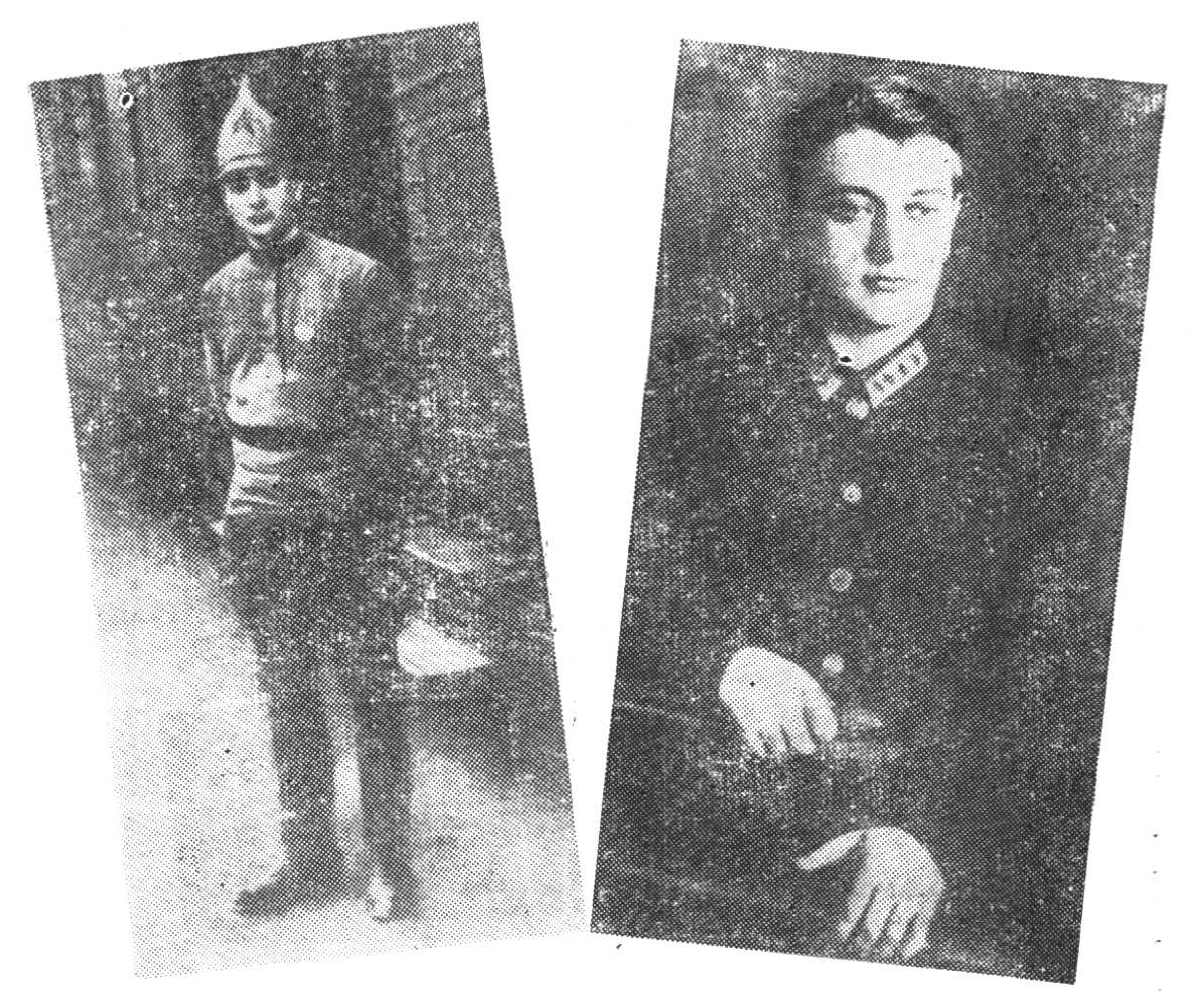
②图哈切夫斯基在检阅部队



③图哈切夫斯基之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④图哈切夫斯基少年时代。



⑤1920年任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的图哈切夫斯基。

⑥30年代初的图哈切夫斯基。



⑦图哈切夫斯基1935年11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时留影



⑧图哈切夫斯基与基洛夫（右二）



⑨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赴英国途中在法国车站时摄

目　录

附件：

引　子

1937年6月11日清晨，苏联新闻通讯社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苏联元帅、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M·H·图哈切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此同案，还逮捕了七名高级将领。他们是：乌克兰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鲍烈维奇；军区副司令B·M·帕里曼科夫；军事学院院长A·И·科尔克；总干部部长Б·M·费里德曼以及航空化学救援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长P·П·埃捷曼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B·K·普特纳。这些人都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同党”，一并被处决。同时还宣布，与此同案的被告总政治部主任Я·Б·戈马尔尼科“畏罪自杀”。当时，斯大林委派苏联元帅布留赫尔为执法队长（不久后，即被斯大林处决），未经公开审判，就将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秘密枪决。据苏联有关材料揭发，在枪决前，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使用了各种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用尖刀挖掉眼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担任秘密审讯检察长的是苏联安全部门御用的法官维辛斯基（1958年因脑溢血突然发作，死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谈判桌上）；担任审讯的是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

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揭露，这个特大冤案是斯大林利用希特勒提供的材料精心策划的，在第一线积极

贯彻斯大林意图的，就是经斯大林一手提拔重用的安全部头子叶若夫(事后也被斯大林秘密处决)。

据秘密报告揭露：在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后一个月，即在1936年9月25日停止审理布哈林分子案件之后两周，政治局委员们收到一封正在索契休息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发来的电报，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大规模地展开清洗，必须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以取代雅哥达。电文说：

“我们认为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显然已证明自己完全无力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方面已落后四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急不可待的心情。在疗养圣地——黑海之滨他并没有休息，却一直为筹划这次大清洗，而四处调兵遣将，整顿阵容。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里主持工作的几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安德烈耶夫，根据斯大林的密电，立即任命了叶若夫，免去了雅哥达的职务，同时撤销了李可夫的苏联邮电人民委员职务。失宠的雅哥达接替了李可夫，被放到了非要害的岗位。当时被人们称作“叶若夫旋风”的大清洗从这时才真正地开始了。由于斯大林的器重，叶若夫青云直上，立刻兼任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内务人民委员(职称是“国家安全总政委”)。

斯大林授权给叶若夫的重任是：要尽快补上被雅哥达放过的“四年”时间。叶若夫走马上任后，比较“成功地”搞了两个案件：一是以皮达可夫为首的“托洛茨基中心”；一是以图

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人中心”。他们之间配合默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所干的，正是斯大林所想的。

在他们精心策划下，苏共中央1936年2、3月召开了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抛出两个报告，一是斯大林作的“关于消灭托洛茨基和其他两面派”的报告；另一个是叶若夫作的“关于从日本——德国的托洛茨基走狗的暗杀活动、破坏行为和间谍活动中应吸取的教训”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斯大林抛出的试探气球，是对中央委员的情绪、思想、决心的一次决定性的公开检验，看他们对“大清洗”计划是拥护还是反对。结果证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都举手一致通过。当然，从后来的结果看，当时有不少人是“违心”同意，被迫举手的。在斯大林的淫威下，谁也没有表现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大胆坚持真理，与独断专行的斯大林抗争。相反趋炎附势，助长斯大林的错误，使他越滑越远，最后走上伪造罪证、陷害忠良的犯罪道路。

图哈切夫斯基究竟是“德国的间谍”还是坚贞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人民的敌人”，还是“战功显赫的功臣”？唯有纵观图哈切夫斯基不平凡的一生，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因此，希望读者能真实地了解元帅的全部人生历程。从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选择军人职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七次越狱，死里逃生，投奔红军、加入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政权南征北战，受列宁的器重，二十七岁当方面军司令、被西方誉为“军界神童和泰斗”直至1920年华沙战役，与斯大林结下冤仇，酿成十七年后的杀身之祸，最后在秘密法庭上的斗争。

元帅这部活生生的历史，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充分地印证了列宁对他的公正评价："哪里有图哈切夫斯基，哪里就有胜利！"同时也印证了他被枪杀前留下的遗言："我希望你们转告斯大林一句话，告诉他，人民和红军的敌人，不是我，而恰恰是他自己，历史会证明他才是千古罪人！"

难忘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在古老的俄罗斯大地的南部，有一个小村庄，那就是维舍戈尔斯基村。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秀丽挺拔的小白桦树一片连着一片，紧紧拥抱着脚下那一池映着白云的蓝色湖水。湖边有一幢古色古香的俄罗斯风格的红顶木房子，我们的主人公——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2月16日就出生在这里。

图哈切夫斯基家族曾经显赫一时，有过大片土地，后来逐渐败落了。在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米哈伊尔出生的二、三十年，图哈切夫斯基家族住在亚历山德罗夫斯科耶庄园。图哈切夫斯基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这家的长子，他幼年丧父，那时庄园里的一切事务都由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祖母——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掌管。她是一位庄重而严肃的女人，曾是尼古拉·鲁宾施泰因学校的高才生，受过良好教育。由于她心地善良，待人诚恳，经常帮助邻里，很受人们的尊敬。

庄园附近的科尼亚日尼诺村住着一位贫穷的庄稼汉，名叫彼得·普罗霍罗维奇·米列霍夫。他有五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漂亮。其中最小的女儿玛芙拉，长得更加俊俏，惹人喜爱。她那窈窕的身材，迷人的眼睛，再加上她天资聪颖活泼，不知博得了多少小伙子的青睐。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索菲娅的长子爱上了当时在他们庄园帮工的这位漂亮姑娘玛芙

拉。而姑娘也爱上了身材魁梧，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看上去很有男子汉气概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常常面带微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玛芙拉在庄园里干活儿的轻盈身影，久久不肯离去。这些都没有逃过他母亲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敏锐的眼睛。

可以想见，在贵族家庭里，要与平民的姑娘相爱乃至结婚，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可是这对年轻人着实真心相爱，终于使没有世俗偏见，明达事理的母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们的结合却不被当时上流社会所接受，因而断送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进入上层社会，去充任按其贵族出身本该得到的职务。不过，他不后悔，他对那一切从来都看得很淡薄。

后来，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先后生了九个儿女，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们的父亲为人忠厚，性格开朗幽默，很有文化修养，特别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尤为可贵的，他是位无神论者，很像十八世纪末的伏尔泰派。他也用无神论的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女。孩子们的母亲——庄稼汉的小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纯朴，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助人，对孩子们影响很大。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从小就同情农民的疾苦，爱和他们交朋友。直到后来他成为著名将领，仍对他们一往情深，从不拒绝他们的请求。爱劳动是母亲培养孩子们的又一个美德。他们常常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劳动，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米哈伊尔会干细木工活和钳工活，而且还干得十分出色的原故。生活的实践证明，儿时养成的爱劳动的习惯对孩子们是有益的，他们可以自如地对待生活中的困难。为此，他们常常从心底里感谢他们的母亲，而更加热爱她。米哈伊尔父母的这些好品

恰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为孩子们献出了一切，孩子们也尊重父母，把他们当成了崇拜的偶像。父母的言传身教使兄弟姊妹间亲密友爱，家庭气氛总是那样轻松和谐。

革命以后，他们家迁到了祖母索菲娅的老家弗拉日斯科耶庄园，在那里图哈切夫斯基一家人住在几间平房里。最大的房间里摆着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两架大钢琴。这是一个整洁明亮的房间，三面都有玻璃，还有几面大镜子作为装饰。这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常常在这里静静地听着父亲和祖母并坐在钢琴前，出色地用四只手合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都是他们喜爱的作曲家。鉴赏家斯科里亚宾纳和塔涅耶夫经常从莫斯科到图哈切夫斯基家作客。

最使孩子们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举办家庭音乐会了。这个家庭的孩子们都很有音乐天赋，那时米哈伊尔的胞弟亚历山大正准备进音乐学院深造，不久他成了钢琴系戈尔坚韦伊泽尔教授的学生，而最终他选择了大提琴。最有音乐天赋的是家庭成员中年龄最轻的、米哈伊尔的小弟弟伊戈尔。他是少年音乐学院的学生，在那里被称作"神童"。而米哈伊尔本人从小喜欢拉小提琴，后来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演奏技艺。小提琴真正成为他的亲密伴侣，那是在他成熟以后。他不仅喜爱拉小提琴，更喜欢自己制作小提琴。在这门复杂的行当里，他拜了莫斯科著名小提琴大师维塔切克为师。米哈伊尔继承了父亲和祖母酷爱音乐的传统，音乐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

1917年后，男孩子们全都上前线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日夜焦急地、望眼欲穿地等待孩子们的信息。当

传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米哈伊尔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时，如晴天霹雳，母亲悲痛欲绝……幸亏消息不确实。米沙（米哈伊尔的爱称）当时做了俘虏。母亲为了往德国俘虏营给米沙寄包裹，她常常要在邮局排长队，有时从清晨一直排到深夜。阴冷的寒风阵阵袭来，把她全身都冰透了，唯有她那颗充满柔情，充满母爱的心仍那么炽热。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比较愉快的日子是他们住在弗拉日斯科耶的那个时期。有一张保存下来的全家像，鲜明而生动地记录了弗拉日斯科耶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木头房屋的一个房间。乐谱架、安东·鲁宾什捷因的大画像、钢琴，钢琴旁坐着祖母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她的身后站着孙子们——米哈伊尔，他旁边是哥哥尼古拉、弟弟亚历山大 姐姐娜佳（她年轻时夭折）和妹妹们。在男孩子们脸上能看到顽皮和愉快而毫不拘束的表情。米哈伊尔穿着中学生的短上衣，那时他正在奔萨中学低年级上学。

不久，全家从农村搬到了奔萨市。这是座文明的俄罗斯城市，被誉为“莫尔多瓦的雅典娜”。它在文学方面颇有些名望。别林斯基在奔萨省的县城里读过书。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在奔萨服过苦役，作家库普林出生在奔萨的讷罗夫恰特，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奔萨市内有男女中学，有美术学校。校内设有大型绘画陈列馆；有藏书丰富的莱蒙托夫图书馆和契诃夫参加创建的别林斯基阅览室。图哈切夫斯基一家住到了上佩沙亚街，即现在的苏沃洛夫街。而一到夏天放暑假时，孩子们常常愿意回到弗拉日斯科耶，他们迷恋那里的池塘、田野和森林，且那里离诗人莱蒙托夫祖母的庄园不远。庄园里的地下墓室里有诗人的墓，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曾

好几次去那里瞻仰。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从1904年至1909年在奔萨中学上学。那时的米哈伊尔正是发育时期，他比同龄的其他孩子长得高，宽宽的肩膀，结实的肌肉，同学们称他为“河马”。他允许别人朝背上打，从未被人打倒过。他也喜爱骑马和角斗，在同学们即兴凑成的角斗比赛中常常获胜。一般说来，处于图哈切夫斯基当时那样年岁的孩子，常常会因过分迷恋体育和体操而影响学习，但小图哈切夫斯基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习成绩。

图哈切夫斯基外语很好，他可以自如地用德语、法语会话和阅读，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法国国务活动家爱德华·埃里奥还为此感到惊讶，对他的外语才能赞叹不已。他的拉丁文也不错，读过原版的朱里·恺撒的著作《高卢战记》。后来，他的语言知识使他能够阅读原文著作。

老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被这种精神教育出来的米哈伊尔有很强的反宗教意识。在学校时，图哈切夫斯基竟然一次忏悔都没有参加过，甚至没有进过圣餐。有时候，他把批驳圣经的小册子拆开，贴在房间的墙壁上。有一次，他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上帝，就应当把它造出来。”这引起了警察局长克列伊斯特男爵的注意。他假装不明白，让米沙解释那句话的含义。父亲尼古拉对政府官员一向怀有戒心。一眼就看出了警察局长的用意，他一把撕掉墙上的纸，好象被孩子们的顽皮激怒了一样。这样一切才算平安地过去。

有时候，在神学课上，当神甫用甜蜜而缠绵的语调讲完神灵的妙手回春和虔诚圣徒的奇迹之后，图哈切夫斯基便站起

来，装着毕恭毕敬的样子问：“神甫，你下节课还给我们编神话儿听吗？”神甫气得火冒三丈，把米沙撵出了教室。

19世纪60年代，奔萨曾是波兰革命者的流放地，后来成了民粹党人的、再后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流放地。无疑，流放者和革命党人对该城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米哈伊尔成了神权的叛逆者，也正是在这里，逐步形成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完美的品格。

他选定了军人的职业

元帅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从未在军中供过职，是个家境中衰的贵族和拥有一个庄园的地主。但他却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热爱大自然和音乐，而且造诣很深。父亲一心想把小米沙培养成音乐家。可惜，儿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选定了军人职业。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酷爱读书，常利用假期到弗拉日斯科耶庄园，如饥似渴地浏览那里的藏书。偶尔在旧出版物中找到了苏沃洛夫的传记和他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富克斯的《大元帅苏沃洛夫公爵传》和佩特鲁金夫斯基的《大元帅苏沃洛夫公爵》。而在伟大俄罗斯统帅本人的著作中，着重阐述并发展了自己训练和培养干部的方法。图哈切夫斯基善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上，力求自己解决并记住它。少年时代的他还醉心于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是他终生爱戴的作家之一。小说的主人公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成了图哈切夫斯基崇拜的英雄。有一次，少年米哈伊尔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见见他最喜爱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千方百计地说服了父母亲，只身一人离开奔萨前往图利省的亚斯讷亚波里亚讷，而终于如愿以偿，那位慈祥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让米沙坐上四轮马车，带着他兜了一圈风。小米沙高兴极了，一回家就绘

声绘色地向家里人讲述这一切，弄得弟弟们羡慕不已。从那时起小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长大当军人的夙愿。戎马生涯，席不暇暖几十年，战功赫赫，驰骋沙场，使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1937年5月，当他预感到大难临头时，他思想上曾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当初真不如听爸爸的话，当一名与世无争的音乐家，也许不会使别人妒恨和中伤。"

热衷于军事的米哈伊尔，与父亲争执了好久，终于坚持从普通中学转入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一武备学校。

当然，武备学校贵族阶层的那些人，不可能过于好心地接收他。然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原来的中学里学习成绩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非凡体力又使人不得不敬重，这些，改变了他的地位。他到校不久，就被任命为副司务长，即学员班长，这是很少见的。原先自以为名列第一的学生，而图哈切夫斯基进校以后，便相形见拙了。而图哈切夫的名字，在他毕业以后被刻在大理石板上。

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一武备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在"皇上"批准的武备中学规章中写道："武备中学的教育，生动地贯彻基督教教义精神，并与俄罗斯国家制定的普遍原则严格一致。它的主要宗旨是把接受教育的青少年训练好，使之将来能为君主和祖国效劳——通过从小逐渐的培养，使学员牢固树立无限忠诚于君主的正确观念和志向……"

至于教学，除了按照普通中学的教学大纲开设一般性的共同科目(拉丁文例外)，照例还有以下课外科目：队列训练、体操、击剑、游泳、音乐、唱歌以及"遵照陆军大臣的指令开设的舞蹈课"。

原莫斯科武备学校的学生、退伍中将科尔奇金在回忆录

中写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曾获得体操、击剑、射击和体育几个项目的一等奖。

莫斯科武备学校第一任校长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是一位音乐家的亲戚，是位很有学问的将军。由于他的任职，该校——全俄历史最悠久的军校之一——学生在知识水平方面超过了普通中学。

武备学校设在莫斯科，因此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官们，特别是那些具有日俄战争惨痛经验教训的教官们，都极力使自己的学生增强民族荣誉感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都希望青年一代将来能洗雪对日作战失败的耻辱。

为了进一步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成长的条件，需要了解俄国军事学校存在的一些旧传统，一些长官们不大反对的传统。比方说，所谓"扯嚼子"之类的野蛮的恶习，其实也就是武备中学的老学员和陆军学校的老士官生侮辱新同学的恶习。

在武备中学里，每个年级都有留级生，这样的懒汉会得到"留级上将"的贬称，之后，他便肆无忌惮地嘲弄年龄小的同学，想方设法愚弄小同学，诸如：他问，"喂，您是谁？"而小同学必须回答："我是一只野兽，……我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嚎叫的大怪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从德国军校学来的那套"扯嚼子"，目的就是要使未来的军官们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低年级的学员常常一面强忍住这些侮辱，一面盼望着自己到了高年级也可以同样报复新同学。

图哈切夫斯基是由普通中学那种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武备学校仅仅呆了一年时间，当然不理睬什么

“扯嚼子”一类，但是如果因为他体力好，又是副司务长，让他去与那个“留级上将”厮混，却是不可能的。于是，懒汉和二流子们就恶毒地把他叫做“新大公安德列·博尔孔斯基”。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在亚历山大军校学习时，那里也有“扯嚼子”之类愚蠢的破烂货，对此他照例不屑一顾。

但是，无论如何，现代的反叛精神已经渗入了这个莫斯科武备中学。例如：手抄本杂志《叶卡捷琳娜军校生》被查封，原因是上面刊登了对某些不受爱戴的教员的讽刺画，以及写了解散某一所莫斯科武备学校有关的政治暗示。总之，据说是因为有点煽动革命的味道。

莫斯科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来说，当然比奔萨更有吸引力。在这里，他可以去听音乐会，或者去剧院和电影院，这些在当时是很时髦玩意儿。在这里的许多文明家庭里，可以感到有一种自由的气氛，甚至在贵族中间也经常讽刺挖苦沙皇和宫庭的官员们。

在图哈切夫斯基家里，年轻人感到自己是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的。他们时常为了消遣，自己组织演出，做滑稽可笑的游戏，或者打闹玩耍，有时也进行关于自己的未来和俄国命运的激烈争论。而在武备学校里，他们则完全生活在另外一种气氛中。所以孩子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那是莫斯科武备学校学员放假回家的日子。

从列福托夫大街到阿尔巴特大街的这段路程相当远。1907年莫斯科才首次出现电车，而在此之前，莫斯科人满足于铁轮马车。武备学校的学员要到伊利因斯基门那儿才许叫马车。回家之前，教养员发给学员们每人十五个戈比做零用

钱，而学员们有时一直步行到阿尔巴特大街，这样就把钱节省下来了。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不惜破费，去雇马车。

进城之前，学员们通常要演练敬礼的标准动作。在遇到直属首长和将军的情况下，必须按规定立正，这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甚至当高年级学员陪伴女友的时侯，也不能例外。

武备学校毕业后，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名列榜首的优秀学员，可以任意选择学校深造：米哈伊尔炮兵学校、尼古拉工程学校，还有巴甫洛夫学校，该校对于他这个列兵来说，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当米哈伊尔按规定填好志愿时，黑板上出现了他所选择的莫斯科亚历山大军校的名字。顿时教室里发出一阵轻轻的叹息声——这是多么出人意料呀！成绩名列第二的学员，随之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彼得格勒巴甫洛夫军校这个被认为是最高等级学校的名额就属于他了。

为什么图哈切夫斯基偏要选择亚历山大军校呢？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不是追求个人功名的人，御前军官也好，上流社会中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军官也好，诸如此类的辉煌前程，都无法吸引他。他知道亚历山大军校在军事训练方面比其他学校都强。顺便提一下，红军著名将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缅涅夫，红军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员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也都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成为亚历山大军校学员那年，学校里的风气还没有多大改变。誓词的套子，大约是从彼得大帝时代沿用下来的。“誓词中的某些句子令人心惊肉跳”，——库普林写道。

武备中学学员要受到上帝法规的禁锢，而士官生们则必

需笃信神学。这个神学只有到战时才能取消。开设它的目的是要给帝国军队未来军官的世界观奠定牢固的忠君思想。不难想象，在父亲无神论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度过这些日子是多么艰难。

1912年，由于连纳遭受枪杀惨案，莫斯科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罢工，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士官生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他们之中一些最明智和最敏感的人，在秘密地谈论着这件事。不用说，应当警惕遭到监视。科尔奇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个叫伊万诺夫斯基的教官，是暗探局的密探。他对一个打算参加禁卫军的"优秀士官生"说："不行，你不能参加。你曾狂妄地议论过你根本无权抬起眼睛去看她一眼的人。"

原来这个士官生的"罪过"，在于当尼古拉二世携带家眷来到莫斯科时，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公主——皇帝之女说长道短。

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片断。

在父亲的朋友日利亚耶夫那儿，图哈切夫斯基认识了一个高年级的武备学校学员尼古拉·库利亚布科（顺便提一句，库利亚布科的住所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接头处）。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看见一个武备学校学员：是库利亚布科的同学，在擦学员制服上的纽扣。原来是沙皇要光临莫斯科，学员们必须去迎接。士官生图哈切夫斯基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

"迎接他还不够……难道还要为他的来到擦扣子！"

1912年，军校举行了1812年卫国战争一百周年纪念会。

军校命令士官生用高筒军帽替换无沿帽，说是恢复一百年以前的旧军帽。

科尔奇金怀着崇敬之情，回忆起训练学员抗击乘马冲击的一位教官。这位教官通常是按警报集合队伍，待"看齐"的口令发出后，便端起脱鞘的军刀，刀锋几乎从士官生们的鼻子尖上擦过。然后沿着队伍的排面猛跑过去，谁要是乱动或者不看齐，鼻子就有被削掉的危险。抗击乘马冲击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士官生抗击驻霍罗舍夫第一苏姆斯基骠骑兵团乘马冲击的战斗。

当然，从现代军事学术的观点出发，沃邦、列耶尔、托特列边等人的遗教，即那种过于呆板的队列步伐，似乎是陈旧了；然而对于士官生们来说，正是由于那时候的训练，才养成了遵守纪律、勇敢和吃苦耐劳的作风。

叙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现代的读者们明白，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接受军事教育的。严峻的考验摆在他的面前。此后，他经历了充满重要历史事件的生活。他看见了身穿灰色士兵大衣的工人、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怎样遭受苦难和牺牲的。他明白了，军事的真正含义决不包容于严酷粗野的操练，或者什么"宫廷"礼节的"典雅"技巧之中。

战争的洗礼

——冲破牢笼返回祖国

图哈切夫斯基在军校学习时是高材生，考试从来都名列前茅。1914年以优胜的成绩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被分配到谢苗诺夫禁卫军团当上一名少尉军官。不久，就随部队奔赴战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对德作战中，他以勇猛无畏的精神而著称。因作战有功，曾连续荣获五枚乔治军功奖章。

1914年是整个俄国的悲惨之年。这一年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一家的不幸之年。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世了；娜嘉，一个迷人的年青姑娘、画家，刚从斯特罗甘美术学校毕业，也死了。这一年，玛芙拉·彼得罗夫娜送儿子米哈伊尔上了前线。

扎维亚洛娃是他们家的至友，她曾写信描述过那次送别。这封信保存了下来。她写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现得很从容，他劝慰母亲，甚至有意说些俏皮话，同时一个劲儿地顺着月台张望，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图哈切夫斯基最后一次吻别了母亲，跨上踏板，又向远处望望。火车已经启动了，忽然从车站那边出现了一位姑娘。米哈伊尔蹦下站台，拥抱了姑娘，吻了她的手，转身去赶火车。他边跑边跳上踏板。姑娘满眼噙着泪水，诉说她给耽误了，没能象她所渴望的那样赶来送别。

玛芙拉·彼德罗夫娜在此以前一直竭力克制着眼泪，到

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便象她家乡的农妇送别儿子去打仗时那样，嚎啕大哭起来。她在这一年之内失去了丈夫和心爱的女儿，现在又跟儿子离别了，心灵承受着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先是到了彼得格勒，进了谢苗诺夫近卫团的后备营，后来又从彼得格勒开赴前线。他赶上了正在行军中的团队。

家里很久没有得到他的信息了。有一次，哥哥尼古拉拿来一份《俄罗斯言论报》，上面刊登着一则消息："图哈切夫斯基中尉和维谢拉戈中尉在炸毁敌人后方桥梁中不幸失踪。这两位英雄的下落不明。"

隔了一段时间得到证实，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中尉归队了。

图哈切夫斯基晋升军官之后，随即被分配到战斗部队。和平时期，禁卫军军官在彼得堡过着上流社会的浮泛的交际生活，而他一开始就对这种生活感到厌烦。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很熟悉"彼得罗夫禁卫军"谢苗诺夫团的历史，知道这个团在1812—1813年间的征战。那时候，年青的军官征战归来之后，并不迷恋上流社会的交际生活，正象诗人，十二月党人贾多尔·格林卡[①]所写的那样：

他们结束一天繁忙勤务后
大家又在思想的疆场上聚首
手操书卷和羽笔
四周又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战斗……

---

①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贾多尔·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和政论家。

众所周知，谢苗诺夫团曾野蛮地镇压过1905年12月的莫斯科武装起义。1917年，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中尉有一次曾讲过，谢苗诺夫团的军官们应当洗刷由于他们镇压过1905年的十二月武装起义而蒙受的耻辱。

1917年2月和10月，禁卫军谢苗诺夫团是第一批转到革命方面的部队之一。

图哈切夫斯基所受的教育，他的性格，使他乐意接近士兵。他同士兵一起克服了艰难和险阻。官兵们发现俄国军队并未作好准备便投入了战争，因而炮弹不敷，人员伤亡过多。连年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溃不成军。军官们都在思索失利的原因，他们为把俄国士兵投入进攻，只是为了减轻德国人对法国的压力感到愤慨。陆军部长苏霍姆林诺夫没有保证供给俄国军队以足够的子弹和炮弹。军队里流传着彼得格勒发生内阁迭次更换的消息，关于拉斯普庭①"老人"对沙皇和皇后的影响，以及"德国势力把持"宫廷的消息。

可是，就在世界大战第一年的艰苦条件下，俄国士兵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斗素质。奥索维茨要塞被英勇地固守住了，西伯利亚步兵击退了敌人对华沙的进攻，歼灭了敌军。而这些胜利的取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官死伤很多。以至图哈切夫斯基中尉刚当排长不久，很快就把谢苗诺夫团的一个连交给了他。他参加了卢布林战斗，后来又参加过加里西亚、杰姆勃林（伊万城）和克拉科夫等几次战斗，1915年他还参加了洛姆扎战斗。

① 拉斯普庭(1872—1916)，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主宰者，相当于清朝宦官李莲英的角色。

据谢苗诺夫团的上士彼得·多罗贾耶维奇·里亚博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总是走在头里，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拍摄我那个排的配置图。我把观察哨、潜伏哨、火力点都用暗号标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好极了'。从此以后，他便开玩笑地叫我'地形测绘员'……我们团的军官大多是公爵、伯爵、男爵。诚然，他们中间也有正派人，比如卡萨特金—罗斯托夫斯基上校，库达舍夫·普尔热瓦尔斯基准尉（研究中亚问题学者的侄子），但图哈切夫斯基中尉比所有这些人都还要高出一筹，他是一位极有教养的军官……"

经过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彼得·多罗贾耶维奇·里亚博夫仍然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保留着良好的印象。今天，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时，里亚博夫说："那是一个仁慈的人，即使在那种官兵之间横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该死年代，他也不厌忌同士兵们结交。"在彼得格勒，在禁卫军谢苗诺夫团里，他知道，当图哈切夫斯基被俘归来以后，被选进了团委员会，而彼得·多罗贾耶维奇自己则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他们两人常常碰到一起，虽然过去的地位不同，一个职衔较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则是军官，但他们的思想路线，据我们所知，却已经在国内战争的疆场上一致起来了。

讲述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情景的，还有他在谢苗诺夫团的同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波尔特。他们俩人当时都是二营的下级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很讲究军人仪表，对探索新的战术方法很积极。这在大战还处于以机动为主的开始阶段是具有不小的意义的。1914年9、10月间，团队在维斯瓦河右岸较低的地方占据着克拉科夫

附近的阵地，而德国人的阵地则在左岸较高的位置上。图哈切夫斯基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何不爬上位于河流中央的沙岛去观察一下德国人是怎样布防的。他搞来一条小小的鱼船，小船平平地齐着水面。他躺进船底，用力把它推离岸边，傍晚时分到了岛上。他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夜。破晓前顺利地回到自己部队，弄到了有关敌方的珍贵的情报。

图哈切夫斯基是布鲁西洛夫和鲁兹斯基集团军在加里西亚发起首次攻击的参加者，是俄国军队在波兰进行的进攻战役的参加者。这就是说，那时候的战争正好还处在运动战性质的阶段。到1915年春季，军队才有了固定的阵地。

德军火炮数量较俄国军队占优势。1915年2月19日，他们在大口径炮火的支援下于洛扎施转入进攻，当时谢苗诺夫团就在那个地段作战。图哈切夫斯基所在的七连几乎全部被歼。在冲击时，图哈切夫斯基经过激战和连队其他人员一起被俘了。

关于这一情景，《俄罗斯残废者》报曾有过报道。后来，母亲和亲人们终于得到了关于他的确实消息。

他给家里寄来了几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的开头都是千篇一律："活着，身体健壮，一切都好。"有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今天吃到了蜂蜜，颜色和味道都跟黑皮鞋油一模一样。"有时候，他写到大家很快就能见面。然后信息忽然中断。这就说明图哈切夫斯基又搞了一次从俘虏营中逃跑的尝试。

关于越狱，他在明信片上有时也作暗示，比如他建议亲人们去读读《伊戈尔远征记》。大家都知道，那本书描写的就是伊戈尔王子被俘后逃跑的故事。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曾六次试图从军官集中营里逃

跑出来,只是到第七次才获得成功。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值精力充沛,渴望有所作为,可是年青青地当了俘虏,他是多么难以忍受,又多么急欲获得自由呀,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第二次越狱失败之后,他被遣送到梅克仑堡——史威林的巴特——施图耶尔。这里是一座有150名受罚军官的集中营。在这个过去的庄园里,关着75名俄国军官和75名法国军官。这座位于森林之中而又濒临湖边的集中营由几道铁丝网团团包围着,德国哨兵机警地守卫着。和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被关在这座集中营里的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索金,讲述了图哈切夫斯基第三次企图逃跑的情形。这次,他是和菲利波夫一起跑的。要跑出去,谈何容易,必须弄到老百姓穿的便衣。此外,当被俘军官从集中营跑出来时,每次都给周围的地形困住了,带着搜索警犬的巡逻队总能把逃亡者寻找出来。

这次逃跑,图哈切夫斯基表现出非凡的机智。每个月要从集中营里拉一次衣服出去洗,这些衣服都是装在大木桶里的。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就藏在两只木桶里。在一名德国兵护送下,大车把塞满衣服的木桶从集中营里拉走了。车子来到森林中间,忽然从木桶里钻出两名逃跑者,他俩缴了德国兵的枪以后便消失了。

发出了警报,卫兵带着警犬首先直扑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居住的房间,可是警犬也帮不了忙,因为房间里到处撒着马合烟。在德国人撤岗以前,逃跑者在森林里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二十六天的游荡,他们成功地到达了荷兰边界。在这里,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分手了,他们选择不同的途径过境。菲利波夫算走运,他终于到了中立的荷兰,而图

哈切夫斯基则遭到边防军的拦阻。这一回，图哈切夫斯基被送到了专门关那些严重违章的俘虏的英戈尔城堡。在英戈尔城堡的俘虏中间还关着一名许多年以后才为大众所知的军官，他就是沙尔·戴高乐，后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第三次失败也没有使图哈切夫斯基失去信心。在异国他乡半饥半饱又无所事事的囚禁生活使他感到烦恼，这种境遇，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去构划新的越狱计划。

英戈尔城堡，是1907年修建的一座位于上巴伐利亚的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变成了关押被俘军官的集中营。这个要塞的第九号堡垒，就是囚禁企图逃跑者的牢房。这是一座长长的石头建筑物，一半嵌入地下，四周围着一条灌满水的壕沟。堡垒前的一小方空地上，圈着好几道铁丝网。关在这里的有俄国的、法国的和比利时的军官。长长的走廊把一间间拱形顶的牢房分隔两厢。即使在白昼，牢房里也总是半明半暗的。

就在这种条件下，图哈切夫斯基仍打算组织逃跑。深夜，他和同志们一起撬开地板，挖地道；白天，把泥土秘密运走。这次计划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俄国军官当时过的只是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不象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那样，通过红十字会领到丰足的食品包裹。俄国俘虏感到最为苦恼的是得不到任何消息。前线的情况究竟如何？战争还要拖延多久呢？

有时从前线传来片言只语，大家就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各次战役，争论往往十分激烈。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问题始终兴致勃勃。在这里，因为没有书本，他就只好满足于和难友们讨论。大家都深信这位年青军官的军事知识很有些根

基。

1917年春天，关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英戈尔城堡的囚禁者那里。沙皇政权被推翻一事，就成了被俘的俄国和外国军官争论的主要命题。

在英戈尔城堡，在九号堡垒里有一名法国军官叫热米·茹尔，此人信奉工团主义。他和图哈切夫斯基朝夕相处，这使他后来有可能利用这一机缘。1928年，他以皮埃尔·菲尔瓦克的笔名发表了一部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作品，而且以后还曾再版多次。

热米·茹尔跟图哈切夫斯基也谈过政治问题。难友们都证实年青的俄国军官为压迫人民的、既愚蠢又残暴的沙皇政府垮台而兴高采烈。俄国发生事变的消息，主要是通过包装战俘包裹的破报纸传到集中营里来的。而俄国人难得收到包裹，在事变的旋涡中，人们似乎把这些人忘掉了。

1917年3月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了一张致受难中的被俘同志们的传单。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号召被俘人员站到彼得堡农工兵代表苏维埃一边，回到俄国以后“不要支持沙皇，而要反对沙皇；不要支持地主和富人，而要反对他们。”

列宁的话说到士兵们心里去了，而在那些还不曾受到旨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宣传所毒害的军官们中间，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回到俄国来罢，作为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而不是沙皇的军队。1905年那时从日本归来的被俘人员，成了争取自由的优秀战士。”

不久以后，图哈切夫斯基又从英戈尔城堡逃跑一次，但

又被抓了回去。

到了第七次，越狱才获得成功。这一次，图哈切夫斯基是从士兵集中营里跑掉的。第六次逃跑之后他冒充士兵，所以把他关进了士兵集中营。从那里比较容易跑掉，当然士兵们知道他是军官，但大家都不吭气，而且还帮着他准备逃跑。当时流行着一句谚语："管他是禁卫军还是陆军，反正虱子照样咬人，子弹照样要命。"

……越狱者提高了警觉，每天夜间赶路，朝瑞士边界走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后来讲述说，每当听到"哈尔特（站住）！"这个德国词时，就不禁会吓一跳。这个词，使他想起了前几次逃跑的失败。

他给亲人们讲，有一次他躲在干草垛里，当有人用大杈子捣动干草堆时，那几分钟实在难受极了。

因饥饿而极度虚弱的图哈切夫斯基，终于越过了瑞士边界。回到祖国之后，他给几个妹妹看他的照片，她们被他那种又瘦又弱的样子惊呆了。

他在莫斯科亲戚家里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小住了几天之后，便到弗拉日科耶，去找母亲和妹妹，他差不多三年没有见到她们了。他已经知道，在他被俘期间家里又遭到一次不幸，十四岁的弟弟伊戈尔去世了。这孩子才华出众，弹得一手好钢琴，有着光辉的前程。他的死，使图哈切夫斯基受到极大的打击。

村子里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农民们待他们家不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几个妹妹都还年幼，为了生活，他们都得到森林里去砍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干活比别人多。他常常跟农民们闲谈，他确信临时政府丝毫没有改善穷

人的境遇。农民们怨天尤人，到处在哭爹、哭弟兄、哭儿子—男人们不是牺牲了就是离乡背井，杳无音讯。

图哈切夫斯基在村里没有呆多久，很快便去了彼得格勒，回到了谢苗诺夫后备团。士兵们衷心地欢迎这位年轻军官，推举他当了连长。

到彼得格勒后，其实这以前也一样，包括被俘期间，他已经感觉到军官阶层思想太僵化了。由于阶级偏见的影响，他同他们已无共同语言。科尔奇金说，“有谣传说米·尼·图哈切夫斯基被俘回来之后，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跟军官阶层闹翻了。”

其实，青年军官头上军衔不大，他与旧军部的瓜葛只不过几年而已——武备中学，亚历山大军校两年，以及在前线当中尉不到一年。

那段时间里，工厂的车间，城市的住宅，农村的茅舍，军队的营房，到处都在展开激烈的政治辩论。

图哈切夫斯基在团里的同事，都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们无法容忍沙皇被推翻，无法容忍自己的特权、财产、爵位被剥夺。

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对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资产阶级宪法抱有幻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念念不忘。

图哈切夫斯基倾听着别人的争论，他思索的却是主要问题：将怎样处置地主的土地？工厂怎么办？留给资本家吗？最后，战争怎么样？他知道人民已经给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可是禁卫军的军官先生们却在咬牙切齿地公开争辩说，是不是已经到了把捣乱分子绞死

的时候，还是应该再等上一等呢？

图哈切夫斯基看到他周围的人群划分成了两大营垒：一个是世袭的贵族、地主、有钱的资本家、过去沙皇政府的官吏，另一个则是向往着新生活的人民。怎么办呢？是停留在暴力、压迫的人群里，还是转变到人民方面来呢？人民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因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广场上、大街上听演说家演说时，他曾看到过那些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召唤大家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家伙，是怎样被撵下讲坛的。

谁也无法猜透，在这个佩带禁卫军中尉肩章的沉默寡言、深沉多思的青年人的意识里，掀起了怎样的一股汹涌的浪头。实际上这个年青人已经下了决心不再和那些禁卫军军官先生们同道了，他懂得真正的爱国主义、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只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图哈切夫斯基在两个首都①目睹了革命高潮的气氛。对于苏维埃政权最初日子里的这种气氛，亚历山大·布洛克在《十二个》一诗中作了透彻的表述：

仇恨，忧郁的仇恨
在胸中燃烧……
悲戚的仇恨，神圣的仇恨……

这时，年青人的军衣上肩章已经卸下，但留下了两道痕迹。他亲眼见到唤起人民中"神圣仇恨"的那些鲜明对比。老爷们的私邸里，在构划着阴谋，在策划着破坏行动；而在郊区，在贫民区里，工人们正在挨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排着长队在等候那一份夹着麸子的面包。一到夜间，红

① 指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市。

色禁卫巡逻队便在市中心寂静的大街上来回巡行：

迈开革命的大步！

好斗的敌人何曾合眼！

在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与自己的老同学，大学生—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邂逅相遇，在同他作了几次坦率的谈话之后，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道路。他懂得了列宁的党是和人民同呼吸的唯一政党，走回头路是不足取的，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层。

1918年春天，苏维埃政权已经搬迁到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工作。这一年四月间，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廉洁奉公的工作态度，久已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波特伏伊斯基① 所知。与他们几位交往，给图哈切夫斯基影响很大。如果说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天赋正是在这些杰出的列宁主义者以及与弗·伊·列宁最初几次会见(图哈切夫斯基这段时间内曾多次见过列宁，听过他的讲话)的影响下，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真正地得到施展的话，那是一点也不夸大的。正是应当从这里去寻找形成未来苏联统帅的那些品质的原由。图哈切夫斯基能够经常保持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有各部队和兵团的代表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来，这也是形成统帅优秀品质的积极因素。

① 尼古拉·伊里奇·波特伏伊斯基(1880—1948)，1901年加入共产党。十月革命时期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7年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

锐意改革　大胆创新

图哈切夫斯基利用战争空隙时间，除了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经典著作和列宁有关军事学说的论述外，还抓紧一切时间研究资产阶级军事学家的理论，博览兵书广采众家之长，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对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颇受列宁同志的赏识。他发表的第一篇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国家战略和阶级战略》，至今仍在列宁的个人图书馆内保存着，上边有列宁的亲手签名："列宁存书"。

1921年红军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了大改组。在改组问题上，红军领导层中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以伏龙芝为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保守派。斗争很激烈。图哈切夫斯基旗帜鲜明地站在伏龙芝一边，支持伏龙芝的正确观点。

1920年12月22日，列宁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红军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并加强它的作战能力"。

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怎样才能在不给共和国增加过分负担的情况下维持军队。情况迫使苏联政府实行民兵制。

早在1903年全俄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就提出了关于将常备军改为全民武装的问题。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决定，在目前一段历史时期内，党应该放弃

民兵的“全民”性这一要求。但同时代表大会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民兵应具有阶级性，应当成为苏维埃的工农民兵。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民兵制的决议。内战进入了尾声，国际形势的尖锐程度有所缓和，党认为在军事上有必要进行带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应该使劳动者有可能从事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同时国防又能得到保障。

1920年12月，米·瓦·伏龙芝和谢·伊·古雪夫提出了改组红军的提案。这些提案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军事问题的主要文件之一。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有：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办法，关于党的统一问题。此外，代表大会还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3月17日，尽管有半数的代表响应动员去参加攻击喀琅施塔得的战斗，军事代表会议还是召开了。

1921年《军事科学和革命》杂志问世。在这个杂志上，总司令加缅涅夫以瓦林的笔名，谢·伊·古雪夫以沙洛明的笔名发表文章，论述国内战争的经验和红军整编问题。

用笔名发表文章这一事实，就说明争论相当激烈。古雪夫的文章题目是《关于红军的整编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古雪夫提出了要建设一支怎样的军队，军队执行什么任务等问题。

米·瓦·伏龙芝的《统一的军事学说和红军》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对于统一的军事学说和概念，文章是这样下定义的：“……一国军队所遵循的学说，决定该国武装力量的建军性质，战斗训练方法，及其领导根据大多数人对该国面临任务和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所抱的态度；这些任务

和解决任务的办法，都源出于该国的阶级本质，并由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在武装力量建设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时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是军事学说还是虚假的军事谬论》一文中，针锋相对地反对伏龙芝关于统一的军事学说的富有党性的原则。

托洛茨基断言，红军在军事学术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他不承认国内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把沙皇军队的经验看得太重了。他责怪伏龙芝及其志同道合者以探讨理论的手段，使指挥人员脱离具体任务。按照他的意见，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从来不存在什么军事科学。战争不是一门科学，战争是一门实用艺术，是一种技能。战争对于能正确掌握军事的人来说，是一门“手艺”。托洛茨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军事。

伏龙芝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会议上，是怎样回敬那个一笔抹杀红军国内战争经验的托洛茨基的呢？他说：

“……这么说，我们在军事领域里似乎是毫无作为；说什么从我们作战的正确性来看，我们的事情搞得糟糕透了；说什么从军事学术的观点来看，我们并没有取得什么特殊的成就，没有什么创造，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才能。我认为，这些论点，首先在客观上是不真实的，在心理上，从它的后果来看，简直是有害的。”

伏龙芝谈到了红军的建军特点，红军的政治部门及其作为特种武器的作用；谈到了遵纪守法的新思想；谈到了官兵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鲜明地反映出一个事实：站在

红军前列的是无产阶级分子。这种情况在作战性质上也有所反映，红军指挥人员给军队带来了勇敢、主动和坚定的精神。“……机动性、主动性和进攻性等特征，不仅与军事行动的客观条件有关（这点谁都无法否认的），而且也与红军的领导都是用工人阶级的积极思想武装起来的分子有关。”

在这次军队代表会议上，图哈切夫斯基也发了言。他讲话的精神同米·瓦·伏龙芝提出的原则很接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在无产阶级国家军队的战争中，毕竟有不少与过去战争不同的地方。“……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证明，在组编部队问题方面，在组织后方(广义概念)问题方面，都会有实质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所坚持的战略特点。”

图哈切夫斯基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作为军事实践家，作为统帅讲了话。他说，军事的最困难的部分是组织某次战役。至于如何判定敌人，如何确定兵力对比，如何制定这个或那个作战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令员本人的素质。如果他的思想敏捷，富于创造，作风果断，归根结底，有坚强的意志，那么，他往往能制定出他所需要的计划，而且计划越简单明了，对作战越有利。

图哈切夫斯基在有关国内战争机动性问题方面，也坚决地驳斥了托洛茨基：“是的，这种机动是有些简单，也就是说前进和后退不过1000俄里的方圆，但确实已经有了机动性，而且这么好的机动我想是会载入史册的。这种机动我们并不是从白匪那里学来的……在1918和1919两年间，当白匪除在南方战线得逞外，到处失利的时候，我们的仗打得还是很灵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自己的特殊环境中进行学习的。”

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在谈到培养干部时，只限于培养班长，其职责就是关心营房清洁和靴子擦油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断言，这远远不能包括全部任务，他谈到了培养通讯主任、军交主任的必要性，"我们实际上没有这些勤务主任，正因为缺少这种干部，我们在百分之五十的战局中吃了败仗……若是我们只停留在擦皮鞋和拖地板上，那么，我想，我们什么任务也执行不了。因为我们的任务比单兵战术广泛得多，我们还有战略任务。因此，我认为培养我们的高级指挥人员，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关于红军的军事思想问题，展开了一场极其重要的争论。这场争论并不是抽象的，这是因为在苏维埃国家的边境上战争风云紧急，波兰资产阶级派遣秋秋尼科匪徒潜入，在中亚土耳其冒险主义分子斯韦文将军，自称是"东起喀什，西至里海"的一个国家的埃米尔，卡累利阿前线战事仍未停息，协约国干涉者的魔影还在地平线上游荡。

在国内战争时期，红色的军校党员是一支战斗组织健全的优秀的队伍。这是一批充满着无产阶级思想的无畏战士，红军未来的指挥员。从这批学员中，确实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当图哈切夫斯基批驳托洛茨基的时候曾说道，从这批学员中间不仅要培养出班长，而且也要培养出一批司令部军官，这是很对的。

托洛茨基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演说家，因此他认为他可以充满自信地对他不懂得军事问题高谈阔论。托洛茨基的这番华而不实的空谈，没有取得成果。根据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战斗行动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苏联的军事学说。伏龙芝给它奠定了基础，而图哈切夫斯

基、特里安达菲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谈及最后一次对红军和整编红军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争论时，应该谈谈在苏维埃国家这个历史时期内，列宁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

毫无疑问，这个暂时的让步，给指挥员和红军战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曾同资产阶级和白卫军进行过搏斗。当和平时期来临时，他们这些久经阶级战斗考验和锻炼的战士，看到新型的、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又重新回来了。他们感到难以容忍这种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曾为之奋斗过的社会主义，怎能同私人商业和平共处呢。但是，总的说来，在新经济政策方面，他们是支持党的路线的。

列宁在掌握舵柄，资产阶级的灾害也好，新经济政策的激浪也罢，都无法撼动苏维埃这艘航船。

彻底进行军事改革的时期来到了。红军的数量，与国内战争最后一年相比，只剩下十分之一。

1923年6月，成立了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瓦·弗·古比雪夫担任主席的红军调查委员会。不久以后，谢·伊·古雪夫接替了古比雪夫。这个委员会的结论，经党中央批准，奠定了1924——1925年军事改革的基础。

图哈切夫斯基成为米·瓦·伏龙芝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方面的最得力助手之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军事改革中，他参加了组织分委会的工作。该分委会的成员还有：亚·伊·叶戈罗夫、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约·埃·亚基尔、谢·米·布琼尼。他在分委会中主持报告和起草文件工

作，这也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工作。因为有些表报格式，是早在彼得大帝时期确定的，至今一直没有变更。

由于分委会的工作结果，表报压缩了一半以上。

图哈切夫斯基写给伏龙芝的题为《关于步兵武器的口径》的一封信，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毫无疑问，膛式步枪将逐渐被自动步枪所取代。到那时，双来复线口径的枪，估计会占统治地位。"这是在1924年说的话。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不止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图哈切夫斯基这种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敬佩。记得伟大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军队中几乎没有自动步枪。而那些落后的、墨守陈规和固步自封的军事首长，仍在坚持那种笨重的三线的膛式步枪。

1924年至1925年的军事改革规定，向民兵和常备军混合体制过渡，不仅在军务和行政管理系统中实行一长制，而且在政治领导方面也实行一长制。在贯彻落实这项改革中，图哈切夫斯基是伏龙芝的得力助手。

1924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逝世，是全民的痛苦。在圆柱大厅里，在列宁的灵柩旁，那些老党员、红军的军事首长、国内战争的英雄在日夜肃立守灵。在他们中间，有列宁所了解、器重和爱护的，来自斯摩棱斯克的图哈切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逝世的头几年，斯大林的权欲还暴露得不太明显。红军仍由伏龙芝领导。他高度评价图哈切夫斯基无论在国内战争时期，或者后来彻底改组红军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伏龙芝一心想使总参谋部成为红军在军事和理论方面的大脑机构。伏龙芝在其著名的改建红军的提纲中，提出改变培训未来军事领导人的方法，建议将广泛的科学知识教育同单纯的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1925年，伏龙芝逝世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受命担任红军参谋长职务。

这位新上任的参谋长所面临的工作是复杂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请全党同志重视民兵部队在国家防御体系中的重大作用，并指出必须在民兵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1924年，一半的苏联武装力量已具有民兵性质。任务是使越来越扩充的民兵部队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同时，情况也要求这些队伍只吸收农村的贫农和中农阶层参加。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这些民兵部队视作苏维埃国家和党同农民群众联系的一种崭新的形式。

早在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在红军学院军事科学协会中发表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当靠精神作战，还是靠技术作战。

请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谈话："任何一支装备低劣的军队，不管它多么受渴望胜利的精神所鼓舞，那它也是永远对付不了用最新技术兵器装备起来的敌人的，如果这个敌人有作战愿望的话。"

1925年至1926年，在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职务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坚决为推行技术而奋斗，他常常遭到守旧的指挥员，那些迷信刺刀尖和马刀口的人的反对。在骑兵代表大会前夕，在1925年第八期《军事通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堪称当时持守旧派观点的代表作。瞧那篇文章中关于在作战条件

下运用汽车运输问题是怎么写的吧："汽车从很远处就会暴露自己的行动，特别是在夜间和在公路上，因为它有喧声，夜间它还有照明的灯光。若不开灯，它当然就寸步难行啊。"该文作者写道，鉴于波列西耶一带土质松软或者类似那样的土质，加之地面不毛和凸凹不平，"某军决定推广用马拉装甲车的经验。一个老家伙胜过两个新朋友！"最后他说道："也许人们会说，西方将会讥笑我们。我们平心静气地回答：'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坚持自己的经验，而且相信他们是会有人效仿的。"

图哈切夫斯基竟然会碰到如此离奇愚昧的论调。

威武的勇士怎能想象，龙骑兵的刀剑随着刀枪时代的推移早以成为过去，就连乘双马轻便敞车的骑兵，在阅兵式上也都销声匿迹了。

众所周知，纳碎军队1939年打败波兰的战争中，"汽车化"发挥了简直令人震惊的作用。波兰当时拥有十二个骑兵旅和一个装甲坦克旅，而希特勒军队在"入侵军"的五十六个师中，就有九个装甲坦克师。

马刀和长矛，在装甲坦克师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早在1923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步兵战斗》报告中就说道："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军队，使他们学会有组织的、讲究方法的进攻，善于分散小股行动，充分发挥主动性和机智果敢的精神……训练步兵能够完全根据需要进行活动。"

这些思想，从它发表那天起直到今天，多少年来丝毫没有过时。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写的东西，生动、形象，且富于感染力。他在《机动和炮兵》那篇在红军炮兵代表大会上曾

引起过争论的文章中，写道："炮手爱打单独的坦克等活动目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打这种有趣的目标要愉快得多。但把某个坟地、菜园、丘陵的斜坡等那些看不见人家在那儿干什么的地方，把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步兵，看不到步兵究竟会遭到多大损失的地方轰个底朝天，却是没多大兴趣的事。然而，这种场面，炮兵固然没多大兴趣，但却能鼓舞和激发步兵的士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当他们看到敌人的地盘被打得'地覆天翻'，当他们看到敌人对他们已减弱的步兵火力感到震惊的时候，心里无意中就会生长起进攻的热情……问题并不在于对炮兵火力的热衷，而是要看它的主要结果：步兵是不是开进了。"接着，他又以雄辩的激情继续写道："我只想朝那些专职的炮兵权贵们开几炮。这个团队是很团结、很老，但也很成问题的……炮兵是为步兵而存在的……"

192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三年，《军事通报》杂志发表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现代战略的几个问题》，该文探讨了未来战争问题。

"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逐渐演变地球上两部分——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之间的战争……现代战争的主要特征是规模宏大，战争中动用的经济资源多，投入战争的兵源大，交战双方所占的空间广阔，以及持续时间长……形成的情况是：我们将面临一场严重的大战，面临数百万用最新技术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我们应该记住，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给我们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在和平时期，就应该预见到战争第一阶段的情况……并应对之作好适当的准备。"

伊塞尔松在他的《一个同时代人对米·尼·图哈切夫斯

基的回忆录》中叙述道：1928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关于必须改装红军和发展红军航空兵和装甲坦克力量的报告。他估算了所需新式兵器的数量，并建议兴建一系列工厂承担这些任务，拨出大量资金，对部队技术兵器实行全面改装。

斯大林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是不切合实际的。诚然，这个报告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写的，那时，国内还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对未来说来，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不久后，图哈切夫斯基被迫离开了红军参谋长的职位。他在离职报告中写道，他曾竭力想使红军参谋部成为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机构。可惜事与愿违，它变成了一个纯技术性机关。

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在列宁格勒，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自抓了新型火炮的试制和城防问题。按照图哈切夫斯基的设计方案，在列宁格勒周围构筑的工程设施，以及修建的新的战略铁路和扩大原有铁路的运输能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无论是参观靶场，还是参加演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都竭力抓住军事方面的实质问题，抓住军事训练中的关键问题。

当年的一位副排长帕甫洛夫不久前写的一封信说："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记得是1932年，我当时在红军第一百一十一炮团服役（列宁格勒州普希金城）。我是一个副排长，我被派到列宁格勒市去试验152毫米炮。我们在靶场发射阵地上

做好了准备。大约在19时左右，靶场主任让我们排在炮位附近集合起来，排成两列。第一排人的大衣都比较干净，第二排都比较脏。在图哈切夫斯基走近时，靶场主任下口令‘立正！向中看齐！’但是，图哈切夫斯基没有从正面走，而是从后面走了过来。队伍不得不向后转，于是穿脏大衣的人成了前排，而穿干净的倒成了第二排。图哈切夫斯基向我们问候以后，就让队伍解散了。当我们解散开后，他笑着对主任说：‘以后再不要这么搞了……’”

对这一切要小权术的作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了解得一清二楚。战士和指挥员都明显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和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首长打交道。

让我们继续引用帕甫洛夫的信吧：

“图哈切夫斯基走到我跟前问道，我的加农炮能不能经得住考验。我虽然并不知道它能不能经得住考验，但坚定地回答：‘经得住。’‘那就下口令吧！’于是我就下达了口令，应当用专用装药发射五发。射完五发炮弹后，我同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一起检查武器。他亲自爬上爬下检查得很仔细。临别时，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友好地握了握我的手，还祝我们更好地掌握技术兵器。尽管他是副人民委员，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副排长，他与我却平等相处。他穿一件皮大衣，戴一顶库班帽，不记得那是秋天还是春天了，只记得地上没有积雪。”

1920年华沙战役酿成的悲剧

战争风云，瞬息万变。人心莫测，胜过战争。

年仅二十七岁的西方面军司令一图哈切夫斯基能够叱咤风云，驾驭变化万千的形势，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1920年的华沙战役中，无形中触犯了当时是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斯大林，结下了冤仇，酿成了他十七年后的杀身之祸。

在北高加索刚刚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在西边又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危险。

当时，贴在家家户户山墙上的，每份用褐色包装纸印刷成的报纸，周围都集聚着饥饿消瘦的人群。当他们读到新的军事威胁的时候，脸上都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这次来自波兰的威胁，是以皮尔苏斯基元帅为首的军队的威胁。

人们对这些消息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窃喜，露出不怀好意的狞笑，盼等苏维埃政权早日垮台，但是大多数人看到这条消息后，都表示愿为苏维埃政权苦战到底。

1920年3月1日，列宁在哥隆克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扬言要取得1772年的领土，要乌克兰受他们管辖。我们知道，法国在煽动波兰，把几百万款项投到那里。我们对波兰的同志说，我们珍惜波兰的自由，象珍惜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自由一样。俄国的工农受过沙皇制度的压迫，就清楚地知道这些种压迫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德国、奥国和俄国的资本家

当初瓜分波兰是最大的犯罪行为。那次瓜分使波兰人民遭受了多年的压迫，在那些年代中，使用祖国语言被认为是犯法，但在那些年代中全波兰人民形成了要推翻这三重压迫的信念。所以我们是理解波兰人民的刻骨仇恨的。我们不希望为疆界打仗，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埋葬那可诅咒的过去，即每一个大俄罗斯人都被当作压迫者的那个时代。”

列宁和过去一样，用简洁而动人的语言勾画出几乎两百年来形成的俄波关系，阐述了苏维埃俄国和波兰人民之间发生的伟大的历史变革。俄国人民，和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人民一样都遭受过沙皇的压迫。俄罗斯的先进人物都了解这一点，十二月党人一佩斯捷尔、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别斯图列夫一留明早在1824年就同波兰“忌空谈务实际”的秘密起义组织签订了条约。可惜，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于是俄国人，完全和波兰人一样陷入沙皇的压迫之下。

“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而战”的口号，正是赫尔岑于1863年，在波兰发生起义那一年提出来的。

1905年，无论是俄国还是波兰的工人和农民，都同沙皇政府展开了革命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独立国家，不过这个独立是虚假的，白色波兰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协约国，臣服于法国和英国。至于自由，那在皮尔苏斯基国家里连影子都没有。而集中营和监狱里，却塞满了共产党人和对共产党抱同情态度的人。

在白色波兰国家里，宫廷和波兰大地主的庄园，与波兰农民忍受着贫穷和饥饿栖息的木板茅舍之间，形成极其鲜明的

对比。波兰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贪得无厌的阔人—工厂主和形形色色投机商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同样呈现出如此鲜明的对比。

患有大国狂的皮尔苏斯基政府，妄想占有“从大海到大海”，也就是说从里海到波罗的海的领土，恢复1772年波兰所占有的疆界。皮尔苏斯基分子一心想把白俄罗斯也划进波兰疆界。顺便说一下，白俄罗斯连同明克斯市在内，1920年以前，几乎全部被波兰军队所占领。

凡是在20—30年代得便到过波兰的人，都不难发现皮尔苏斯基和皮尔苏分子推行的是不明智的军国主义政策；不难看出波兰工人阶级，特别是白俄罗斯农民—在所谓“独立区”和波兰政权管辖不到的殖民地—边区里的农民的困境。

早在1920年4月8日，苏联政府就断定，和白色波兰谈判是毫无希望的。仅就谈判地点问题就争执不休。波兰代表建议选定鲍里索夫城做为谈判地点。同时，根据波兰人的要求，不应全线停火，而只在鲍里索夫地域停止军事行动。现在已真相大白，选择这个地点（鲍里索夫城），只追求一个目的：波兰当局想通过外交途径，把我们的力量钳制在鲍里索夫西北方向上，而在西南方向上则集结突击力量，一举攻占乌克兰。

苏维埃共和国和白色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以彼得留拉为首领的冒险主义者，同波兰沙文主义者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波兰上层统治者的意图，被占领的乌克兰及其傀儡政府彼得留拉，都必须臣服于波兰。唆使波兰同苏维埃共和国宣战的法帝国主义者，也利用了这个诱饵。

1920年4月25日，当白色波兰军队发动反对苏维埃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列宁曾说道：

“同波兰之间的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我们丝毫不想反对波兰的独立，正如同不想反对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独立一样。但是，他们不管我们如何让步，仍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应该一致奋起，既要保卫我们自己，也要保卫乌克兰，免遭波兰帝国会主者的袭击。”

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了两条战线：西部战线司令员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温什利赫特；西南战线司令员是亚力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斯大林和别尔津。

5月6日，波兰军队占领了基辅。彼得留拉“首领”的部队和波军一道开进城市，波军和彼得留拉分子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各种冲突，分别驻在城市不同区内。波军对彼得留拉分子是极其鄙视的。

我们可以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进军维斯瓦河》来分析西部战线的作战情况。图哈切夫斯基的那部著作是1923年2月他在红军军事学院的讲稿。该书详细地阐述了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作战的过程。

西部战线，1920年5月15日，当它的力量还没有全部集结就发动了首次进攻。

战斗行动是以别列津纳河为界，在河的两岸展开的。该河两岸到处是沼泽地和密林，给强渡该河造成很大障碍。在列佩利和西德维纳河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便于大部队行动。这个地域被称作“斯摩棱斯克大门”。西部战线司令员在制定计划时，正选中这个斯摩棱斯克大门作为实施主要突击的地点。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员是科尔克）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5月进攻究竟取得了哪些战果？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的部队坚信他们能战胜波军……我们都以坚定和必胜的信念投入了后来的战斗……我们使西南战线减轻了压力。

“……总之，我们取得的最重要战果就是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大门。这便使我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组织下一步的进攻，立刻使我们部队挺进到莫洛杰奇诺——波洛茨克铁路一线。”

波兰贵族同苏维埃的战争，激起了俄国白匪的一线希望。当时侨居在华沙的有一对夫妻，是过去俄国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作家德·谢·麦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娜依达·基皮乌斯。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鲍里斯·沙文科夫也响应他们的号召来到华沙。皮尔苏斯基和俄国“首领们”之间开始了半秘密的会谈。议题是组建白卫军“俄国支队”，站在白色波兰一边进行作战。在波军占领的明斯克担任要职的日利戈夫斯基将军，建议推翻苏维埃政权后就在波兰组建一个波兰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俄国”政府。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男爵，在白卫军中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以及类似布拉克——巴拉霍维奇及其匪帮那群败类。

波兰白军对俄国白卫军是不信任的，因为他们知道在白卫军中间，有不少是“俄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论的拥护者，这些人念念不忘华沙是俄罗斯帝国不久前的一个省会。同彼得留拉签协定，对白卫军来说，是一件不愉快的意外的事。这些保皇分子梦想看到自己省长统治下的基辅。

然而，波兰白军在南方的事态岌岌可危，在战线上出现了第一骑兵集团军。该军已受领任务，5月1日前，在乌曼和

伊丽沙白城地域集结。

第一骑兵集团军从北高加索向西南战线完成三千公里行军，一路上打败了数股富农匪帮。1920年5月26日拂晓，在卡扎钦总方向上转入进攻。6月5日，在波军第六和第三集团军结合部突入敌人后方。

皮尔苏斯基起初没有把骑兵放在眼里，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骑兵集团军出现在波军战线的深远后方。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1920年时，再也不把骑兵写成"战略上的某种荒谬"的东西了；而是有意地提到他手下一个雷兹·斯米戈累的将军如何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布琼尼骑兵遭遇。

结果，波军在基辅没有呆多久，不超过一个月。第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五和第五十八步兵师的部队，于1920年6月12日进入基辅。

6月6日，弗兰格尔男爵从他的克里木老巢开始进攻。到6月24日才把弗兰格尔阻滞住。

7月4日，西部战线发动了由图哈切夫斯基筹划的新攻势，结果使波兰第一集团军在第一天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白俄罗斯的总决战，使敌人狼狈溃逃。7月11日，恢复明斯克。加伊统率的骑兵军在季斯纳河湖泊沼泽地域以北行动，进入波兰白军深远后方。7月9日，占领希文恰内，指向维尔诺。

这里想引用7月作战中的一个插曲。这是退役中校阿·马纳科夫（当时他在第五十四步兵师培训指挥人员的教导队主持工作）讲的。他说：

"……在比亚维斯托克城郊，波兰白军向我发动猛烈进攻，当时我们教导队正在重要战线地段上担任防务。有的地

方已经打响了。突然有三辆汽车直接朝我们急驰而来。有一辆车开得特别近，从车里走出三个首长，其中有一个人直接朝我走来。走到我跟前，他向我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我万没有想到司令员会这样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来到这里，我真有些手忙脚乱起来。”司令员问：哪个部队在防守这个地段？我们有多少挺机枪，能不能顶住敌人？波兰白军显然发现这里来了个大首长，直往这里打炮。我当时真是万没想到，司令员会这样年轻。我们已经习惯看那些比较老成的司令员。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司令员，却是一个年轻人，简直是个小伙子，当时他年仅27岁……”

1920年7月14日，加伊的骑兵在第一六四旅的协助下占领了维尔诺。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开幕式那天，西线部队占领了戈罗德诺和巴拉诺维奇。

……让我们回顾一下进入彼得格勒的情景吧。在那里，在塔夫利奇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天正给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作报告。形势是复杂而艰难的。虽然西线捷报频传，但弗兰格尔在北塔夫里亚不断发动进攻战役，马赫诺匪帮正蹂躏着乌克兰。英、法为了援助皮尔苏斯基，以武装入侵相威胁，在波罗的海上等待着不列颠舰队的到来。

国家需要大批粮食和日用品。彼得堡的工人把旧驳船劈成木材，准备过冬。数以万计的、长期忍饥挨饿的人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忘我的工作，至少要设法给幼儿园筹备一些燃料。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目睹了这一切，对彼得堡无产阶级的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感到惊奇。

代表会议开幕那天，在通往塔夫利奇宫的施伯尔大街上旗帜飘扬。街道两旁排列着彼得堡工人的纵队，人群里响起了乐曲声。而在涅瓦河畔，当天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场面一召开革命大会，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参加。这个大会象征性地显示了资产阶级战胜中世纪的封建主，而无产阶级战胜了世界资产阶级。会后，施放烟火、点燃火炬和鸣放礼炮。

举国上下所殷切期待的，是列宁的报告。

凡是当天有幸到塔夫列奇宫大厅去的人都记得，代表和来宾们是怎样齐声高呼和以衷心祝贺的鼓掌声欢迎列宁的。我们从上面看到宏伟的大厅，看到主席团，也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副显然对持久掌声不太满意的表情。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面前站着这样一位伟人，他是率领人们实现人类宏伟理想的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工农国家的奠基人。彼得堡人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和高呼声，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想念伊里奇！""你离开彼得堡很久啦！"

列宁开始报告了。在听众面前逐渐地展示出一幅战后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图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报告中有肯定，有证明，有争辩，他的讲话通俗自然、开诚布公和分析透彻。他时而离开讲台走到一旁，时而又返回去，翻阅自己的手稿。当他提到机会主义者的时候，讲话的口气时常带着讥讽的腔调。但是他从来不怕他射出的箭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我举的这个例子有些滑稽可笑，"他说道，"不过，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正是如此，它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就已经成了滑稽可笑的事了。"

在这座宏伟的大厅里，在代表中间，有的人持怀疑态度，有的人甚至不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但是，就连他们也感到惊奇和敬佩。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最使他们感到震动，因为列宁从不盲目乐观，而且也从不用这种精神去安抚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图哈切夫斯基在西线指挥的七月攻势，给欧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假如波兰人后来称他们在维斯瓦河的反攻是"奇迹"的话，那么，苏军的神速攻势便是更大的奇迹了。连衣服和靴子都穿不上的红军战士，在国内战争年代里经历了艰难困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粉碎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波兰白军。在法军和英军司令部里，又谈论起了红军的力量和图哈切夫斯基。这个人的名字，在他战胜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以后，就早为人们所熟悉了。

红军逼近华沙。七月底，波兰资产阶级和政府乱成一团。

皮尔苏斯基在他的《1920年》一书中，承认当时波军及其后方岌岌可危的处境："在乌云压顶、雷雨交加的处境中，民心动摇、军心涣散。国家摇摇欲坠，危机四伏。"

但与此同时，西线军队愈接近华沙，那种反对红军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愈恶毒。波兰的统治者竭力把红军的解放斗争，说成是外国的入侵。皮尔苏斯基用遏止不住的花言巧语，把图哈切夫斯基的进攻和1830年帕斯克维奇沙皇将军的进军等同起来。然而，时代不同了。白色波兰成了沙皇俄国的继承人，而苏维埃军队却为工人和农民的解放而战斗。波兰工人运动的元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费里克斯·科恩、捷而仁斯基、温什利赫特、马尔赫廖夫斯基等人，一再提醒说，应该重视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

无产阶级、波兰工人的情绪，当然是不同的。沙文主义者的这种富有煽动性的花言巧语，对他们没起多大作用。在华沙接连发生意想不到的罢工。但是在工人中间，有少数人上了沙文主义者花言巧语的煽动宣传的当，甚至当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苏联政府同意不攻打华沙，不索取赔偿军费，进行和平谈判时，波兰政府和协约国仍不愿媾和。

西线统帅部制定了进攻华沙的计划。8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签署了强渡维斯瓦河的命令，并给突击集团下达了深入包抄华沙的任务。

8月11日，总司令在电话里宣布，必须将第十二和第一骑兵集团军调到北部，支援西部战线。图哈切夫斯基也认为这是必要的。

维斯瓦河交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3日至15日，苏军在华沙和莫德林的接近地进行了激烈的进攻战斗，取得了战果；第二阶段，敌人转入反攻，在8月16日至25日的战斗中，迫使西线军队向东方撤退。

波军向北部和东北部的进攻，给苏军第四集团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态势。波军力图将它和主力分割开，并将它封锁在但泽走廊之中。

8月17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下，西线军队开始从维斯瓦河撤退。

这次撤退，要求有超人的体力、大无畏精神、勇敢和坚定的意志。

第三和第十五集团军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集中全力支援第四集团军通过纳列夫和东普鲁士边界之间的狭窄走廊。但是，第四集团军已经无法拯救了，因为它的大部分部队在途

经德国边境时被扣留。不过，敌人也筋疲力尽，无力继续进攻了。

皮尔苏斯基在他的《1920年》一书中，对西线军队的大无畏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说他们两天内抵抗了波军来自西部和南部的两次突击，其中第四集团军作战"象狮子"一样勇猛。

加伊关于这次悲惨进军的回忆录，读起来使人心情无法平静。

他写道："战士们光着身子，赤着脚、饿着肚子，几天来没有见过面包；没有弹药，只有一把马刀。他们一心想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回到自己的家—红军队伍……"

加伊使用的语言，是感人肺腑和充满激情的。他准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和他的士兵的经历。

"我走遍了军里的每个团队，号召他们要坚信胜利……在《国际歌》声中冲向敌人。'我们同意突围，加伊同志。我们跟你走，但是我们没有子弹可以射击了。''战马不行，我们就徒步走。'我们回答说……

"我们在电台上整整呼叫了一夜，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4时，我命令参谋长烧毁一切作战文书、命令和电码。8月26日4时40分，我们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烧毁了电台，很多人热泪盈眶，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通过了国境线。

"第三军的战士们以忘我的精神援救了步兵。这个军为了紧密配合其他步兵师的行动，为了援救集团军溃散的部队，最后，自己损失惨重。"

这真是一群铁打的英雄汉。他们的子孙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捍卫了自己的祖国，严厉惩罚了法西斯匪徒。

想到加伊在斯大林搞个人迷信时期惨遭陷害，死于非命的情景，心情怎能平静，怎能不充满义愤。

当我们翻阅那些同波兰白军交战的有关文章和回忆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弄清华沙城下败北的原因。波兰的历史学家和白色波兰的盟友曾喧闹一时，称之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

造成这种“奇迹”的原因，是我们缺少战略预备队和装备低劣。

契尔纳文写道：“可以说，集团军是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条件下挺进的，而这对战役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库林写道：“即使未来的军事历史学家……面对着行程六百俄里，后方铁路中断，没有象样的运输工具，射击弹药奇缺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六个星期不间断行军的事实，也将会惊叹不已的，因为这是战略上的反常现象。”

普特纳也和加伊一样写道，战线首长过分要求战略原则服从于政治见解，其表现就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而不顾我军在布哥河上的状况仍继续进攻。

舍身忘死的红军战士，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争夺拉季明城郊筑垒地带的战斗中，红军战士不顾付出巨大损失，直接爬上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障碍，单凭自己的果敢，迫使敌人放弃散兵壕。战士们超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高级统帅部的意志一这一切就是战局的特征。难怪在现代人和战争参加者的著作中，常常使用“毅力”这个词。即使我军被迫撤退，也动摇不了苏军统帅部的毅力。“毅力”这个词，就是在主要敌人皮尔苏斯基的著作中，也经常发现。他关于西线司令就是这样写的：

“仅就那些且战且进的漫长的行军而论，就足以使那支

军队和它的领导者引为光荣。尤其是不该把司令员列为中等人才和平庸之辈，因为搞这类军事工作，他的毅力和精力，意志和才干，是绰绰有余的。”“……每一个历史学家，每一个研究人员，都会向他祝贺这次行军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对波兰白军的胜利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凡尔塞和约若是破坏了，波兰和欧洲的历史无疑地也就会按另一种形式来写了。

西线的作战的情况，无论在国内国外，都被写成了好几本书。图哈切夫斯基的《进军维斯瓦河》一书，便引起不少著名军事活动家操起笔来，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的《在维斯瓦河上》和后来1920年任西南战线司令员的亚·伊·叶戈罗夫写的《利沃夫—华沙》便是例子。

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对西线1920年的战争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西线即使是我们对波兰白军展开斗争的主要方向，但毕竟只是一个局部……”。对西线的这种情形必须作出估计，既要从整个战争全局的高级指挥的角度出发，也要顾及其他各条战线的作战情况。“因此，我们拿起笔来，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也不是要贬低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能够响应战友的号召，从来都是欣慰的事情。”

沙波什尼科夫的书，是1924年问世的。写这本书的时候，西南战线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恐怕对作者还没有什么影响。这部书所反映出来的对波兰白军作战评价方面的不同论点，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就存在的。

关于1920年5月攻势，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样写的：

“一切都说明，波军已经作好转入进攻的准备。为了保

持我们的阵地，不让波军将我们的主要集团牵入他们挑起的行动当中，我们自己必须由防守转入进攻。”

沙波什尼科夫认为，进攻的真实原因应该在“精神领域里”找最恰当，也就是说，缺少对自己部队能坚守防御的信心，所以才首先发起进攻。他写道，这次进攻遭受了挫折，在乌克兰战线上并没有明显地削弱波兰白军的力量。沙波什尼科夫接着还责备图哈切夫斯基不善于使用预备队和没有协调好各兵种的行动。

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1920年任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这样一来，又产生了另一个争论：究竟维斯瓦河战斗的失利是谁的过错。这个问题，也牵涉到他。虽然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种“热情”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学习打仗本不该“缩手缩脚”，况且他是竭力想证明（据克劳塞维茨所说），进攻力量会逐渐削弱，而图哈切夫斯基并没有发现“进攻的顶点”。沙波什尼科夫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问题在于依靠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来发现进攻的顶点。”①

图哈切夫斯基承认西线军队的消耗和消弱，但同时他们的意志是坚强的，并不惧怕敌人。“我们的不断进攻，使波军的士气消沉……波军后方逃兵四处溃散，对救援不抱任何希望。大家都向后跑，连一点激烈的战斗都经受不住。

“假如我们在波兰边境停步，我们可以巩固后方，整顿一下进攻的军队，可是，这将使波军赢得更多的时间……”

接着，图哈切夫斯基又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对波兰的支援：“再经过需要用来安顿我们工作的两三周时间，那时，我们迎战的敌人将更会远远比我们强大。在使波军遭到震动

① 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卷第783页。

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力，也应该继续进攻。”

在这方面，图哈切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之间，就所谓的“撞击战略”发生了有趣的争论。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现在宽大正面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到处都以同样密度进攻。勇敢的战法，必然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集中大量军队，而在次要方向只留少量兵力。

假如主要冲击集团配置在正确的方向上，那么，敌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转入进攻，对这些力量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求之不得的。对一个进攻的胜利者来说，敌方表现得越积极，他们只会感到越高兴。因为他们便有可能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主要兵力，并给予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

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撞击战略的思想。

沙波什尼科夫表示反对，他认为：“现代兵力非常灵活，他们完全胜任‘机动作战’，而且不只限于一个方向上的运动。”

图哈切夫斯基承认，在战斗失利的原因中还有一条，就是技术兵器不足。“在短兵相接的时刻，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主要兵力，正兵分两路成直角，”他写道，“西线向维斯瓦河转入进攻时，就已经事先注定了战役的失败。”

当西方面军军队向维斯瓦河挺进时，最高统帅部曾给西南方面军下过一道指令：为了加强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的左翼，派第一骑兵集团军前进到扎莫斯季耶·格鲁别绍夫，进而再前进到卢布林一线。第一骑兵集团军隶属西南战线，当时正在参加攻占利沃夫的战斗。

图哈切夫斯基证明，最高统帅部的这项指令本来是可以无条件执行的。但是，由于利沃夫战斗“拖住了骑兵集团军”，

使它那样晚才调整部署去执行任务，结果在卢布林方向上什么有益的作用也没能起到。

1922年，在第十二期《军事通报》上，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卡缅涅夫，在他的文章里倾向这种思想，认为第一骑兵集团军在整个战局过程中，是使用在次要目标上了，也就是说，使用在攻占利沃夫战斗中了。

这个论断，未能使斯大林满意。他尤其是对图哈切夫斯基那种论点感到不满：似乎华沙战役的失利，是由于第一骑兵集团军没有执行总司令的指令，没有加强西方面军的左翼造成的。

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亚力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作为红军杰出的统帅深孚众望。他的军事经验和对情况的正确判断，自然使他能定下正确的决心，但是，他离开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是无法下定重大决心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在定下极重要决心方面，是举足轻重的，而实质上，正是他限制了叶戈罗夫的行动和使他不明方向。叶戈罗夫不可避免地屈从了斯大林的权势。

在崇拜斯大林时期，就同波兰白军战争这一问题进行争辩时，攻击图哈切夫斯基的言论受到了称赞。把华沙战役失利的责任都加罪于图哈切夫斯基一个人。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和声望是如此之大，致使斯大林没敢对他公开表示敌意。1936年，天才的文学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风华正茂时，死于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年代），在《我们的元帅们》一文中，大胆地描写了图哈切夫斯基："世界大战时期，当他还是一个富于思考、几乎是穿着皮大衣消闲度日的小伙子的时候—他就当上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团长了，在保卫苏维埃国家

东西国境线，追赶波兰白军一直追到华沙城下，使波兰元帅感到恐惧和绝望，使欧洲的军事泰斗们同声盛赞的伟大进军中，展示了这位最伟大的战略家兼统帅的光辉天才。”

斯大林对不利于他的事，历来耿耿于怀，在记忆这些事情方面具有罕见的才能。他没有忘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评价。科利佐夫的这篇文章，成了激怒斯大林的理由之一。而这种不满，后来就变成了仇视的情绪。这一切，在图哈切夫斯基死后，这位天才作家也以悲剧而告终。

顺便说一句，这一切，正是由于斯大林的罪过造成的。他置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列宁和1920年8月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的，总司令关于调遣第一骑兵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以及第十四集团军指令于不顾，迟迟按兵不动。

究竟为什么不执行指令，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早在8月2日，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提议，将在西方面军编成同波兰白军作战的几个苏联集团军联合起来，而同弗兰格尔作战的部队组成一支独立方面军。列宁将此事已用电报通告斯大林，并建议他只抓弗兰格尔的事。

在8月5日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苏军于8月16日前进入华沙。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也相信进入华沙是有把握的。但是使他感到担心的就是左翼的形势，因此他坚持要将第一骑兵集团军、第十二和第十四集团军配属给西方面军。

8月12日和13日，是决定性的日子。8月11日3时下达了指令。指令中直接提到，将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配属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在该电报结尾处只带了一句“望答

复”。13时35分又补发了那份指令，但口气是绝对的。

8月13日，图哈切夫斯基报告总司令：

“……没有骑兵集团军，我们无法应付局势……情况要求我们必须马上接纳南部集团军，因为拖延使我感到忧虑……。”

斯大林和叶戈罗夫在亚力山大罗夫斯克提出建议：“将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几个骑兵师全部立刻集结到普罗斯库罗夫地域，在那里组成机动集群，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准备应付罗马尼亚的进攻……另一方面，将第一骑兵集团军集结起来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允许其就地驻扎，作为骑兵加强克里木地段的最近出发地。”

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这个回答，完全是玩忽总司令的指令的，是对抗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的。关于这一点，叶戈罗夫可能不知道，但斯大林是知道的。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没等总司令答复，就下令强渡布格河和攻占利沃夫。

当叶戈罗夫最后下令将三个集团军调给西方面军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示威性地拒绝签署，并将此通知了总司令。

这样一来，斯大林不仅没有执行总司令的指令，而且也把自己放到与中央委员会及其全体会议1920年8月5日决议的对立面(应该说明，斯大林给总司令的关于拒绝签署将三个集团军调拨给西线的电报，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

对斯大林的这个行为应该怎样理解呢？他是不愿意把所有的桂冠都戴到另外一个人的头上的，他竭力想争夺胜利的桂冠，哪怕占领一个利沃夫也好。按照他的想法，西部方面军

应当与西南方面军平分秋色，共享战果。(斯大林的这种贪图虚荣的欲望，由于利沃夫周围的几次战斗毫无战果，当真使第一骑兵集团军“陷入窘境”而落空了。)

总司令的作战命令就这样没有执行。没有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的签署，命令是无效的。

最后，经电报联系，命令才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签了字。一直到8月16日晚，第一骑兵集团军才接到命令。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报告，说集团军已通过布洛河一线，部队已抵达利沃夫的接近地。集团军已接受任务，8月17日拂晓前攻击利沃夫，因此，无法退出战斗。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不了解总司令的意图，也被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切地说，是被斯大林搞得稀里糊涂，看来，那是出于他的私利而有意违抗调遣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命令，由此也就更加延误了这一调遣令的执行。

8月16日和17日，部队转入进攻。其在杰姆布林(伊万格罗德)地域集结的突击集群，突破了摩泽尔集群的防线。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部于8月17日前未能占领利沃夫。图哈切夫斯基为了麻痹敌人，命令第十二集团军在赫尔姆地域继续进攻，而第一骑兵集团军集中全力，在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地域集结，准备突入敌突击集群的后方。

直到现在，当波兰的反攻威胁破坏着华沙战役的时候，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部也没有停止它在利沃夫城下的行动。

弗·德·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他的《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中，直接引证了列宁关于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拟想出来的纵深迂回的一段话：“呶，谁会经过利

沃夫去华沙呢？”

直到8月20日，第一骑兵集团军才向北部开进。但已经晚了，西线司令员已下达撤退命令。

开始曾为苏联军队雄伟进军所惊愕的西欧，如今兴高采烈了。法国将军魏甘称红军的撤退为新的马尔纳，《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把这个功劳也记在法国教官的名下。

1920年10月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奇迹”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当进抵华沙的时候，我军已疲惫到那种地步，他们再没有力量去取得下一步的胜利了。而在华沙用爱国主义热潮支撑的波兰军队，感到在自己国土上作战，得到了支援。得到了重新前进的力量。看来，战争本来给我们提供彻底打败波兰的可能性，可惜，在决定的时刻，我们力量不足了。”

1920年10月12日签订和约，对波兰来说，条件比战前苏维埃政权同意的稍为不利一些。“当时定的边界线是向东50俄里，如今是向西50俄里，”列宁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贪得无厌，结果现在这次和约是在比当初拟想提供给他们更少的领土条件下签订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进军维斯瓦河》讲稿中大胆地承认，同资产阶级波兰的这场战争，我们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战略上失败了。

假如历史上没有对华沙失利的歪曲和多年来一直攻击图哈切夫斯基，而在他身后这类歪曲竟又变成了恶意中伤的话，关于同波兰白军作战这一章，到此也就可以结束了。

1920年9月1日，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解除了斯

大林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任命谢·伊·古谢夫接替他的工作。列宁十分关注加强军队纪律，并坚决制止高级军事机关违抗命令的现象，不管是谁作出了这样的事情。图哈切夫斯基由于他坚持要将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调遣给西方面军。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撤免斯大林的原因。在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曾经不幸惹过斯大林不满的人，一直都感到受他的歧视。图哈切夫斯基了解这一点。只有一次他非常生气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因为梅里科夫提出了不公正的指控，可结果是杳无回音。

图哈切夫斯基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叶戈罗夫写《利沃夫—华沙》一书歪曲1920年事件而抱怨他。在叶戈罗夫诞辰五十周年那天，图哈切夫斯基祝愿他“一旦苏联的敌人侵犯我国边疆，便会取得军人的最大幸福”。可惜，无论叶戈罗夫还是图哈切夫斯基，都没能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保卫祖国。他们两位都成了专制独裁的牺牲品。

纵然华沙失利，列宁仍一如既往十分信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建议任命他做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军队司令员，尔后，又派他去平定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匪帮的叛乱。

从结束同资产阶级波兰的战争到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段时间，对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来说，只是一段短暂的间隙。

列宁的重托

——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

1920年深秋，从弗兰格尔手中解放了他的老巢——东南重镇克里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家都觉得和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放晴的碧空又飘来几朵乌云，人们的希望落空了。1921年3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事件。

关于产生这次叛乱的原因和背景，列宁同志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

“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年成不好和牲畜死亡，那本来就因战争和封锁而万分困苦的灾民生活状况，达到了严重的地步，结果就产生了一般小生产者所‘特具’的政治动摇。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通过翻阅40年前的文献、报刊资料及目击者的大量回忆文章，使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史实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

1912年2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乘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立足未稳，利用天灾人祸使部分人产生的动摇心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斗舰上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抛出了他们的政治纲领——“自由苏维埃”、“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由于他们鼓惑人心的宣传，使得塞瓦斯托波尔主力舰的全体船员赞同了他们的纲领，并通过了反革命决议。

了解到上述情况，3月1日，中央派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喀琅施塔得停泊场上，召开驻军群众大会，并

发表演说。会上，有人一再干扰他的发言，不少人起哄，喊反动口号。加里宁被迫返回彼得格勒。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了。一直躲在幕后的叛军首领彼得利钦科，第一次在决议书上签名亮相。其背后，露出了一批过去沙皇手下的将军和军官的狞狰面孔，外国干涉者也蠢蠢欲动。

考虑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宣布特别戒严令，并下达作战命令："打退敌人可能的进攻，及其妄想渗入河岸的一切企图。"与此同时，为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伤亡，于3月3日凌晨，在克伦要塞政委的率领下，政工干部和党校学员撤离喀琅施塔得。

暴乱者的司令部由原沙俄的科兹洛夫斯基将军和舰队的一批原沙皇军官组成。一些无党派分子也参与了他们的叛乱活动，为白卫军充当了垫脚石。这个反动司令部和国外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利用外国的舆论工具，例如在法国报纸《马丁》上，就不断发表有关喀琅施塔得暴乱的消息。3月4日，叛乱分子为蛊惑人心，进行政治欺骗，散发了一份号召书。号召书威胁说，政府要象"宰小鸡一样"枪毙所有官兵，不管是否参加了叛乱。因此号召所有的人与政府血战到底……与此同时，他们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H·H·摩兹明，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以及许多不愿与叛乱分子同流合污的共产党员。

情况万分紧急。3月5日，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给第七集团军司令员发去一份电报，副本抄送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国总部沙波什尼科夫和海军司令员涅米茨。电文如下："……恢复第七集团军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保留原职务，并临时代行第七集团司令员的职责。彼得格勒军区所

有部队，以及军区司令员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全面'隶属图哈切夫斯基领导。"

这项任命，赋予图哈切夫斯基的权限是很大的。这说明彼得格勒军区的军政首脑对叛乱束手无策。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波尔特是图哈切夫斯基早在谢苗诺夫团的老同事。1921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曾在西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过，在斯摩棱斯克工作时，经常见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这次季波尔特和西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一道，陪送图哈切夫斯基到彼得格勒去担任第七集团军司令员。

当谈到图哈切夫斯基在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的巨大贡献时，季波尔特说：

"图哈切夫斯基抵达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时，那里是一片慌乱。他们害怕叛乱分子登陆；把司令部搬进了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图哈切夫斯基立刻下令将首长司令部搬回原来驻地——皇宫广场上过去的总部大楼。图哈切夫斯基想以这个命令来增强司令部工作人员对取得当前战役胜利的信心，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

司令员委托季波尔特迅速挑选有关海军要塞防御问题的军事科学专业书籍。作战准备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顺利。图哈切夫斯基脸上的忧虑消失了，两眼又放射出愉快的火花。

3月6日，图哈切夫斯基命令向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宣布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警告"。工农政府决定："你们应立即将喀琅施塔得和叛乱舰船归还苏维埃共和国管辖……凡持枪反对社会主义祖国者，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本警告为最

后通牒。”

3月7日傍晚，同志们仍持枪在办公大楼里值班。一些人等待出发去奥拉宁包姆；另一些人准备去吕瑟尔堡。最后通牒期限已过。全体在大厦院内集合，等待出发令。在死一般的寂静里，清晰地听到了炮声轰鸣。红丘炮台在射击。这是叛乱分子的回答。战斗打响了。

3月8日起了暴风雪。大雪封地，对进攻很不利。只好在强烈炮击和机枪扫射下，通过12公里海湾的冰面，去直接攻战要塞和城市。

进攻是夜间发起的。冰面坚硬，但由于不习惯，战士们畏冰甚于惧敌，在一些地段上进攻受阻。特种使命团的第一和第二营，总算突入市区，但敌人的榴弹射击阻止预备队接近。学员营的兵力比叛匪的兵力弱，他们由于无援而撤了下来。

北方集群攻占了一座炮台，但遭到敌炮台猛烈射击，由于伤亡惨重，也被迫撤回陆地。

对叛乱的喀琅施塔得进行的第一次攻击失利，主要是使用的兵力较少，而部队从冰上战场对海军要塞进攻的战备训练不足。

这次失利，还是给准备新的进攻提供了经验。指挥部必需采取和陆地不同的、适于冰上进军的另一种战术。步兵加紧冰上作战的训练。向冰面派出哨兵，侦察部门研究了作战地点，研究了科特林——喀琅施塔得岛和各炮台的接近地。

增援部队——新的学员支队，步兵部队和特种重炮兵都来到了。

在军内和后方，都展开了政治工作，使每个人都清楚地

认识到暴动的反革命性质，尽快消灭叛匪，已成为共同的愿望。

正在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320名代表全都来到前线，他们之中有伏罗希洛夫、布勃诺夫，以及久经战争考验的指挥员伊万·费季科，扬·法布齐里齐乌斯，尤利·萨布林，帕韦尔·德边科，维托夫特·普特纳，亚历山大·谢佳金。

第七集团军在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带领下，进行了全面攻击的准备。暴风雪连续不断，这给全面攻击带来了困难，可是，无论指挥员还是普通士兵，为了加速进攻都在积极作最后的攻击准备。

全国人民都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进展。

3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和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谈话："彼得格勒，3月8日。'红军指挥员'栏的编辑，同集中掌握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作战领导权的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谈了话。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说，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冒险行为，与其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军暴动没有区别。每个步骤所使用的口号和采用的活动手段，都是老一套。冒险行为之相似，遍及各方面，直至叛乱领导人的个性，无不如是。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恰恰如此，他历来标榜自己在他的同事中间是最有军事才干的……可是，从喀琅施塔得发出的所有公告表明，那里是一片混乱。叛匪的思想混乱，在水兵之间分配粮食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几乎每艘舰船都争吵的不欢而散。……喀琅施塔得……在忍受饥饿。本来这对谁来说，都

不算什么秘密，喀琅施塔得和其他城市一样，由于近来的粮荒和燃料不足，无论燃料和粮食，都只好按日配给，因为没有贮备，也指望不上有贮备……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叛乱，也只有象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这样愚蠢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去干……”

“这种情况，再加上我们的指战员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工作，信心百倍、士气高昂地进入战位，而喀琅施塔得还要防止本身后院起火，因此，可以说粉碎叛匪就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第一次攻击喀琅施塔得的失利，使叛匪、白俄侨民及其外国同伙兴高采烈，使那些保皇黑帮跃跃欲试。甚至连原亲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梦想有朝一日会骑上一匹白马，回到他莫斯科城的官邸。

“由于列宁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工农群众之心，共产党员在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苏维埃政权的威信越来越高，革命的敌人便企图排斥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操纵在自己手里，于是才抛出‘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以便把革命政权的机关变成他们影响群众的媒介，利用苏维埃机关的威信，实现他们反人民的阴谋。”① 但是，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

图哈切夫斯基司令员同大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战略形势，认为必须尽快平定叛乱。要趁芬兰湾冰封的有利时节开始攻击，以速战速决。

3月15日深夜，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下达命令：

兹定于3月17日凌晨，以神速攻击占领喀琅施塔得要

---

① 赫鲁晓夫1963年3月8日，在会见作家和艺术家时的讲话。

塞。为此：

1） 3月16日14时开始炮击，直到傍晚。

2） 北方集群各纵队于3月17日3时出击；西方集群各纵队4时出击。

3） 北方集群攻击城市西北部；南方集群攻击城市东北和西南部。

4） 各集群只限占领最妨碍行动的炮台。

5） 南方集群司令员应指定一名在喀琅施塔得指挥巷战的总的负责人。

6） 南方集群司令员必须注意及时占领科特林岛的西北部。

7） 各纵队的行动必须保持绝对准确。……

3月16日14点整，南北两岸的全部炮连，向喀琅施塔得发起轰击。叛乱分子占领的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炮台，开始还击。入夜后，双方停止射击。两岸和喀琅施塔得一片火光。

浓雾笼罩在海湾上空。稍事休整后，部队于3月17日3时，身着白色伪装服踏上冰面。暴风雪在呼啸，脚下积满了雪。

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计划，南方集群以混成师和第八十旅的两个纵队，在П·Е·德边科指挥下，向军港和彼得格勒大门发起进攻；第廿七师第七十九旅的两个纵队在普特纳指挥下，向南部炮连和城市南部发起进攻。

北方集群，学员团在卡赞斯基指挥下，向"托特列宾"炮台发起进攻，其左翼纵队穿过北部炮台的散兵线，从东北部前出到喀琅施塔得。

就这样，发起了军事史上空前的从海湾冰面上向海军要

塞的攻击。红军战士、学员、水兵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肩并肩地冲向前去。

叛匪用探照灯照着冰面，但灯光在浓雾中消散了。当探照灯的光束划过进攻纵队时，大家都趴在湿漉漉的雪地上和从冰下冒上来的冰水中。尔后站起来又继续前进。通信兵在拉着电线，沟通冲击纵队与部队司令部之间的联系。雪橇运着机枪，离第一冲击散兵线半公里，预备队在跟进。

3月17日晨5时许，先遣部队与叛匪的先头警戒遭遇上了。

经过激战后，第十一师第三十二旅通过了铁丝网障碍物和火力封锁的开阔地，在彼得格勒大门以北突入了市区。学员团穿过彼得格勒大门投入战斗。预备队冒着猛烈的炮火前去支援战友。

南方集群左翼纵队此时已攻占——系列南部炮台，它的先遣部队已突入市区。但是敌人发起了反攻，迫使我先遣支队后撤。纵队的另一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南部炮台。

不出集团军司令员之所料，进行了艰苦的巷战。几乎每个窗口都在射击。攻击部队不熟悉喀琅施塔得的地形，他们难于判定方位，伤亡很大。

在炮台上也展开了激战。叛乱者向攻击部队发射霰弹。学员们突破了铁丝网障碍，叛乱者用燃烧弹炸开水面，于是学员们只好在炮台脚下止步。而右翼集群第一营通过爆炸后仍保持完整的冰面，投入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40分钟。拿下了第六号炮台，接着，第五和第四号炮台也都缴了械。

另一个来增援喀琅施塔得作战集团的营也冲入市区，并与因横穿冰面进行巷战而弄得筋疲力尽的混成师会合了。

16时，叛乱者再次转入反冲击，迫使进攻部队撤至冰面

边缘。

在这个紧急关头，第廿七师骑兵团和彼得格勒共产党员支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来支援。20时，在从奥拉宁包姆赶来的一个骑兵炮兵排的支援下，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从曾经进行过激烈较量的沙面街道上，清洗了全部叛乱者。

北方集群的学员们从东北方向通入市区。

夜12时，电台收听到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上发出的讯号：水兵已起来反对军官，准备投降。与此同时，议员们从汽车和地雷学校发出公告说：所谓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已逃向芬兰湾，留下的叛乱者准备放下武器。

3月18日11时，红色的军校学员登上"塞瓦斯托波尔"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的甲板。

喀琅施塔得回到了工农共和国的怀抱。

由于在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的卓越功绩，战斗结束后，他立刻应召到莫斯科见列宁去了。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身边的人听他讲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怎样热诚地接待了他。对这位第七集团军司令员的战果非常满意，并在谈话当中立刻委任他去平定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匪徒的富农暴动。

1926年，《战争与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与反革命暴乱作斗争》一文。

看他是怎样写的吧：

"……1921年初，汪洋大海般的农民群情激愤，工人阶级则被连年不断的战争和饥饿弄得疲惫不堪，在这危机四起的

时刻，喀琅施塔得事件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军各部队很快集结了起来。任何拖延迟缓，都可能造成丢失喀琅施塔得。总的来说，我们的部队在叛乱分子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和掌握防御要塞的技术兵器之前就赶到了。”

“在组织向喀琅施塔得的战略集结方面，文章作者认为有一个缺点：‘不是每个部队都取得同样的战果。’”

图哈切夫斯基写道：“由于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到来，才挽救了局势。”按照他的习惯，他没有突出个人的功绩。但是，在研究第七集团军领导的作战经验时，大家确信，这次战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果是辉煌的。

这是1935年8月列宁格勒一个少见的炎热天。这座城市显得格外的雄伟，格外的壮丽。但是，人们心情沉重：这天，喀琅施塔得市民埋葬7月25日由于“Б-3”潜艇发生不幸事件而牺牲的水兵。

墓地座落在青翠的树丛之中。在等候追悼大会开始之前，我们在林荫道上漫步，读着大理石和花岗岩上的碑文。我们看到十字架和舰锚，那是些海军上将、海军上校的墓地，相隔不远处，有一些不太高的红色的“金字塔”——那是喀喀琅施塔得社员的墓地。日期几乎都是“1924年”，“1921年”。那正是红丘炮台叛乱、尤登尼奇进攻和攻击喀琅施塔得的年代。

追悼大会一开始，由图哈切夫斯基致悼词。他说：“我们正在创建强大的海军，它的潜艇力量，足以保障我们的国家免遭来自国外的任何攻击。……我们必需不断改善技术装备，掌握技术兵器，使它常备不懈，成为对付我们敌人的严厉的战无不

胜的武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讲话是那样诚挚感人和雄辩有力，致使我们每个人听了，心情都非常激动。数千名喀琅施塔得市民都在屏息恭听。

在我们面前，有一块用新挖的土培起来的长方形场地，在那上面停放着五十五个红色的棺材。每个棺材上放着一顶水兵的无沿帽。

当图哈切夫斯基在悼词的结尾，向死者家属转达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慰问时，他的声音颤抖了起来，脸上苍白无色。

他讲完话后，奥尔洛夫和其他同志也都讲了话，尔后鸣礼枪，大会就此结束。

傍晚，我们返回列宁格勒。喀琅施塔得逐渐消失在银灰色的夜的暮霭之中。岸上的奥拉宁包姆城显得越来越近了。公园里的树木只留得一个昏暗的轮廓，有的别墅的窗口已亮起了灯光。

“在这附近的一个别墅里，设置过我的指挥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又回到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年代。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严厉谴责了彼得格勒的领导，及其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季诺维也夫总是谨小慎微的，接受中央的指示总感到头痛。大家都熟悉，他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尤登尼奇进攻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我觉得，完全可以避免流血，起码可以尽早地在叛乱伊始就将其平息。而彼得格勒保卫委员会认为，依靠他们手头的力量可以对付得了。而且对叛乱分子发出那些毫无

分寸的号召，不着边际的威胁：'你们再抵抗下去，就把你们象杀鸡一样全部杀掉！'在这里，扯杀鸡干什么？结果造成人员很大伤亡……使很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伤的伤，亡的亡。他们都是挺直了身子冲上去的。当然，这对红军战士是个鼓舞，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讲话的声音不大，也不急促，但很有分量，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正是军事工作的特点使他养成了谈话时的自持能力。

"列宁说，叛乱是小生产者、农民政治上动摇的表现。早在1919年和1920年，军队内部，水兵中间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粮食分配不均引起的。水兵，特别是农民出身的水兵，对粮食征购队十分反感，共产党员当然保持了坚定的态度。但是无论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在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战斗中，表现得都很勇敢……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使我感到意外。这是革命的堡垒呀！……令人感到痛心哪！"

"令人感到痛心哪！"图哈切夫斯基两次三次地重复了这句话。

从喀琅施塔得的攻击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了。不久前，我看到在银幕上还出现1921年3月18日在喀琅施塔得拍摄的、我亲身经历的文献影片镜头。那些往事又重现在我的眼前："塞瓦斯托波尔"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炮击的痕迹，胜利者返回彼得格勒，有些战士还穿着白色的伪装服……

这些在军事史上首创攻击海上堡垒的战士，表现了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党的鲜花——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走在战

斗的前列。"共产党员们向前冲啊！"——党的这一号召，鼓舞着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同代表们一道前来镇压叛乱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们！他们的勇敢、忘我精神和模范行为，鼓舞着战士们前进。苏联人民向在喀琅施塔得冰面上，和在大街小巷里厮杀奋战的英雄们，低头致敬！

那些为共产主义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永垂不朽！安息吧！

1921年，随着初春温暖日子的来临，那最残酷的灾难之一——寒冷，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雪堆都融化了。没有烟火的房子里，也感到有些暖和的气息了。

春天的小河，化雪后潺潺的奔流着。河面上倒映出城市简陋的容颜。攻占喀琅施塔得后，图哈切夫斯基来到莫斯科。他看到冷冷清清的街道，一幢幢房屋前面湿漉漉的地面，商品橱窗都钉得死死的，心里感到闷闷不乐。但是他知道，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没有停止创建新生活的步伐。文艺战线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了——人们争论着新的革命文艺问题；在音乐学院的大厅里，音乐家们正用冻僵的手指弹奏着乐曲。

所有这一切都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振奋。他热衷于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他真想在莫斯科多住一阵。可是责任却把他呼唤到一条新的战线——坦波夫省去。

国内形势并不美妙。天灾在蔓延，看样子其严重程度并不次于国内战争。饥饿笼罩着伏尔加河两岸。

1921年3月16日，在攻击喀琅施塔得前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并不掩饰，农民的不满是有极其充分理由的。我们想进一步清楚

地说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消除这种状况，要重视小业主的生活条件。”

4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莫斯科党委会召集的会议上，继续作《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联盟大厦的圆柱大厅里（这个时期什么会议都在这里开），坐满了莫斯科地区的各基层支部的书记。

列宁发表演说的那个讲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象舰船上的驾驶台一样。国家这艘舰船绕过了危险的暗礁，完成了急转弯。航船的舵柄掌握在英明的、久经革命风暴考验的舵手的手中。

“……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要放在第一位。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间的贸易；发展小工业。”

正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圆柱大厅里论说改变粮税平分办法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安东诺夫却在坦波夫省的森林里，在村镇里作威作福，并在坦波夫搞起了叛乱，其规模相当大，以至于他竟成了国内战争结束后最危险的代表人物。

列宁亲自委任图哈切夫斯基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安东诺夫匪帮。

今天有机会去坦波夫省的人，很难想象出1921年的春天在那些森林、村镇里所发生的情景。当年，红军战士一到那里，村镇里一片疑虑的寂静，农舍门窗紧闭，农民们侧目而视，投来敌视的目光。

人们给安东诺夫起了一个绰号，叫坦波夫匪帮。他在临时政府当政时，由于屠杀基尔桑诺夫市的布尔什维克而臭名昭著。他曾任县警察局长，在城里称王称霸，胡作非为。十月革命后，他成了逃兵和富农子弟组成的土匪的头子。安东诺夫分子

袭击地方苏维埃机关，野蛮地杀害共产党员和征粮员。安东诺夫分子有自己的政治部门，他们的行动口号是社会民主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他们还私设“革命”法庭，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而且还杀害那些努力从事和平劳动的农民。安东诺夫招募了近五百名叛匪，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集团军，下设团。安东诺夫甚至还有内卫部队。

地方力量无力对付安东诺夫匪徒，所以才把图哈切夫斯基派到坦波夫省那去。安东诺夫分子通常回避与正规部队交战。他们的战术是采取偷袭的办法，吃掉较小的支队，而后躲进森林和荒僻的村庄。农民掩藏他们，富农出于同情，贫农则出于畏惧。

识别安东诺夫分子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侦察员在城里很是猖狂，一有针对他们的措施，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安东诺夫分子为了逃生、拒捕，能在每个村庄换马，办法就是抢夺农民的马。这当然使农民愤慨。尤其使他们愤慨的是安东诺夫对他们搞动员，他组织动员往往以“劳动农民联盟”的名义搞枪杀相威胁。

派来镇压匪帮的独立骑兵旅旅长、国内战争的英雄科托夫斯基命令将从安东诺夫手中缴获的马匹退还给农民。这个措施深受村民的赞扬。

图哈切夫斯基用他那特有的坚定风格撰写的说明，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次同安东诺夫分子作战的意义。他的说明言简意赅，令人信服：

“……抽出一个可靠而坚强的专门的小队，其任务是不间断地跟踪追击和进逼匪帮，使其无处安身和休整，更使其无法扩编。一句话，这个小队要象水蛭一样咬住匪帮，不让他们睡

觉、休息和有补充力量的余地。”

在这次作战中，第一次使用了小汽车和载有轻重机枪的轻型货车。匪徒门无法摆脱汽车小队的跟踪追击。

在茨纳河岸的森林中，有特种猎击队在活动，他们造成了一种使安东诺夫分子难以招架的局面。

图哈切夫斯基的作战行动和苏联民政工作紧密配合。为了同安东诺夫匪帮进行斗争，建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委员会由老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负责领导。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在坦波夫地区业已造成的与农民的复杂关系有透彻的见解。在那里，他代表苏维埃政府、代表人民政权、促进坦波夫省安定下来。集团军司令员、省党委书记、党执委主席和契卡① 主席都同他和睦共事。

不出几周，匪患便彻底被清除了。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于粮食税的总结报告中提到了坦波夫省的情况。当时，正是与安东诺夫匪徒斗争最激烈的关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在这个省业已形成的对我们不利的条件，谈到还没有下种的问题。但纵然如此，他指出那里已经开始了商品交换和“建立了合作社组织”。

在作战的同时，也采取了政治措施，而这些措施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1921年6月26日，《真理报》发布一条消息：“坦波夫，6月

① 负责治安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24日，经过两小时对射后，社会民主党叛乱头目安东诺夫及其兄弟德米特里这两名匪徒，被我国家政治保安局坦波夫分局工作人员击毙……下希良耶沃镇农民向击毙安东诺夫兄弟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图哈切夫斯基不仅是一位统帅，也不仅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且是在军事理论著作中善于提出政治见解的人。在他的《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一文中，他客观地分析了三种类型的农民暴动：一是由于破坏工农联盟而造成的（如坦波夫的暴乱）；二是由于边境匪患引起的（如白俄罗斯暴乱）；三是属于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暴乱（如费尔干暴乱）。

在分析坦波夫地区叛乱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写道：这里的"匪患是破坏工农联盟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在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尤为复杂。工农联盟遭到破坏，将导致苏维埃政权机关被排挤出农村，代之以地方农民政权，而这种政权几乎一概被白卫分子所把持……此类政权之秘密存在和工作，它们同秘密存在的土匪武装力量相勾结，极大地增加了跟农民暴乱作斗争的困难……因此，为了平息农民暴乱，除军事行动之外，必需广泛地开展政治运动，阐明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军事行动应与政治经济措施紧密结合和交错进行，因为政治经济措施有助于说明，并在发生暴乱的农村中贯彻执行那些以此为基础的各项措施。"

消灭安东诺夫匪帮，是图哈切夫斯基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

南征北战　所向披靡

列宁是知人善任的。自从他亲自找这名第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沙皇军官"谈过话以后，就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年轻有为、思路敏捷、头脑清醒、勤奋好学、知识面宽，而且政治上也比较开朗，立场也比较坚定。于是立刻委以重任，让这位"中尉连长"去组建第一革命集团军，当司令员。这副担子委实不轻。事实充分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图哈切夫斯基不仅组建起了第一革命集团军，在东方面军司令穆拉维约夫哗变时，他非旦没有同流合污，而且进行坚决斗争，经受了严峻地考验，表明对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赤胆忠心、在战场上也是百战百胜。在南线告急时，列宁又建议派图哈切夫斯基去南方面军，担任第五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南征北战，席不暇暖，坚决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取得了赫赫战果。难怪西方军界称赞这位年青的司令员是"军界的神童"和"泰斗"。红军中少有的"常胜将军"。

1918年夏季，苏维埃政权处境艰难，危机四伏。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占领了全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列宁正是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决定采取将苏维埃共和国转变为统一的军营的重大措施，并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

同年7月1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设红军和全民接受军事教育的决议。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广泛

利用旧军队军官出身的许多军事专家的经验和知识的问题。制订了组建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崭新原则，这是史无前例的，与以前所有武装集团截然不同。这支军队的一切都是新型的：崭新的官兵关系；崭新的纪律；崭新的条令等。党和列宁派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到军队中来，他们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此外，红军里还吸收大批旧军队出身的军官同白匪作战。在列宁的关怀下，对这些弃暗投明、真心实意拥护红军的旧军官是充分信任的，并委以重任，比如旧军官加缅涅夫担任红军总司令；旧军官出身的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第一批授元帅军衔的五位元帅，其中四位都在旧军队中服过役。

列宁为了坚持吸收旧军事专家参加建立红军的事业，是经过相当艰巨的斗争的。比如，大家都知道，1918年秋天，他就遇到了来自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方面的强大阻力。他们对于军事专家毫无根据的不信任。当时，这几个人参加了刚建立不久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提出要求解除南方面军司令员瑟京职务，因为他是过去旧军队的将军。列宁没有迁就他们的错误意见，结果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瑟京、梅霍诺申和列格兰组成，而斯大林被调做其它工作。

对于军事专家的不信任，后来也反映在某些党的军事干部，即所谓的"军事反对派"的发言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列宁认为"军事反对派"力图提倡的"集体指挥"，是向游击习气的倒退。"现在，首要的是应当有一支正规化的军队，必须建成一支有军事专家在内的正规的军队。"

图哈切夫斯基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去组建第一革命集团军的。当时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和骚动之中，此

时此刻，只身奔向东线，真是凶多吉少。

图哈切夫斯基去东线的途中还碰到这样一个插曲：图哈切夫斯基启程时身穿一件蓝色军便服，下身穿一条破旧的马裤，裹着绑腿，脚蹬一双粗笨的大鞋，人很消瘦，但身材匀称端正。他挤在嘈杂的人群中间。车站上的人群直到深夜才渐渐疏散开来。可这个年青人一直呆在那里，注视着来往车辆。夜间巡逻队员认为他行迹可疑，走到他的身边，严格检查他的证件。

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有礼貌地、不慌不忙地从背包中取出1918年6月列宁亲自签发的命令。

"兹介绍莫斯科地区政治委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去东方面军司令穆拉维约夫处从事组建红军高级兵团，并担任指挥该兵团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除去这份文件之外，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给穆拉维约夫的一封信里还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M·H·图哈切夫斯基是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军事专家之一，应当委以前线最重要、最负责的职务。

1918年6月27日，图哈切夫斯基来到第一革命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因萨车站。一如自己整个战斗活动中一贯坚持的那样，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去了辛比尔斯克省委。

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瓦列伊基和基莫夫，对这年青的共产党员印象很好。他简明扼要、信心十足地谈了自己对前线的形势，对他将指挥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的看法。他对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是以信任战士的革命热忱，信任党的思想力量为基础的，这使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

组织深感满意。

但是，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从图哈切夫斯基1921年出版的《革命和战争》一书回忆1918年的第一集团军中，可以了解这些困难的实情。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接收的是些什么样的部队呢？

“这支部队尽管建立不久，但无论指挥员，还是战士都很能打仗……不过，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差，比较散漫……”这并不可怕，图哈切夫斯基充满信心地指出，只要采取正确而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具有革命气质的红军战士，是很容易听从指挥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回忆录里，给穆拉维约夫所作的评价很有意思。他写道，穆拉维约夫的特点是：极度的虚荣心，非凡的勇敢精神和鼓动士兵群众的能力。就军事而言，穆拉维约夫理论上很弱，几乎是一窍不通。但他熟悉拿破仑的战争史。要“做拿破仑”的思想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他的一切举止、谈吐和所作所为，无不流露出这一想法。他不善于判断情况。他的“空洞计划”常常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根本不会，尽抓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甚至去拨弄几个连队。有时候会去讨好红军战士，为了博取他们的爱戴，可以让他们不受惩罚地抢掠和奸淫妇女，采取这些最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做法。

穆拉维约夫过去是旧军队的中校，临时政府时期，他拼凑了几个所谓“突击营”；后来，投十月革命之机，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在国内战争初期，象穆拉维约夫这种类型的人为数不少。这些冒险家不相信任何革命，但他们也不肯跟白军走，因为他

们认为在那边高级的职位难以到手，将军老爷和他们的心腹们早就把肥缺填满了。而在红军这边还值得冒一下险，能捞到一官半职。

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第一革命集团军司令，就隶属于东方面军，恰恰在这个冒险家手下工作。

看来，早在图哈切夫斯基到达因萨车站之前，穆拉维约夫就已经在酝酿反叛了。他腐蚀、瓦解部队，纵容他们酗酒，唆使部属顶撞上级。他要弄那些硬充好汉的打手，用小股部队去冲击白军坚固设防的瑟兹兰，使他们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从辛比尔斯克车站给穆拉维约夫报告中写道：

"……瑟兹兰陷落了。昨天就想开始全力进攻，可是您不准装甲营行动，其结果，就是我方向乌索尔耶和斯塔夫罗波尔的进攻，只有微弱的步兵部队参加。再也不可能有人象您那样束缚我的独立性了。我在现场，究竟应该怎么办，我最清楚。您只要给我任务，那么他们是一定会完成的，但您无须开处方 那是无法忍受的。难道说全世界的军事史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吗？您简直是在代替我指挥，甚至在代替我的师长的指挥……我认为情况一点也不危险，但还必须准备重新去占领瑟兹兰。我想我们必须见见面……"

信是写完了，但事态发展得很突然，且又急速。

穆拉维约夫投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营垒。莫斯科爆发了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叛乱。这时，穆拉维约夫认为他配合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决定把水兵和红军战士拉走。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不

少士兵愿意跟他走，他仿佛已经接触到了，拿破仑的三角帽和行军时穿的那件灰色的披风。

作为旧时的军官，穆拉维约夫心想图哈切夫斯基过去既然是禁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中尉，无疑会跟着他走的。

可是，事与愿违。集团军司令员在回忆录中写道：

“穆拉维约夫坐船来到辛比尔斯克。我被他喊去作汇报，可是刚一到码头，就被逮捕了。穆拉维约夫把我逮起来之后对我宣布：‘我举起了起义的旗帜，我要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签订和约，对德国宣战。’他说这一番话时，眼睛里散射出火一般的神经质的光芒。穆拉维约夫的暴动就这么开始了。随他一起来的红军战士糊里糊涂地受了他利用。他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跟着穆拉维约夫走，把他看作老‘苏维埃勇士’。驻防在辛比尔斯克的装甲营，也就是根据这样的理由转到穆拉维约夫一边去的。当穆拉维约夫去包围苏维埃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红军战士是想立刻把我枪毙的，但当时有几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被捕，我回答他们说：‘就因为我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说：‘我们不也是布尔什维克吗？’就这样谈起话来了。”

出于谦逊，图哈切夫斯基简单地叙述了，他在穆拉维约夫司令部所在地的“仲夏”号快艇上遭遇的惊险情景。他说：穆拉维约夫向他宣布哗变计划时，他当即指出穆拉维约夫是叛徒和变节分子。于是图哈切夫斯基被押送到一列停在死岔道上的车厢里，他跟红军战士谈话就是在这里。那几个战士都是拉脱维亚的步兵。

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布尔什维克，那么你们要懂得穆拉维约夫已经叛变了苏维埃政权。”

这几个步兵走到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嘀咕了一阵后便把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放了。其中一人还护送图哈切夫斯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在他身边当传令兵。

这次事件，是衡量图哈切夫斯基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忠诚程度一次严峻考验。

要是穆拉维约夫的叛乱得逞的话，情形便会严重地复杂起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枪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穆拉维约夫挑拨性地向德国宣战，很可能导致德国卷土重来，而年轻的共和国对此缺乏准备。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那一夜，莫斯科忧心忡忡。已经寂静下来的城市里，清楚地传来一阵阵对射的枪声，接着又是三英寸口径火炮的轰隆声。到凌晨时，一切又都平息下来了。那些寄希望于反革命政变的人，大失所望。“算了，就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上台也好。”穿着已拆下肩章，即留着印子的军官大衣的先生们，在门洞里低声耳语。

这些人渐渐无影无踪了，他们或者去了顿河一带，或者上乌克兰找他们的盖特曼“殿下”去了。

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列宁表现出了超人的毅力，大无畏的精神和明察秋毫的能力。军队在前线开始紧急调动，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立即投身部队。

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获悉穆拉维约夫叛变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控制了局面。他们给红军战士解释叛徒穆拉维约夫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那时，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并不很强，不过是三百名共产主义部队的战士，一支卡尔·马克思国际主义部队和几百名武装工人，但这些是准备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

穆拉维约夫被宣布为叛徒，共产党人费多尔·伊万诺夫接替了穆拉维约夫的走狗别列奇的职务。辛比尔斯克战斗舰艇部队（后来的伏尔加分舰队）政治委员列夫·别尔林，临时担起了指挥二百名波罗的海水兵的工作。

在省执行委员会议会大厅里，瓦列伊基斯和前来作解释的穆拉维约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约·米·瓦列伊基斯自己是这样叙述这些事件的："穆拉维约夫开始不安地揣测可能我们这方面在作着某种准备……看来，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某种对他不利的东西，于是他说：'我去，我去安抚一下部队。'他调转身子，迈着士兵那种常见的罗圈腿步子，向门边走去……"

穆拉维约夫没有活着从辛比尔斯克苏维埃大厅里出来，他被枪毙了。他的卫队和追随者们一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缴了械，这一场危险的反革命冒险行动，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他却留下了使人痛心的后果。对军事专家、沙皇军队的军官的信任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穆拉维约夫叛变以后，红军战士中间，又漫延开了所有过去的"金色肩章佩带者"，是否都会叛变的怀疑情绪。有关于逃逸和叛变的谣言不断传来……有的部队，甚至开始撤出战斗了。这是白匪军所以攻占辛比尔斯克的原因之一。后来重新夺回这座城市（列宁的故乡），曾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只是由于政治委员们，集团军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忘我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才避免了集团军的瓦解。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对旧军官在组织军队的工作方面，给以帮助是绝对必要的。

还在1918年7月4日，在辛比尔斯克就曾颁布过军官动员

令。应该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军事部门的首长曾给旧军队出身的军官分发过退役证，上面明确写着："准于退役，直至再次征召。待遇恢复参军前原状。"

这个，"恢复参军前原状"，对于许多军官来说，就意味着去操持五花八门的职业。第一革命军参谋长尼·伊·科里茨基，遇到过不少熟识的军官在干车夫、擦皮鞋、当会计和装配工、皮靴匠、裁缝等。有一个将军在做芥末，还自己出售。大部分人从事这些行当，是出于穷困，也有的是示威性的，有意识地给苏维埃政权抹黑。

后来，终于把军官们从"恢复参军前原状"中召回来了。七月间，辛比尔斯克和奔萨动员了一千二百名旧军队出身的参谋军官和指挥军官。妻子们都替丈夫的命运捏着一把汗。谣言四起，说什么军官将被枪杀，什么"动员令"充其量不过是消灭"阶级敌人"的圈套而已。但军官们还是到兵役委员会去了，他们填写了履历表，见到了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司令员神态端庄，言谈得体，举止亲切。奔萨的动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军官们都熟识图哈切夫斯基，都到他这儿来寻找保护，只要他们忠于职守，是决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

实际上，必须重建第一支正规化的军队，因为这支军队面临着一场与白军的战斗。

集团军司令部任命了二百五十名受到动员的军官。

关于组建工作的这段情节，后来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集团军的纪念日》一文回忆道："我们那儿完全没有发生勉强将军们去服从中尉或者上尉的事情，……建立了革命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攻训练……就开始了"。

穆拉维约夫的叛乱被平息之后，过了几天，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会见了刚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政治委员的瓦•弗•古比雪夫（后来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古比雪夫对年青的集团军司令员影响很大，一位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和一位年青的共产党员、统帅之间的深挚友谊，由此奠定了基础。政治委员古比雪夫和卡尔宁加强了集团军司令员的威望，恢复了红军战士对司令部人员的信任。他们看清了图哈切夫斯基对党、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片忠心，高度评价他的组织才能，但又善于适时地、委婉地指出他同那些年轻人一样常犯的诸如急躁情绪一类错误。

不管谁只要一生中有机会接触一次古比雪夫，他就会永远受到这位和善、聪明、谦逊的人，这位列宁式的国务活动家的感召。图哈切夫斯基很幸运，因为古比雪夫是他的第一任政治委员。

这是一个高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坐过牢，遭过流放，把自己的整个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俩人的命运有着某种相同的地方。古比雪夫是鄂木斯克武备中学的毕业生，喜欢音乐，唱歌和诗歌，年轻时自己还写过诗。

但是对于年青的集团军司令员来说，主要的是他和古比雪夫的那些促膝长谈，他们谈论革命，谈论革命的崇高目标，谈论党。古比雪夫在困难时刻给同志以体贴、以友谊的支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博学深知，使年青的图哈切夫斯基钦佩得五体投地。对他来说政治委员既是尊师，又是朋友，也是战友。

古比雪夫喜欢图哈切夫斯基，因为他并不追求红军战士廉价的威望，不骄纵他们，不讨好他们，对于蛊惑煽动，他决

不姑息。集团军司令员待人诚恳，处事适度，因此赢得了战士和指挥员们的心。一旦发生争执，他竭力以逻辑性很强的证据说服对方，但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却既坚定，又不妥协。

图哈切夫斯基比起许多军事专家来，情况稍为有些不同。他是共产党员，虽然年青，但总归是个党员，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赢得红军战士的信任。

有一张那个时候的照片保存下来了，上面有第一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穿着军便服的瘦削的年青人，从衣着上看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丝毫没有区别。从他那一对富于表情的大眼睛里可以看出好深思熟虑的禀性

列宁号召指挥员、政工人员和红军战士学习军事，不仅要到指挥员训练班和军事学院去学习，而且还要直接从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学习。图哈切夫斯基忠诚地恪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遗训—他不仅自己学而不厌，而且诲人不倦。

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旧军队里所受的训练是很有限的，充其量也不过指挥一个连的那点本事，但现在却指挥着第一革命集团军，他要采取断然的决定，分析复杂的政治形势，并周密地制定向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敌人发起坚决进攻的计划。这是未来统帅的最初几步。倘若把图哈切夫斯基1918年指挥的几次战役规模同后来的战役作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他的成长过程。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对他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最大。正是在这里积累了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尤其在游击习气尚未消除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不仅要对一般战士，也要对指挥员想方设法进

行教育，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可是，对于政工人员来说，要找到能够打开红军战士心扉的决窍，特别都打开那些被动员来参加红军的农村小伙子的心扉的决窍，可实在不那么简单。哪个政工人员要是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把政治文件发到士兵们手里，那他就能听到一些不体面的闲话，而且会看到红军战士嘲弄似地把这些东西往裤兜里一塞，“拿来卷支烟抽抽到挺合适”，或者随随便便地说上一句：“我要那玩意儿干啥？我可不认字呀！”

应当同战士们开诚布公地谈心，话要说得让人信服。他们会提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应当直截了当，明白易懂的回答他们，譬如关于没收投机小贩粮食的“阻截部队”问题，关于征购余粮的问题。工人是城里人，他们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这一点对农民就得做详细的解释，而且还免不了要碰钉子。

战士们常常等报纸，看是不是登了列宁的演说或者文章。曾经给红军战士念过列宁的文章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那千百双如此专注神往的眼睛，以及人们屏息聆听的那一片肃穆寂静的景象。

图哈切夫斯基找到了打开战士心扉的钥匙。

自从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来，许多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曾经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战友指挥下战斗过的红军战士纷纷来信，真诚地、非常质朴地讲述了他们与集团军司令员会见时的情形。有一位内战时期的老兵舒米洛夫斯基写道：“是呀，那些年可真困难呀，人们受尽折磨，精神上惶恐不安。我从十七岁起到二十二岁参加了国内战争，几乎走遍了整个俄国，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到基洛夫，又从基洛夫到鄂木斯克，从鄂木斯克到佩列科珀和锡瓦什……”

写信人悲戚地写到个人专断的受害者，写到在迷信斯大林时期丧生的军事领导人：“……我们都记得，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为组建军队，整顿纪律做了多少工作呀。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受命把一份公文送给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我虽然很年青，但1917年时我已在塔什干教导队受过训，所以士兵的规矩还是懂的。我是骑兵。当时司令部设在农民的茅舍里，我按部队规定，先征得允许之后才进了屋。我敬了个礼，报告说送来一封公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接过公文。我又敬了个礼，转身朝大门走去，但刚跨过门槛就听到：‘红军战士同志，请回来。’我回过身来。他对我说：‘请坐。’又问我是哪儿的人，在哪儿学习，在旧军队里呆过没有，还谈了纪律问题。这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贴心的谈话。他看了看表，让我走了。我很快站了起来，敬了个礼。当我跨上马背时，看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还站在窗口望着我。事隔不久，来了一道命令，要了解所有的红军战士，谁曾在旧军队服过役，什么军衔，谁曾在教导队受过训，每个人的文化程度怎么样。原来选拔指挥员的办法给废除了”。

据许多同时代人，一起共事的同志证实，图哈切夫斯基在红军指战员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记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长，而且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人，因此大家都很信赖他。此外，他口才极好，在群众大会上他的讲话总是充满年青人特有的热情。

图哈切夫斯基攻读列宁的著作，专心地学习他的文章，

谛听他的讲话，渐渐地成了一名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图哈切夫斯基之所以能成为统帅，并不是他在旧军队里，在沙皇的军队里，包括军事学校的三年经历，而是他在红军服役的二十年的生涯。在这方面，许多同志——职业革命家，列宁的学生，都曾给过他不少的帮助。

正如上文所叙述的，1918年夏季，共和国的主要战线在东部。这条战线的集团军始建于1918年的6月。

第五集团军就是在1918年8月由与捷克白军和白卫军在喀山战斗的几支队伍组建而成的。

捷克白军的部队在兵力和武器上都超过红军，他们迂回过先吉列伊，对辛比尔斯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于7月22日攻占了该市。

在通往辛比尔斯克的东侧接近作战的红军退入吉列伊地区，在那里，加伊把这些部队统一了起来。后来，加伊成了著名的铁师师长。再以后，他当了骑兵第三军军长。

白军攻占辛比尔斯克之后，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7月29日通过了加强东部战线的决议。东线决定着革命的命运。

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在当地只留下最低数量的武装力量，把最好最坚定的部队抽出来去消除东线的危机。共产党人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动员大会。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都派出五分之一的人力到东线去。迄至1918年底，将近二万五千名共产党人到了前线，这就大大加强了部队，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

从东方面军司令员，后来是总司令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缅涅夫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有关红军的突击方向首先应该指向哪里，其次又指向哪里，这些问题都是由领

导国家政治的那些人确定的，也就是由中央委员会、由列宁确定的，能否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能否进一步歼灭白卫军的问题。

事实上，“大家都到东线去！”的口号，就表明在当时首要任务正是要消灭这条战线上的敌人。即使南方暂时失利，也未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改变这一决定。虽然那时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瓦采季斯要求往南方战线调运部队，但他仍然坚持集中全部力量去消灭东线的高尔察克。

在那些日子里，图哈切夫斯基全力以赴地在组建第一革命集团军，他要把它训练成善于进行正规战役，而不是只去应付偶然袭击的部队。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第一革命集团军发展的最初阶段时……写道：“指挥设备一无所有，集团军的战斗编制谁也不知道……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住在列车上，他们打的是所谓的‘列车战’”。

这种情形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担心。

1918年8月初，司令员收到莫斯科拍来的一份电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命令，就第一集团军至今仍然住在车厢里，而没有转到战场上去的原因，作出报告。立即采取措施，把部队从火车上撵下来。让部队自己去搞辎重”。

这份电报，生动地表明列宁多么关注东部战线的形势，他对重新组建的集团军的弊病了如指掌，他知道只有机动才能在野战中取胜。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国内战争并不是“小小的”“内讧”，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反对红军的一场严重的战争。要打这样的战争，就必须有一支阶级性强、纪律严明、善于机动、组

织良好的军队。

任务是繁重的。一定要弄到交通工具，要组织好武器和辎重的维修，组织好部队粮秣和被服的供给。一切都要由集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古比雪夫和卡尔宁，以及司令部去统管。

这是一个很团结的集体，图哈切夫斯基依靠的就是这个集体。要是没有它，要战胜供给充足，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是不可能的。

中央委员会和列宁领导着作战和加强东线的工作。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落到了实处。苏维埃军队在坚定地准备进攻，准备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把他们从伏尔加河流域赶向东去。

8月11日，前线指挥部命令各集团军司令坚决进攻辛比尔斯克、喀山、萨马拉、叶卡捷琳堡。

9年9日，第二集团军解放了喀山。9月12日，第一集团军解放了辛比尔斯克。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经过周密构思，实施的一次战役。

图哈切夫斯基，政治委员、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卡尔宁和东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科博泽夫，从进攻开始那天起，就在加伊的师里。集团军司令员不仅根据地图研究了地形，而且乘车、骑马、徒步侦察了辛比尔斯克的接近地。在发起进攻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和加伊师长一起彻夜选择炮兵阵地。

部队接到把白卫军推逼到东边去的命令。

乘轮船赶来的第五集团军的部队，使交战赢得了胜利。他们会同第四集团军的部队，一起逼退了敌人，辛比尔斯克受

到的威胁消除了。

1918年8月30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罪恶的暗杀活动，激起了红军战士的愤怒，使他们胸中燃起了向革命敌人复仇雪恨的烈火。

东部战线的战士，辛比尔斯克的英雄们，在拍给列宁的电报中写道："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攻克您的故乡，这是我们对您这次受伤给敌人的回答，下一个将是萨马拉。"

列宁在复电中表示："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最好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尼·伊·科里茨基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第一集团军占领辛比尔斯克之后，他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所见到的情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询问战役进行得怎么样，他每天都收到战报，对前线的一切了如指掌。列宁问到红军战士的生活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吃到热饭，伤病员多不多。

"辛比尔斯克的情况怎么样？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满城尽是花园……花园遭到破坏没有？……子弹能保证吗？炮弹呢？武器都够用吗？……鞋子怎么样？军队可是还要往东开进，到严寒的西伯利亚去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鞋子的供应不足时，想起伏尔加河一带出产一种极好的树皮鞋，于是他建议赶紧准备搞这种鞋子，还派科里茨基专门成立一个保障军队毡靴和树皮鞋的特别委员会。

辛比尔斯克战役的结果，表明集团军能够进行难度大而

快速的机动。

第一革命集团军实施了瑟兹兰战役，从辛比尔斯克方向突击了捷克白军的后方，旋即如战士们向列宁所表决心那样，发起了萨马拉战役。

1918年10月3日，列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发了一封信：

“我们的军队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分子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和巩固。地基已经打好，应该赶快把高楼盖起来。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一支百万大军，现在我们需要三百万人的军队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

在经济遭破坏，饥饿，贫穷的条件下，这项决定是很有胆识的。图哈切夫斯基是坚信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

瓦·弗·古比雪夫是这样评价第一集团军司令员在组建集团军工作中的作用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游击习气尚盛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军史新时期的代表。”

此后，第一集团军又完成了一系列光辉的战役，占领了奥伦堡、奥尔斯克，不过那已经是在加伊的指挥下了。

1918年11月初，南线告急。

1918年11月26日，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加强南线的命令：“……苏维埃共和国受到的威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严重，这样危急。最近几周内，我们的军队一定要在各条战线上，首先是在南线，竭尽全力展开进攻”。

1919年1月，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在东线作为集团军司令员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南线第八集团军司令员。

当仔细地翻阅国内战争时期那些极为罕见的文献资料时，总是免不了会大受感动。写着战斗命令的这一页页粗糙的灰色纸片，何止是阐明事件的文件，它们是特殊的稀有珍品。这一张张画满着日期、号码、签名的纸片，会勾引起人们无穷的回忆。仿佛又见到了穿着历经风雨的旧大衣的部队，见到穿着直领制服、军便服、工作短服的战士，穿着皮上衣的指挥官，骑着不同毛色马匹的骑兵；玻璃被打碎、正面墙壁上留着斑斑弹痕的车站建筑，挨过炸的铁路桥，轮船上扯起的大红布旗帜，车皮上贴满了棕色包装纸印成的号召书的暖棚车……

只要拿起第八集团军司令员M·H·图哈切夫斯基用化学铅笔书写的战斗命令，他那英勇的形象顿时会活现在眼前。那明快而清晰的笔迹，就准会发现那手指在使铅笔时是用足了劲的，命令是复写的，而且可能同时复写了两份。这里还有一迭厚厚的粘在一起的电报纸带，直通电话记录纸，这些文书都保持一个格式，由“您好”起头，“祝诸事顺利”结尾。

这一切都使人鲜明地感受到英雄时代的风采和气息。

1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来到第八集团军。1月21日，集团军接到解放顿河上游一些城镇的任务。

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掌握有关敌人行动的确切情报，并时时督促部属“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胡乱猜测的现象”。

他给参谋长特罗申提出怎样把火炮运过封冻了的顿涅茨河去的具体忠告；他建议利用雪橇，在上面架上火炮发射平台，以均匀地分散冰面所受到的压力；他还建议发挥滑雪能

手的作用，让步兵乘上大车。

3月7日，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拂晓开始坚决完成我的总攻命令"。3月8日，集团军司令员指示维申军区革命委员会为集团军准备马车和牛车，"这些车辆只应由富农和有钱人家承担。"

这项指示充分反映出共产党员的军事首长对国内战争的阶级性是非常明确的。

白卫军在南部和东部同时发起进攻，居然又使高尔察克直起了腰杆。

东线告急，图哈切夫斯基因有在伏尔加河一带作战的经验，他又被调到东线去了。

1919年3月24日，图哈切夫斯基到了东部战线司令部。古比雪夫认为他是红军史上新时期的一位代表。游击习气盛行的时代终于过去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游击队的某些队长，以至后来的某些旅长和师长，都不大愿意学习军事。

1919年春天，当图哈切夫斯基来到东部战线时，经党和军内共产党员的努力，游击习气盛行的情况大体已经结束了。正规化的工农红军在与白军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它已经能够去执行广泛的战役计划，实现统帅的企图了。

协约国俄国北部地区司令长官艾伦沙德将军得到的指示是：

"1)喀山和维亚特卡应当由西伯利亚集团军（指高尔察克集团军）占领。军队集群将于北线开始进攻，以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部队会合。

"2)集团军(指高尔察克的西线集团军)将占领从喀山到萨马拉的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军队集群将于南线开始进攻，

以与顿河方面保持联络。

“3)随后，这些部队将向莫斯科发起进攻……”

这就是协约国的如意算盘。存在着高尔察克的部队突向伏尔加河的危险。尤登尼奇在向彼得格勒进攻。各种反革命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在立陶宛，在白俄罗斯和在北方，都蠢蠢欲动。苏维埃共和国的确已成了一座四面受敌的堡垒，也正是在这一时刻，领导共和国国防的布尔什维克党，其中央委员会和列宁，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4月11日，中央委员会赞同列宁根据东线形势，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几千名共产党人开赴东线，工会动员了六万多名工人，也开赴东线。

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也来到了东线。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曾与高尔察克频繁交战的第五集团军的司令员。

伏龙芝是党的杰出人物之一，是在阶级搏斗中久经考验的革命家，1905年的义勇队战士，莫科斯十月战斗的积极参加者。在这里，在东线，他的统帅和组织家的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图哈切夫斯基深感幸福：在第一集团军时，他结识了古比雪夫，跟他一起共事；现在，命运又把他和伏龙芝联结了起来。古比雪夫、伏龙芝、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满怀感激之情，称这些光荣的革命家为自己的朋友——他向他们，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宽阔的政治视野。这对他作为统帅，以至后来作为军事理论家，是极有裨益的。由于他们的帮助，他逐步地明确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和党组织在红军中的作用和意义。认

识到离开他们，要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领导好军队，是办不到的。

他们，这些朋友们，十分善于委婉地纠正这位年轻战友的毛病，及时地告诉他："你可不能这样呀。"

经常接触党的著名活动家，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年比一年更深刻地理解，并掌握了列宁的做人的工作，以及领导军队的作风的特点。

图哈切夫斯基负责指挥这个集团军。在正面的两个侧翼，是第二集团军（司令员瓦·伊·绍林）和第三集团军（司令员谢·亚·梅热尼诺夫）。

在绵延1800公里的正面作战的部队，共计十余万步兵和骑兵。3月初，高尔察克集结了约十三万至十四万五千步、骑兵。第五集团军当面的敌人，是白军中最强大的汉任将军的集团军，拥有将近五倍的优势兵力（五万步骑兵）。

3月14日，高尔察克的人马，占领了乌法城和去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的铁路线必经之地的奇什梅车站，东线的中心地区被突破了。

1919年3月2日，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加缅涅夫，古谢夫向总司令瓦采季斯报告："第五集团军正面的情况极其不利。敌人已包围了第廿七师的左翼……第五集团军司令员为解除这一包围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1919年4月4日，图哈切夫斯基到了克罗托夫卡车站，接过了因与白匪军作战弄得精疲力竭的第五集团军的指挥权。1918年入夏以来，该集团军被迫退却，伤亡巨大，弹药不敷，部队指挥遭到破坏。在一份报告里，参谋长叶尔莫林报告："司令部正在打退敌人的冲锋"，由此足以看出问题之严

重程度了。

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友，第五集团军第廿七师师长普特纳，是这样描述东线形势的：

“3月末4月初这段时间，是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战斗中度过的。撤退时一片慌乱，兵力实在太少……到4月底以前，我们眼看着马上要被赶下伏尔加河去了。白军离伏尔加河只有两三站的路程。党大声疾呼：‘大家都到东部去！’”

4月中，白匪军的胜利达到了顶点，他们离萨马拉总共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也不过100公里了。

倘若白军攻克萨马拉，那他们就占领了东线的整个右翼。苏维埃各集团军撤过伏尔加河，就意味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将会合，这对共和国的命运是极其危险的。

4月10日，东部战线各苏维埃军队重新组建，编成了一个由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集群，和一个由著名的苏联军事首长、过去曾是旧军队上校的瓦·伊·绍林指挥的北方集群。南方集群包括现在的第一、第四、第五集团军，以及土耳克斯坦集团军，北方集群则包括第二和第三两个集团军。

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在东线遇见伏龙芝以后，很快就对他的高超的军事才能，组织能力作出了切实的评价。伏龙芝对于国内战争的看法，比军事专家更深刻。正是这一点，使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们可以从《米·瓦·伏龙芝在国内战争前线》这本文件汇编中，找到关于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通过直通电话交谈的史料。那是1919年的4月。从图哈切夫斯基接手指挥第五集团军那天起，只过了十来天。布古鲁斯兰正遭高尔察克的攻击，布古鲁斯兰眼看着将陷落。伏龙芝为了加强第五集团

军，竭尽了一切努力，给他们派去了增援，不时提出一些建议。这一切都做得十分委婉，对他们不失敬重，同时又毫不含糊。图哈切夫斯基在答复伏龙芝时，丝毫不隐讳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认为能守住布古鲁斯兰"。伏龙芝说："只要您能在布古鲁斯兰一线坚持住，下一步的战役，就会由于道路泥泞而暂时停下来。我在制订总的指令时，将注意到您的意见。"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4月12日。同月20日，又接着谈了一次。图哈切夫斯基报告说：

"河冰已经融化，地里的雪也不多了。我专门骑马去察看了一下道路，虽然我对当地的地形不太熟悉，但我想关于两周以内无法作战的意见，是不确实的，因为在我看来，即使有些困难，几天以后道路是可以通行的，而我希望在一周以后能打一些大仗。"

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描述了前线的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军暂时比我们还强得多，他们的部署已经形成，而且看来已最后确定下来。因此，我希望在下周能打几场果敢的战役……"

读者已经知道，图哈切夫斯基是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下接手第五集团军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图哈切夫斯基在自己的活动中，依靠的是经过考验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他们是：布留赫尔、沃斯特列佐夫、普特纳、哈哈尼扬、埃赫、博尔恰尼诺夫、叶尔莫林、盖利特、马季亚谢维奇、伊瓦西耶夫、拉平等人。这些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在大清洗中几乎全都被枪杀。

5月29日，列宁发出电报："辛比尔斯克。东方面军革命

军事委员会。古谢夫、拉舍维奇、尤列年夫。

“根据你们的坚决要求，让加缅涅夫复职了。如果我们不能在入冬以前占领乌拉尔，那我认为革命将不可避免要失败。把一切力量都调动起来。请你们将加缅涅夫和司令部之间的每次摩擦，都及时地用密码电报告我。你们要更加关心增援部队，要把前线周围的居民逐个逐个地动员起来，要注意做好政治工作。请每周用密码给我发来一份小结。把这份电报读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彼得堡的工人听。收到此电后即复我。要加倍重视动员奥伦堡哥萨克的工作。你们负有责任，要使部队不致瓦解，士气不致沮丧……列宁。”

南方集群司令员伏龙芝和方面军司令员萨莫伊洛之间的分歧，得到了圆满解决。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就这样重新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员。

加缅涅夫第一次指挥这个方面军，是从1918年的9月28日到1919年的5月5日，托洛茨基一道命令把他撤了下来；他第二次的任命是5月25日，那是当他返回莫斯科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一次话以后的事情。

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满意地欢迎加缅涅夫重返东线。

伏龙芝主张迅速打一场夺取乌法地区的战役。夏伯阳的第廿五师受命夺城。第五集团军第廿六师应当占领白河渡口。

在这里，在乌法城外，白军搞了一次“心理战”冲锋，他们挺直了身子，以密集队形冲过来。冲锋被打退了，白军伤亡惨重。

夏伯阳师在第五集团军第廿六师的支援下攻克了乌法。

这样，就为解放乌拉尔和整个东线转入总攻创造了条

件。可是就在这时，总司令瓦采季斯在托洛茨基支持下，建议停止白河上的进攻，就地设防固守，抽掉部分兵力去南线打击邓尼金。

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曾报告莫斯科，战士们求战心切，他们都认为每拖延一天，就是背叛。

6月20日，列宁在给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指示，对乌拉尔的进攻，非旦不能减弱，而且应当加强，应当加速，应当增补兵员。

高尔察克在东线的失利，迫使协约国把斗争的重心从东线转移到南线。1919年7月3日，邓尼金签署了一份所谓向莫斯科的"进军令"。

7月3日至4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建议撤销瓦采季斯的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加缅涅夫担任此职。

伏龙芝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员。

7月9日，公布了由列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这封信又一次提出苏维埃政权对待军事专家的关系问题："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背叛了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将捕获他们，枪毙他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一直在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从过去可恨的游击习气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东线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

列宁的威望，列宁的指示，再次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党组织发出指示：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

第二集团军和北方集群的任务是越过乌拉尔山，攻克兹拉托乌斯特。

7月初，第五集团军的突击群穿越过一座座山隘，完成了极其艰险的行程——三昼夜行军120公里，前进到乌法高地高原。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次来到这块边远地方。

那时候，这块边远之地乃是奥伦堡省的一部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地图上尚未出现，只有兹拉托乌斯特以自己的炼钢工人闻名于世。

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能表现在他采取了大胆的机动，但并没有选择乌法到兹拉托乌斯特的方向，而是让自己的突击群顺着荒无人烟的地形，顺着尤留赞河难以通行的河谷挺进。红军战士不得不把火炮拆卸开，用双手运过山隘和峡谷。7月2日，当第廿六师的先头部队前进到敌人的后方时，在尼锡巴什村附近与白军第十二师遭遇了。

苏维埃的部队被迫在不利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们的纵队沿山路展开，因而有被包围的危险。但第廿六师各部队表现出罕见的勇敢精神和机动能力。四个团重新作了部署，向兵力占优势的白军冲击，把他们打了下去，并继续进攻。第五集团军的第廿七师歼灭了白军乌拉尔的几支部队之后，又向第四师发起冲击。两个高尔察克的师连同被打散了的乌拉尔军，一起被迫退到了艾河一侧。

白军企图以这条河为依托，组织对兹拉托乌斯特的防御。7月10日，苏维埃军队重新转入进攻，敌人顽抗。但7月13日黄昏时分，第廿六和第廿七师的部队从南北两面攻入了兹拉托乌斯特。

敌汉任集团军狼狈地向车里亚宾斯克撤退。苏军在兹拉

托乌斯特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机车，车厢，几百万普特的煤、钢，二万普特的铜。老百姓把红军作为盼望已久的解放者来欢迎。当人们把著名的兹拉托乌斯特短剑赠送给图哈切夫斯基的时侯，他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1919年7月17日，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莫斯科报告：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在图哈切夫斯基巧妙的领导下”，经过极其顽强的战斗，越过了乌拉尔。

第五集团军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任务：解放车里亚宾斯克。

车里亚宾斯克是一座沉寂的外省小城，革命前，它仅以羁押罪犯和服苦役的牢狱而闻名。十二月党人跟在一批西伯利亚矿工之后，被送到了县辖小城库尔干。米阿斯是金矿主和开采金子的“淘金工”的城市。车里亚宾斯克附近，还有一个矿工小市科贝伊斯克，这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一座特殊的革命堡垒。

这就是第五集团军作战的战场。

第五集团军经过的地方，是150年以前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普加乔夫的队伍纵横驰骋的沙场。

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对第五集团军的周年纪念和它所受到的崇高奖赏表示祝贺：

“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相信，第五集团军的红色山鹰们定会在英雄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使自己的武器更添荣誉，使劳动的西伯利亚归还工农的俄罗斯。

东方面军司令员米·伏龙芝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尤列年夫”

正值第五集团年周年纪念之际，又收到了列宁发来的鼓

舞人心的贺信。

“一年来，第五集团军从一个不大的集群发展成了充满革命激情，在保卫伏尔加河和歼灭高尔察克部队的胜利战斗中紧密团结的强大集团军。值此建军一周年之际。工农国防委员会向红色英雄们致以同志的敬礼，并为集团军在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所付出的一切劳动和牺牲表示感谢……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1919年8月8日于克里姆林宫”

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对图哈切夫斯基在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战局中的军事胜利作出了结论：

“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克鄂木斯克为终结）中，表现出的个人勇敢，广泛的主动性，毅力，指挥才干和军事知识，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枚，以资嘉奖。”

为了表彰第五集团军的英雄功绩，并纪念它的建军周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五集团军列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红旗大厅的光荣榜。

暴风雨降临的前夜

十月革命节十六周年。红军举行盛大阅兵式。

1933年11月7日10点钟，一个将军骑着马走出克里姆林宫巴斯塔的大门。在红场中央，阅兵司令迎上前去向他报告。观礼台上，各国武官都带着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检阅司令官——副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担任检阅司令官，正值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之际，在红场上检阅莫斯科的驻军。

他的生活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同年，他荣获了列宁勋章。授勋命令写得很简短："鉴于在组织建设苏联国防事业中给革命做出了个人突出的功绩；由于内战期间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上战功卓著，以及后来在加强工农红军威力方面采取了各项组织措施……"

他从事着他心爱的事业，卓越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的功绩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他的名字博得了人民的尊敬。1935年，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批统帅中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崇高军衔①。

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的根基不牢。聪明和机敏过人的图哈切夫斯基，对斯大林的为人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想尽一

① 1935年，苏军中第一批被授予苏联元师军衔的共五人，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布留赫尔。

切办法使他对自己抱有好感。斯大林从来都是嫉妒别人的荣誉和声望的。

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关系十分特殊。1930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内战史和华沙失利再次展开了辩论。有人违背事实，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军及其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他当时，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反对那种不实事求是的指控。

同年，也就是在1930年，学院有一批著名军事专家和教授（如：斯韦钦、斯涅萨列夫和韦尔霍夫斯基等）被逮捕和流放，后来这些人虽被召回，但最后他们仍和图哈切夫斯基一样遭到了不幸。

在德国，纳粹分子欣喜若狂。希特勒上台执政，军事危机完全变成了现实。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图哈切夫斯基说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红军的技术实力也将得到发展，他说："……大家都知道，一旦爆发战争，技术兵器、装备、武器、飞机、坦克的需求量必将大大增长……仅有一个庞大的工业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发挥它的作用，必须善于将它从和平工业转到保证前线供应方面来。"

图哈切夫斯基谈到了工业动员的问题，谈到了"民用"工厂的作用问题。当他向代表大会报告生产上存在的缺点时提到："要求我们的党组织干预我们工业的组织工作，因为各工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扯皮现象。有的狂妄自大……一个工厂不买另一个工厂的账，只有党组织的干预，才能正确地协调好这项工作……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就可以动用如此巨大的技术资源，用它们去打断任何一个胆敢进犯我

国的敌人的脊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图哈切夫斯基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工作中得到了善良的朋友——内战前线的战友瓦·弗·古比雪夫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大力支持。

基洛夫被凶杀，这对图哈切夫斯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和基洛夫同志在列宁格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基洛夫为人光明磊落、精明干练，充满革命的热忱。他的性格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心悦诚服。

有一个叫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希洛夫的从1935年5月到1937年5月，一直在元帅身边从事一些特别重要的使命。在此以前，叶·瓦·希洛夫曾在机械化部队里服过四年役。当接到给军械部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当秘书的委任状时，希洛夫曾说过，他不善于搞“给首长提皮包”的工作。但不久后，他体会到，根本不是叫他去干这类事情。他随同图哈切夫斯基参加全苏和军区的大演习，到靶场参加试验各种新型武器和技术兵器的工作，制订演习计划，研究外国军事资料，担任新型野战条令（1936年版）和《大型机械化兵团作战教令》的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十分重视设计局的工作，经常接见从事研制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特别是飞机、火炮、化学武器、装甲坦克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发明家，支持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的东西。

图哈切夫斯基是改装自动武器的倡导者。当时经常求见他的有：图波列夫、航空兵主任阿尔科斯尼斯、炮兵主任拉戈夫斯基、装甲兵主任哈林斯基、化学兵主任费施曼、设计师库尔切夫斯基，以及其他设计师和发明家们。

据叶·瓦·希洛夫回忆，元帅同奥尔忠尼启则经常到莫斯科郊外的靶场去。这两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型火焰喷射器和远战火炮的作用。

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执笔撰写了《红军野战条令》（1936年版）中的几个章节。这部条令比所有野战条令（包括外军条令在内）都先进，因为它反映了实施战役的最深刻的观点。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了编写《纵深战斗实施细则》的工作。

那个时候，图哈切夫斯基还按照他的老习惯，深入抓了所谓战斗训练的“琐事”。在乌克兰大演习中，他挑选出一个步兵连进行考核。他来到指挥所，命令连长根据情况进行活动，别管他在不在场。为使连长不作难，他尽量躲在不显眼的地方，跟随一个进攻连队通过斜切地形，一直跑了好几公里。他认为每一个军事首长，都应该“在自己的肩膀上”体会一下连长、营长或团长的工作重担。

1935年和1936年，刊物上经常登载图哈切夫斯基着重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文章。

图哈切夫斯基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杜黑、海德里斯和富勒等有关军队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流派。

对各种理论经过系统研究后，图哈切夫斯基认为：“我们的组织比资本家的完善，我们能够更坚定、更果断和更忠实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1935年，他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希特勒的威胁，并证明：希特勒在麻痹法国，使它得不到扩军备战的口实；希特勒的帝国主义野心不仅在于有反苏的锋芒；而且有旨在鲸吞整个西方的复仇计划。

图哈切夫斯基对希特勒的将军麦茨沙在《现代军事科学》一书中使用的所谓“入侵军”一词，引起了重视。

图哈切夫斯基一再证明，德国军事学说已经定型，并已有物资保证。德国正在准备庞大的军事力量，首先是那种足以构成“入侵军”的军事力量。

这种思想完全得到了证实：纳碎军队入侵波兰，后经比利时又入侵法国，最后入侵苏联。

在这个时期，党加强了陆海军，使军队做好了保卫祖国的准备，而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党的忠实的儿子，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军事工作。他的演说一再号召要永远保持现代军事技术水平。

图哈切夫斯基谈了如何加强红军，首先当然是如何加强航空兵、坦克兵和炮兵的问题。他写道：“飞机的速度越快，它越不容易遭到高射炮兵的杀伤，也就越不容易遭到敌人战斗机的攻击。”

元帅关心着飞机的航程和轰炸机的载弹量，也关心着通讯器材的改善。

他尤其重视军队指挥的问题：“这项任务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内战时期已习惯用骑兵作为最快速的兵种，而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还是步兵动作。要改用新的战法，要巧妙地运用航空兵和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的快速性，并不那么简单。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要钻研战斗指挥问题，要钻研组织密切而不间断的协同动作问题。要知道，每一兵种都无法单独取得全面胜利，我们要特别着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号召各级指挥员掌握指挥各种快速合同战斗的技巧。

图哈切夫斯基在航空兵系统斯达汉诺夫分子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远见卓识地论述了航空兵训练的问题。他认为苏联航空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要经常保持高水平，就是拥有能够起飞作战的力量。即便航空力量很庞大，若是在需要的时刻不能升空，那是无济于事的。”

根据某些迹象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敌视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1935年2月，报纸上重新刊登了早在1920年7月11日已经发表过的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曾武断地说：“因而在没有消除弗兰格尔危险的时候，来谈‘向华沙进军’和泛泛地议论巩固我们的成就，岂不令人耻笑吗？”

为了这件事，难道需要再翻十五年前的老账吗？很多人都清楚，这是存心中伤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军械部部长、副国防人民委员。

在1936年1月15日召开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图哈切夫斯基作了一个关于加强红军实力的报告。

他说：“……无论在我国东部边境还是在西部边界上，那业已形成的态势都要求我们极认真地重新考虑我们的防御措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就是必须作好准备，在相距一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地进行防御……”

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指出：“为使军队常备不懈，换句话说，就是为使军队加强反击突然袭击的动员准备”，应该调整步兵兵团的数量（将原有26％的基干师和74％的民兵师改变成77％的基干师和23％的民兵师）。

图哈切夫斯基1936年高度评价了红军的军事威力。他的

看法是非常正确的："应该直接了当的说，1935年以前，红军从来不具备象现在这样可供改善机动和火力准备的有利条件。根据政府的要求，我们随时可以调遣威力强大、常备不懈的军队去抗击进犯我苏维埃东西边境的敌人。"

图哈切夫斯基说道："德国正在演练突然袭击；进行用汽车和铁路大量调动部队的训练；修建汽车公路，为汽车运输作准备。暂时这只限于从国家的一端向另一端空运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去参加各种盛典，但也是为备战服务的。"他以在纽伦堡举行的一次庆祝会为例说，"从9月9日到18日，用八百三十二列火车向纽伦堡调动了八十五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昼夜一条干线从纽伦堡只能调出六十列火车，而9月17日一昼夜就调出了一百七十九列火车。"

图哈切夫斯基接着又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在为庆祝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开办而举行的典礼上曾宣布，古老的德国总参谋部，从沙伦高尔斯特到施里芬伯爵所确定的战略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施里芬在决定向法国进军时，选择的突击地点恰好不在德法共同边界上，而是在德法两国根本没有共同边界的地点（比利时）。"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德国正在建立强大的坦克兵，"武装力量保持着大批干部。这说明德军随时准备突然入侵他国。"

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军事行动。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关注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经常找来自西班牙战场上的人谈话。马泰·扎尔卡，也就是鲁卡奇将军，后来在为争取西班牙自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在奔赴西班牙之前去见图哈切夫斯基，他们交谈了一个半小时。

走出办公室后，马泰·扎尔卡说："太遗憾了，我的时

间太少了，该出发了。不然，我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能得到多少宝贵的忠告呀！”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一些苏联杰出的军事领导人，那时候就已经相当清楚地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个什么样子，而西方列强及其军事领导人还象瞎子和聋子一样呢。这里，引用温斯敦·邱吉尔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无论法国还是比利时的战役，都没有使我真正意识到这个新情况所造成的后果——装甲车辆能支援炮兵的射击，而且能日行百里……使德高望重的老元帅贝当在法国军事思想上弄得威信扫地……”

苏联元帅谢·谢·比留佐夫在他1961年出版的《当炮声轰鸣的时候》一书中写道：“三十年代下半期在红军服过役的将军和军官，还都清楚地记得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举行过的大演习。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参加了这些演习。而且当时国内各电影院都上映了《为基辅而战》那部文献影片，任何一个懂军事的人都能发现我国军事学术的发展途径。德国总参谋部无疑从中也做出了切实的结论，广泛地运用了我们演习的经验来培训自已的部队，特别是培训装甲部队和伞降部队。

“有一次，我同制作这部影片的电影工作者交谈。他们告诉我说：这部影片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他们看到大批伞兵以及装有武器，甚至装有坦克的集装箱凌空而降的时候，感到万分震惊。所有这一切都是党、人民及其忠实儿子——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和研制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全体军事活动家集体心血的结晶。这个理论符合未来战争的特点。未来的战争正如我们军事领导

人所预料的那样，是拥有最新技术兵器的大兵团作战的战争。

“正是图哈切夫斯基以其实践活动给我国军事科学在发展新的大纵深战斗样式方面提供了根据和奠定了基础。”

阅读谢·谢·比留佐夫元帅这部著作，可以找到对希特勒军队元帅曼施坦因的答案。

“曼施坦因在被迫承认苏军这方面迅速发展了战斗技巧的同时，还竭立辩解，似乎是我们的统帅部‘采用了德国的纵深突破战术’。究竟是谁用谁的，曼施坦因理应是很了解的。使用坦克兵、机械化兵和航空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战役的理论，是苏联最先提出和创造的。在三十年代，他本人曾来我国参观过大演习，学去了这种战法。

“令人感到沉痛的教训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战友创造的理论，在他们惨遭枪杀后，也被视作有害理论而抛弃了。而我们又不得不在战争中经历严峻的考验，再重新回到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年代里含冤死去的著名军事领导者们，曾经十分成功地创造的这个理论上来。

“斯大林蛮横无理地否定了纳碎德国无端兴师进犯苏联的可能性。于1939年临战前，他取消了机械化军的编制，停止了极好的76.2毫米坦克炮的生产。

“图哈切夫斯基和许多与其同命运的、忠于党和人民的军事领导人，被中伤、诬陷。他们制订的大纵深战役理论中的大部分原则都被否定、推翻，理由就是因为创造这些理论的人遭到了镇压。敌人——纳粹的将军们利用了苏联在战役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又被迫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经历千辛万苦去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如果翻阅《荣获一级苏沃洛夫勋章的苏联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二十五年》一书，在科拉西尼可夫的回忆录里便可知道，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苏联元帅亚·伊·叶戈罗夫，谢·米·布琼尼，以及航空兵主任、集团军级指挥员阿尔科斯尼斯都曾在学院作过时事报告。最有经验和最有才华的军区司令员，如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乌鲍列维奇和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亚基尔，都在学院里主持过示范性军事演习。

在这部著作中，预备役中将哥多夫采夫写道："应该指出，第一期学员中，对创造战役学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安东诺夫、华西列夫斯基、戈沃洛夫、扎哈罗夫、兹洛宾、库拉索夫、马兰金、施特伦贝格等人。他们都是从高级司令部来到学院的。在那里，他们有机会在沙波什尼可夫、图哈切夫斯基、乌鲍列维奇和亚基尔等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领导下，通过实践钻研战役学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上述叶·瓦·希洛夫的记录材料上来吧。其中有一页是记录总参谋部1936年至1937年举行冬季军事大演习的。"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担任一方的司令。在下重要决心前，元帅要了一份战线决定地段上的大比例尺地图。那张地图的图幅实在太大，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只好把它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而他手拿放大镜在地图上爬来爬去，仔细研究着可供坦克大兵团活动的地形。"

"为了弄清这次军事演习，我们还翻阅了伊塞尔松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参加这次演习的详细记载。作者称图哈切夫斯基为'大型战争的战略家'。

"图哈切夫斯基，作为这次军事演习中的'兰军'司

令，坚决要求让他在战役开始前展开部署，以迫使‘红军’集结兵力，首先开始行动，换句话说，他想取得敌人进攻的突然性，也就是要创造更接近实战条件的情况。

“现在我们领悟到图哈切夫斯基的见解是何等正确呀！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同意他的见解，而坚持我军应预先在边境上集结。理论家们认为我国突然遭到进犯是不可能的。”

1936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派往英国参加国王葬礼。他一到英国，就马上引起英国人士，特别是引起熟悉元帅经历及其军事活动的军界人物的注目。图哈切夫斯基仪表堂堂、彬彬有礼、通晓多种语言以及他的传奇式经历，使伦敦上流社会颇感兴趣。此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2月1日，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虽然双方并未探讨任何新问题，应该认为同苏联国务活动家的谈话是极有意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同许多有影响人物的谈话，应视为英苏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自然，这些谈话使纳粹驻英国的使馆和希特勒的侦察机关惊恐万状，因为他们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事理论家，而在未来战争中，他必将成为最重要的方面军的司令员。

苏联驻英国的全权代表举行了招待会，许多英国将领参加了这次招待会。招待会上放映了一部有关航空节的文献影片。在航空兵表演的节目里有大规模伞兵。这类空降，即一下子出现上千名伞兵的空降，在基辅军区举行的大演习时是曾经搞过的。

有位英国将军，名叫贝里，他在同图哈切夫斯基谈话时，说这种伞兵是“幻想家”虚构的产物，并武断地说：空

降兵未必会有多大军事价值。图哈切夫斯基以军事历史为据，批驳了贝里的谬论。他列举大量战例，说明如果当时有空降兵的话，这类战役的发展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这次谈话后，贝里说他不得不改变对红军的看法。同图哈切夫斯基的这次谈话，使他认清了这一点。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返回祖国的途中，于巴黎曾同戈梅林将军谈过话，参观了沙尔特列的军用机场、航空技术实验中心，"阿里坎"和"西班牙——犹太"工厂。

2月19日，他从国外返回莫斯科。他似乎一切都称心如意。图哈切夫斯基乐意接待亲友；同自己的老战友，特别是同亚基尔和乌鲍列维奇保持着友谊。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忘记他奔萨的乡亲们。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沃尔科夫讲道：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看过戏后，请他和作曲家阿萨弗耶夫到家里作客，不停的给他们放交响乐的唱片。第二天黎明，又用车子把他们送到卡洛明斯科耶去观赏日出。在莫斯科近郊，这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不知疲倦地欣赏着俄国建筑的名胜古迹，欣赏那座沃兹涅先耶大寺院。它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秀美，宛如一帧画卷。这座古迹之所以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珍贵，还因为他最喜爱的一位作曲家别尔利奥兹曾为这座俄国古式建筑谱写过一首歌曲："这一切触动着我的心灵。这里是一片宁静。彩色和极完美的造型和谐成一体。我见到了渴望升腾的激情。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怅然若失。"

1936年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青年时代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格里戈利耶维奇·乌克拉因斯基曾看望过他。他回忆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当时很高兴，就象青年

时代一样有说有笑，甚至还想同中学时代的同学较量一下力气，这使老同学好担心，因为他知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体力有多壮。

“我已经想不起来这事的确切时间了，记得好象是我在音乐学院大厅里最后一次见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时候，那时，正在演出斯克里亚宾的《销魂的史诗》。在衣帽间里，我一眼就认出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军衣领上的那四颗菱形星章，实在引人注目，再加上他一副外貌，立刻吸引住了聚集在衣帽间里的人群。我们相互寒暄之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我坐在哪里。我说在第八排。”

‘我有一个前边的空位，如果您同意，咱们坐到一起吧。’他说。于是，我们便一同上楼。突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停住了脚步，他问我：‘您不是还有一张剩票吗？送给下边随便哪个年轻人吧……我们一块去……’

“我本想一个人送去，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笑着对我说：

“‘人家会把您当成卖黑市票的，可我呢，不管怎什样……’他用手指了指衣领上的四颗星星。”

“记不清我把剩票让给谁了，似乎是送给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她把大衣一扔，就径直地朝大厅跑去了。

“我们听着《史诗》。我间或看看身边的伙伴。他不时的俯仰着脑袋，半闭着眼睛，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中间休息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看了看表对我说：‘对不起，我该回去工作了。事儿太多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当时谈到当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得很简单：

“‘我在幻想。’

“后来，他便告辞离去了。”

“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件事。一个军人，一个统帅人物，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我在幻想’”

过了几年后，当我翻阅一百多年前的古书《1812年札记》时，我在书中发现了这样几行字：“苏沃洛夫是个幻想家。1791年在整修芬兰要塞时，他曾给A·И·戈尔恰科夫写信说：‘我在不断的幻想中生活。’”

“我想，图哈夫切斯基心中充满着悲伤和苦闷。他长期来一直感到他的顶头上司不支持他。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忍受着最沉痛的打击——列宁的逝世。列宁是知人善任的，他了解人的心思，知道什么人可信。列宁有这样一条亲笔手谕：‘……立刻派伏龙芝同志去接替吉季斯（应该听听总司令和图哈夫切斯基的意见）’。

“不久以后，图哈夫切斯基又失掉了伏龙芝，紧接着又失掉了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

“毫无疑问，图哈切夫斯基已预感到头顶上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降临了。但是凭着钢铁般的自持力，他仍按部就班地生活，忘我地工作，丝毫没有表露出内心的不安。”

1937年来临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生命只剩下有限的几个月了。

希特勒制造“反间计”的前前后后

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1935年3月30日从苏联《真理报》上看到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写的《当今德国的军事计划》一文后，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让里宾托洛甫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澄清问题，软中有硬地表示，《真理报》刊登这类文章有损两国之间的友谊，实为不妥；另一方面就想在图哈切夫斯基身上大作文章，极终目的就是清除这位元帅。

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海德里希派出他的特工人员，象猎狗一样到处刺探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矛盾，找出他们之间的隔阂，选择突破口，扩大矛盾，搞离间中伤，破坏领导层之间的团结，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全面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性格特征，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由于是文职官员，不精军事，在高级将领中间并没有威望，他又多疑，粗暴，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同时发现列宁逝世之后，特别在一些能辅佐他的老一辈革命家，诸如基洛夫、伏龙芝、古比雪夫等又相继辞世后，他越来越狂妄，任性，性格弱点在恶性膨胀。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图哈切夫斯基由于他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精通军事理论，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对斯大林说都是不能容忍的。经过“阿波韦尔”情报专家的周密分析后，他们认为完全可以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

假借苏联最高权威斯大林的手来除掉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密战友，消除对德国侵略扩张的重大“障碍”。

当时决定先利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扩大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裂痕。海德里希指定专人在《新德意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图哈切夫斯基，并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一些能激怒斯大林的词句。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捧杀”和“一箭双雕”的阴险手段，在多疑的斯大林身上确实起了作用。

据可靠材料记载，斯大林看到那篇《一颗上升的新星》以后，非常气愤，立刻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找到跟前，让他看那篇文章。斯大林事先叫翻译将那篇文章译成俄文附在文章旁边，在一些关键的话下边用蓝铅笔划上粗道道，并责成政治局委员传阅。斯大林划出来的几句话是：“……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元帅中最天才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他有很多气质与拿破仑相仿，我们可以预言，世界上将出现第二个拿破仑……”

“这位年轻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一颗最明亮的新星，他闪烁在苏联这暗淡和漆黑的天空中”；又说，“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红军，威望越来越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红军的这颗星星必将取代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星星。”在这句话的下边，斯大林狠狠地划上两道粗线，外加三个问号。这些标点符号和线条明显地反映出斯大林的情绪和心态。

伏罗希洛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将这本杂志拿给其他政治局委员传阅时，总政治部主任戈马尔尼克看后，不以为然地表示：“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段，他们从来都是信口开河胡编乱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据伏罗希洛夫反映，斯

大林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

斯大林正中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的“下怀”。

所谓"事出有因"

希特勒密令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谋划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的"反间计"，并非凭空的意想，确实是"事出有因"。

从头说起，要追溯到1935年秋天。

海德里希派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到巴黎，和被十月革命浪潮冲出俄国的白俄逃亡者中央委员会接触，想通过他们在俄国国内的各种渠道刺探苏联各方面的军事情报，特别想了解苏联红军1935年以来通过大规模实战演习验证"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情报。他的代表和白俄军官中最活跃的将军史科布林在巴黎接触上了。这位将军的夫人是沙皇歌剧院的著名宫廷歌手娜杰日达·普莱维茨卡娅。这对夫妻在巴黎逃亡者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不过许多了解底细的逃亡者都对他们敬而远之，保持着一段距离，认为他们是有"来头"的。他们不仅随时可以出入苏联国境，同苏联莫斯科最高阶层人物对话，而且保持着"不寻常"的关系。海德里希在研究这位将军不平凡的身世和社会关系时进一步发现这位将军的胞弟埃夫诺·阿瑟夫是一个"阴阳人"、"双料特工"，过去在沙皇警察里拿薪俸，告密抓革命者，又在内务部里挂名，向革命机关揭露沙皇警察的活动，拯救革命者。

对这样具有特殊身分的人物，海德里希非但不恐惧，相反很欣赏，决定利用史科布林的特殊地位开展反苏侦察工作。因此，阿勃韦尔的特工人员同这位将军的交往越来越密

切，给他提供很多方便，让他更“自由地活动”。

1936年底，史科布林将军主动向德国特工人员提供一份价值连城的重要“情报”，他说苏联元帅M·H·图哈切夫斯基正在组织一个“军人反苏中心”，要策动红军哗变，起来干掉斯大林，推翻苏维埃政权。

海德里希抓到这个情报，如获至宝，火速呈报元首希特勒。他认为如果这个情报属实的话，可以大作文章，给予红军统帅部以重大的打击，使红军一蹶不振，经过若干年也无法恢复元气。但是在副元首赫斯身边工作，担任副元首情报和侦察工作顾问的冉克却有不同见解。他警告海德里希说：“切不可轻信史科布林提供的情报。”这里可能具有反间阴谋。这个情报，可能是俄国故意设计、依照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史科布林以行欺骗的。”接着他比较肯定地说：“斯大林设计这条情报想达到双重目的：一、斯大林想使元首对德军干部猜疑，进而消弱德军实力；二、斯大林想借此对付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势力。由于苏俄政府内部的许多问题复杂，斯大林不愿自己出面攻击军事领导人，而宁愿借口于从国外获得的情报资料。……”

希特勒听到海德里希给他汇报这个绝密材料和冉克的分析以后，并没有喜形于色，也没有立刻表态。他神经质地用牙齿不断地咬着他的手指甲，呆呆地凝视着站在他面前的海德里希和冉克，陷入了苦苦的思索。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希特勒正面临着一项重大的政策性抉择：是联苏俄反西方？还是联西方反苏俄？他心里非常明白，从国家体制来看，西方应该是长久的朋友，而苏联当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从眼前来看，何去何从，要他当机

立断。针对图哈切夫斯基这个问题必须马上下定决心。

最后，希特勒眼睛突然一亮，说明主意已定。他蓦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将右手习惯地插入西装军服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纽扣之间，左手背在身后，健步走到海德里希和冉克跟前，果断地说：

“我决定了，将计就计，就让这位格鲁吉亚人替我们打一场奇特的战争。”

海德里希对元首示意的“奇特战争”心领神会，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可冉克却百思不得其解，陷入五里雾中。

离开元首密室后，冉克和海德里希分道扬镳。海德里希大步流星地回到他的阿勃韦尔本部，立即着手密谋策划这场“奇特的战争”。

被捕的详细经过

苏共2、3月全会后，叶若夫就开始执行他们私下密谋的计划了。

按苏联《真理报》上正式发布的消息，1937年5月中旬，图哈切夫斯基本应到伦敦去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这项活动日程，早在1936年1月苏联委派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M·M·利特维诺夫为代表团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当时驻英大使И·M·迈斯基组成的三人代表团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葬礼时就定下来了。但是，正在图哈切夫斯基准备起程的前夕，报纸突然宣布：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因病不能前往英国参加典礼，而改由海军司令B·M·奥尔洛夫代替他前往英国。

其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7年5月16日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这条奇文时，他才知道自己"病了"。在这之前，他已有察觉，当然不是身体真的有病，而是一场政治灾难在向他袭来。这时他才感到"头顶上已布满乌云"。他的良师益友，那几位能够制约斯大林，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的伏龙芝、基洛夫、古比雪夫都相继辞世。他们有的因劳累而死，有的被阴险谋杀，联想起来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扫除了主要障碍，斯大林从此便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大清洗。在军事系统中，首先就从图哈切夫斯基开刀了。

撤销图哈切夫斯基的出国计划，是迈出的第一步，接着就叫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图哈切夫斯基宣布一个奇怪的调令：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等于让一位深孚众望的统帅——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贬谪下去，当一个省军区司令，而且事先不作任何解释，不说明任何理由。限他三天内启程，去古比雪夫城，接替П.Е.德边科的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置，心里十分苦闷。他心里明明知道这是斯大林决定的，他还是给斯大林写了最后一封信，希望知道贬谪他的真实原因，结果杳无回音。斯大林对他的仇视态度明朗化了。他虽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没有玩忽职守，没有贻误战机，相反却屡建战功，他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过错，因而竭力保持镇静，观察事态的发展。

在公布调令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伏罗希洛夫避开图哈切夫斯基专门找他夫人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谈话，让她注意丈夫的情绪，开始说得很委婉，后来直接了当地给她布置任务，让她务必将图哈切夫斯基私人手枪中的子弹全部偷出来，交给“组织”，说：“怕图哈切夫斯基轻生寻短”。尼娜全部照办了。一切都是背着图哈切夫斯基做的。因为她是布尔什维克，是执行“党的指示”。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认为，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于是按照要求，立刻决定启程去伏尔加沿岸军区，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搬迁，他和妻子孑身先到，等安顿好以后再来搬家。

图哈切夫斯基的这项任命，引起了各种传说和猜测。在

军内外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弄得满城风雨。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朋好友，有的打电话，有的到家来探问原因，他们都感到莫明其妙，心中都产生了可怕的预感。他们都十分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多疑、任性、极端自信、目无法制、独断专行，忌贤妒能……赫鲁晓夫在演说中曾引用普希金的悲剧《莫扎特与朱莉叶》中莫扎特说的几句台词："天才和残暴，这两件东西是无法共存的。"以此来形容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和斯大林的关系。

司机И.Φ.库德里亚夫采夫从1918年以来一直跟随元帅工作，和元帅亲如家人。在那沉重的日子里，他曾询问图哈切夫斯基为什么这样忧伤。图哈切夫斯基心情沉重地告诉他："有人在造谣中伤。"

于是，司机便劝元帅：

"应该找斯大林同志谈谈，或者写封信。"

元帅回答说，信就在斯大林那里。我几次打电话求见，想了解变化原因，可拒而不见。

这位司机于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最后一次将元帅夫妇送到莫斯科喀山车站。告别时，元帅答应把他调到自己身边，说去后一安顿好，马上就调他去古比雪夫。这位同元帅朝夕相处十九年，一直象战友一样同元帅共同分担战斗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在车站的分手就是最后的诀别！

至于换人去伦敦参加加冕典礼的事情，伏罗希洛夫派手下人送图哈切夫斯基上火车走时，在月台上对他作了无法自圆其说的非正式的解释：似乎在华沙有人要谋杀他。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如果真的怕在华沙出问题，完全可以改乘军

舰去伦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匆匆忙忙跑来解释，也是别有用心的。无外乎还要稳住图哈切夫斯基。

根据上边限定的时间，图哈切夫斯基偕同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抵达古比雪夫。到达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伏尔加沿岸军区的干部会议。有一位过去认识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员发觉，近两个月来，元帅苍老得多了。会上，他显然非常疲倦。但他讲起话来，仍象过去一样，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军区应该抓的训练任务和当前的工作。

5月28日这天，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从早到晚一直在会议上。元帅的妻子中午准备好菜饭，等元帅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不见人影。后来，她猜想可能参加宴会，或因为新来乍到，公务缠身。开始有些抱怨，有事本可以打回电话嘛。到了晚上，还不见人，她心中产生了疑团：莫非出事了。正在这时，П·Е·德边科脸色苍白地跑来偷偷地告诉她，元帅在会场上被捕了。她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几乎昏过去。她虽然早有些预感，但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没有来得及和元帅告别，他就这样匆匆地去了，她感到这是终身的遗憾。

不久后，克格勃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家人都逮捕了。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紧接着又从肉体上消灭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及他的兄弟亚力山大和尼古拉。他的三个姊妹被投入集中营；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也未能幸免，俟成年后也被捕入狱。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和妹妹均在流放中死去。

秘密法庭上的斗争

斯大林由于心里有鬼，不敢公开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等八名高级将领，而是偷偷在内务部地下室的秘密法庭上处决的。

1937年6月10日夜，在内务部阴森的地下室里，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八名高级将领的秘密审讯开始。由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4名元帅组成军事审判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长乌里利赫坐在中央，周围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开庭后，“囚犯”从各自的囚室中被押到被告席上。图哈切夫斯基看到有4个人精神呆滞，面带羞愧。他们在逼供下，承认口供是自动招认的。审判长下令："传证人！"

地下室的铁门当啷一声打开了，押进来一个人。图哈切夫斯基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部下，原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员德边科。此时，他面色憔悴，目光迟钝，坐在证人席上，不敢抬头看被告席上的战友。

审判长要德边科揭发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这时，被告席上有人抢先大喊一声："德边科！你还记得8月3日吗？"

8月3日是被告之一帕里曼诺夫从战火中救出德边科性命的日子。德边科听到这个日子，好象触电似的，神志恍惚。他朝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呼喊，“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说什么都别信！”这时上来4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将德边科揪出

法庭。

审判长见势不妙，立刻宣布休庭20分钟。

重新开庭后，德边科面色苍白，重新出现在证人席上。

“德边科同志！您能证明这封信上的手迹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吗？”审判长拿出用300万卢布从希特勒手中买来的伪造信件，让德边科看。

德边科没有认真看那封信件便立刻象背诵一样说：

“我作证，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信，签名也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你抵赖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图哈切夫斯基慷慨陈词：

“审判长！我想提醒你一句：在军事史和战争史上可以找出大量史实证明，交战一方为破坏对方军事领导的声誉，随时可以抛出他们伪造的证据；一个昏君为了陷害忠良，唆使亲信伪造人证物证之事也屡见不鲜！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足为奇！你们只相信一张伪造的废纸，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图哈切夫斯基20年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与敌人浴血战斗的历程？那生与死，火与血的考验，难道还比不上一张废纸？”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交待你的罪行！”图哈切夫斯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申辩：“如果说我投向红军，坚信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并忠实地服务是我犯下的‘罪行’的话，那我为此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我绝不祈求这里法庭的宽恕，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也不会尊重这里的审判，因为你们判罪的根据全是伪造的。这些胡编乱造的下流

材料，只配拿去拼凑第三流的侦探小说！你们标榜自己是‘公正的法官’，说我们是‘罪犯’，其实，真正的罪犯恰恰是你们！你们为了迎合上司的需要，不惜编造谎言陷害中伤，简直卑鄙无耻到极点了！迟早会有一天，人民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记住吧！你们也会被押上被告席，一样被处决！”

法庭费了很大力气才制止被告义愤填膺的控诉。检察长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处决前还有什么最后的话，图哈切夫斯基沉思片刻，说：

“我希望你们转告斯大林一句话，告诉他，人民和红军的敌人，不是我，而恰恰是他自己！历史会证明他才是千古罪人！”

接着，便从地下室里传出了枪声。

历史的回声

一代名将、军界的"神童"和"泰斗"、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就这样被处决了，然而他的话却得到了应验。斯大林对高级将领实行的大清洗，其手段的阴险毒辣，实在令人发指：利用医生谋杀伏龙芝，接着便把医生处决；利用叶若夫滥杀无辜，尔后秘密处决了叶若夫。责成布留赫尔元帅担任秘密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执法队长，不久又以"日本特务"的罪名将他枪杀；在秘密审讯图哈切夫斯基时，和布留赫尔一起参加军事审判团的耶戈罗夫元帅后来也成了"人民的敌人"。内务部人员逮捕他时，他开枪拒捕，打死内务部特务后被当场枪杀。内务部特工人员为了报仇，凶狠地杀害了他那无辜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损失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据可靠材料记载，"由于实行毫无根据的镇压，红军失去了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仅有的五位元帅之中就有三位元帅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和'人民的敌人'而被消灭了；几乎各军区司令员都死于非命；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或被处决，或被降职，或被长期拘禁……所有军团司令、几乎全部师长和旅长，约半数的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多数的军区、师、旅的政委，近三分之一的团政委、因受图哈切夫斯基和戈马尔尼克

（总政治部主任，被迫自杀）的株连都被撤职。”[①] 这次清洗使苏军大伤元气，致使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按着事先早已筹划好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时，苏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节节失利，几乎全线崩溃。这是大清洗造成的严重恶果。

五十年后，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的报告中，在充分肯定斯大林在革命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以后，指出“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在践踏法制、大规模镇压方面，在党和人民面前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和不可饶恕的”，“我们现在知道，对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对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提出的政治罪名和镇压，都是预谋伪造的结果。”

历史是公正的。它无情地揭去了虚伪的面纱，露出专制暴君的面目，同时给一切沉冤于九泉之下的正直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

① 见格列奈科和索柯洛夫斯基等元帅编著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1965年俄文版，第39—40页。

附件1

苏联元帅比留佐夫
论H·M·图哈切夫斯基

苏联共产党在其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和彻底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思想。党在苏联人民面前揭露了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遗训、乱用职权和大规模镇压我国优秀干部的全部真实情况。尼基达·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谈到了被杀害的著名的苏联军事首长，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苏军最天才的统帅之一、国内战争的英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他就是斯大林统治时代惨遭镇压的牺牲者。

党采取坚决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造成的有害后果，彻底清算了党政生活中一切违反列宁准则的行为，给一切无辜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他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及其战斗的一生得到了公允的评价。苏联部长会议为纪念图哈切夫斯基诞辰七十周年，决定出版他著作的两卷集。

在分析这位著名苏联军事首长的理论遗产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的生平阅历的几个重要时期，否则便无法充分了解图哈切夫斯基著作的产生背景。

简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2月

16日生于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县一个破落地主家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武备中学中受的初等军事教育。1912年6月1日从该校毕业，同年8月进入亚历山大军官学校，1914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毕业后不久就被派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1915年2月19日被俘。几经越狱潜逃未遂。1917年10月越狱终于成功，逃回俄国。

当时，俄国国内十月革命方兴未艾，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袖手旁观。这位旧军队中的中尉毫不犹豫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武装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我的真正的生命是从十月革命和参加红军开始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后来在他战友中间时常这样说。

诚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历史是同正规红军的建设和苏联人民反对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英勇斗争紧密相连的。他那优良的军事素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丰富的作战经验，超群的天资和惊人的毅力，这一切使图哈切夫斯基脱颖而出，超越了其他那些自愿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充沛的精力、大胆果断地提出和处理问题，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我们党和列宁同志的高度评价。

从1918年到1937年，他在军队期间，党曾委派他执行各种艰巨任务，而他不论何时何地都忠心耿耿地完成了党和国家的重托。

1918年初，图哈切夫斯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工作时，为完成党和列宁决定的任务——建立工农红军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同年四月，图哈切夫斯基加入共产党，五月被任命为莫斯科防区司令部政委。

入党后，图哈切夫斯基以更坚韧不拔和勤奋好学的精神继续钻研军事。为了理解和弄清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是，图哈切夫斯基便以他固有的那种韧性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刻苦钻研列宁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经典著作。同苏联党和政府的著名活动家——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鲍德沃斯基和在前线的古比雪夫、伏龙芝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广泛接触对形成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面貌起到了巨大作用。

1918年春，捷克白匪在苏联国内反革命分子支持下发动叛乱，使东线形势告急。列宁当时指出东部战线的胜败将决定革命的命运。根据列宁的指示，将党的最著名的活动家和可靠的、最有经验的军事专家都派往东线。图哈切夫斯基从1918年6月起就到达东线，站在最坚决执行党的意志者的行列里。由于他的积极参预，冒着敌人的连续攻击，在很短时间内将溃散的支队编组成辛比尔斯克、奔萨、因扎等步兵师。他同古比雪夫一起创建了第一个能完成战役任务的步兵军团——第一革命集团军。后来，第一革命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比雪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高度评价图哈切夫斯基在创建该集团军中的贡献。

早在这个时期，图哈切夫斯基就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审时度势的能力。他当时就说，只有坚决进攻才能挽救革命。1918年6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在他写的《告第一革命集团军红军战士书》中写道："……如今，我们这支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军队的宗旨，不仅要进行抗敌的防御战，仅用这种手段我们是无法挽救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当今的宗旨是切断捷克白匪和反革命分子同西伯利亚和其他产粮区的联系。为此，必需马上向前挺进，必须进攻，任何拖延迟缓都将导致死亡。”

在这份告红军战士书中，图哈切夫斯基还号召红军战士加强铁的革命纪律，严格要求并一丝不苟地执行首长的一切命令，应将此看作保证我们胜利的最重要的必备条件。

第一集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迅速成长为一股有战斗力和纪律严明的力量，在两、三个月内就取得了对干涉者和白卫军的一系列辉煌战果。众听周知，这个集团军对敌进攻取得的重大战果是，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大部地区。这对后来东线的整个斗争都具有重大意义。

1918年末，由于克拉斯诺夫哥萨克白军的进攻又使南方战线告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决定将图哈切夫斯基从东部战线调到南方战线。他先担任南方战线副司令，后又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在粉碎敌进攻沃罗涅日集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战线中央地段军队（第八和第九集团军）转入反攻并于1919年1月下半月攻占从利斯基车站到波沃里诺站之间沿战线的铁路线。这次反攻紧接着发展为南方战线的总进攻，使克拉斯诺顿河白哥萨克集团军全军覆没。

1919年3月，东部战线再次告急。高尔察克军队距喀山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也只有100多公里，离萨马拉85公里。东部战线重新成为共和国的主要战线。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加强东部战线，重新把图哈切夫斯基调往东部战线。4月初，他担任第五集团军司

令。该集团军在红军战胜高尔察克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曾指出，第五集团军“在一年内由一支不大的集群发展为具有坚强革命斗志的集团军，在保卫伏尔加河和粉碎高尔察克部队中团结战斗，取得辉煌战果。”

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能和革命功勋，授予他红旗勋章和荣誉金质武器。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9年8月7日颁布的关于给第五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授勋命令中指出：“……第五集团军英雄部队在其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巧妙指挥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击溃敌人的有生力量，通过乌拉尔地区……由于部队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深谋远虑广泛实施机动，于1919年7月24日……攻占车里雅宾斯克。”

“该集团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天才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坚决付诸实施的结果。”

图哈切夫斯基，共产党员统帅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表现了罕见的大无畏精神。他常常亲临战线的各个最重要地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19年12月28日颁布的命令中写道：“第五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因在向东方胜利进军中表现勇敢、机智果断、精力充沛、处事有方和精通本职工作而授予荣誉金质武器。”

深刻而正确地了解问题作为阶级战争的国内战争的性质和特点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取得统帅成就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十分重视党所提出的任务——在最短时限内解决培训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应该说，当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心问题是无法补充指挥干部的损失。而在第五集团军中，图哈切夫斯基却组织了培训忠于人民的指挥员的工作。

“……集团军中经常缺少指挥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诺夫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第五集团军在1919年冬季攻势前状况的报告中写道。“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办法，建立了红色军官学校。该校培养出50名营连指挥员。现在有800名排级干部在学习。两个月后，第五集团军将配齐指挥人员。”

关于第五集团军在军内自行培训指挥员的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接见中亲自向列宁作了报告。列宁称赞了他的明智倡议，并赞成他就这个问题起草报告，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全军推广。

1919年12月19日，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报告。报告中他写道：“为了弄清国内战争的性质和形式，必须深刻理解这次战争的起因和实质。我们的旧军官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就无法，也不愿意弄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

“因此，将军们根本不懂得在进攻时利用本阶级来扩编军队的条件和根据居民的阶级布局组织后勤保障的条件，他们不懂得集团军正面宽度和整个阶级斗争进程之间的制约关系……

“一句话，国内战争……由于伴随阶级武装斗争所出现的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具有……战略形式的各种特点。正面宽度大；军队数量少，要利用所属阶级扩编部队、组织防御、保障侧翼和后方；技术装备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战役形式特点（有些将军也许了解这点）。”

图哈切夫斯基对国内战争的性质和特点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评断，从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

充分认清国内战争的战略意义，正是国内战争的这些特征使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组织军队的权力。”

早在1919年7月，图哈切夫斯基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在旧专家当中很难找到优秀司令员。是时候了，该用共产党取代他们了，比如东部战线南方集群司令员伏龙芝同志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人物。在他的指挥下战线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

“……这次战争（指国内战争）”图哈切夫斯基继续写道：“异常艰难。为了很好地实施指挥，需要具有清醒的头脑和分析的能力，而这些素质，旧军队中的俄国将军是不具备的……”

由此可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积极参加建设年轻红军过程中是思考了多少具有战略范畴的重大问题。他在活动中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认识战争性质的出发点。当时，他就是英勇无畏和无限忠于苏维埃祖国的统帅。

1919年12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南方战线，担任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指挥该集团军。当时正在决定任命他为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的问题。因此，图哈切夫斯基约有两个月时间不得不留在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这对图哈切夫斯基这样一位时刻关心革命命运的共产党员来说真是一段痛苦的时刻。1920年1月19日，他从库尔斯克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向您坚决请求：快使我摆脱这种无所事事的处境吧。在西南战线司令部里我已经三个星期无所事事了，而无事可做已经有两个月了。我既无法弄清拖延的原因，也无法促成早日任

命。如果说，还认为我两年来在指挥各集团军中有些功绩的话，请求给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我能力的机会。如果前线找不到这种工作，可否考虑让我搞搞后勤运输或者当个政委。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列宁知道了图哈切夫斯基这封信。

1月末，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战线司令员。这个任命是党中央以列宁名义直接下达的。以事态发展来看，任命得非常及时。高加索战线当时正在告急，因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失守而造成的威胁。

图哈切夫斯基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后，对部队的部署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于1920年2月中旬下令转入进攻。结果，1920年3月底高加索方面军部队全歼邓尼金向北高加索撤退的重兵集团。

此期间，由于波兰白匪的入侵使共和国西部边境情况危急。

1920年3月20日，总司令加缅涅夫向列宁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写道：“……鉴于波兰前线的重要和在该地展开的战役势在必行，总司令部建议在决定性战役展开前将现任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那位曾巧妙和神速实施粉碎邓尼金军队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派往西部战线。”

1920年4月29日，总司令颁布命令，将图哈切夫斯基从高加索战线调往西部战线，担任方面军司令职务。1920年5月10日，党中央政治局审查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在西部战线准备进攻的建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该战略方向总

指挥，并一致通过了他的作战计划。这便雄辩地证明党是承认这位苏联元帅的功绩的。

西部战线部队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给予敌人一系列致命的打击，并进抵华沙城下。众所周知，华沙战役由于种种原因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这次战役的结局丝毫无损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能和对他制订的勇敢作战计划也是无可指责的，相反，图哈切夫斯基作为伟大战略家的威信，不仅得到国内，而且也得到国外的承认。

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西线司令时，表现了高超的统帅才能、巧妙处置复杂情况和坚定不移执行既订计划的决心。

1921年苏波战争结束后，根据列宁的指示，派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平息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总指挥。在这个岗位上，图哈切夫斯基始终恪尽职守。3月18日，喀琅施塔得叛乱平息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马上请求总部让他回去执行他的西线司令的职责。

“我迫切希望，”图哈切夫斯基说道，“最好明天就准许我回去。离开西线太久了，应该尽快熟悉情况，特列是熟悉作战和队列训练情况。离开前我一定制订好此地部队的疏散计划，向您呈报。”

从这些话里足可以看出图哈切夫斯基的为人——一个事业心很强、勤奋和精力充沛的人，完成党的任务后，一分钟也不想停歇，马上准备去执行新的重要任务。可是他并没有能长时间地指挥西线部队。

1921年5月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坦波夫省驻军司令，平息富农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叛乱，即所谓的“安东诺夫匪帮”。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次任命是总司令根据党中央委

员会和列宁的指示作出的。档案中至今保存着斯克良斯基写给弗拉季米尔·伊里奇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写道："……我个人认为派图哈切夫斯基去平息坦波夫叛乱为好。近来那里的形势非旦不见好转，而且有的地方甚至在恶化。这样任命将会取得某些有力的政治效果，特别是对国外更是如此。

"不知您意如何？"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创造性地利用当时仅有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的重大使命得到了圆满完成。到1921年6月14日，坦波夫省境内的匪帮全部被肃清，图哈切夫斯基重新回去指挥西部战线部队。

从以上对图哈切夫斯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极其概括的评论中足可以看出，他的统帅才能是日积月累的，是从胜利到胜利不断巩固和日臻完善的，在政治上也是不断成熟起来的。

1920年5月22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将图哈切夫斯基上调总参工作的命令中写道："……M·H·图哈切夫斯基加入红军时就具备天赋的军事理论才能，后来又继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军事理论知识。图哈切夫斯基每天在掌握新的军事理论知识的同时，巧妙地实施了精心筹划的战役，他既卓越地领导了集团军编成的部队，又卓越地指挥了共和国各条战线上的集团军，在东部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上，在对敌作战中为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了辉煌的战绩。"

国内战争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在新的技术装备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军的事业。他认识到，国内战争虽然以胜利而告终，刀枪入库和满足于既得成就也是不能允许的。巩固红军是每一个苏联人，首先是军

队中每个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神圣的革命天职。

图哈切夫斯基由于深刻了解未来战争是现代化战争这一性质，为完成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巩固国防、改革组织机构和调整苏军技术装备的计划进行着极其艰巨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该院当时是锻炼高级和上级指挥员的熔炉。1922年1月，他重新被任命为西线司令。

从1924年5月至1925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初是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尔后担任副参谋长。伏龙芝当时担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还兼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战略学总导演。

伏龙芝器重图哈切夫斯基，并对其活动给以高度评价。他不是随便选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自己助手的。1925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伏龙芝领导下，为贯彻执行党制定的军事改革进行了艰巨的工作。这项改革对苏军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1925年11月，伏龙芝推荐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职务。图哈切夫斯基直到1928年5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以前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931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械部长，尔后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担任这项职务直到1937年5月。

勿庸置疑，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中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在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职务之前，已经成为身经百战、政治上成熟、积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最丰富作战经验的统帅。高瞻远瞩，预见到未来的军事发展前景，当时已极其充分地表现出他那杰出战略家和组织家的才华。

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同时，图哈切夫斯基还进行了大量的

社会工作。他是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历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多届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第十六次和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当选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的军政活动也是多方面的和卓有成效的。他是向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大胆提出一系列有关国防建设重大建议的倡导者。他作过关于改装军队、关于发展各军、兵种和改革部队组织编制的报告。

完成恢复时期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着手制订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展示了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广阔前景，也就是从根本上改装陆海军的广阔前景。由于巩固国防能力和加强苏军，甚至使国际形势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0年1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向陆海军人民委员呈递一份有关改组军队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根据已出现的各种最新技术条件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兵器的能力，以及在农村业已形成的跃进情况，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项全面整编军队的任务……。各兵种数质量的增长必然要求有新的比例和新的机构，……经整顿后的军队必然要求有新的战役法。"

图哈切夫斯基这份报告的重点是建议增加师的数量和建议发展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

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是及时的，至于有关具体指标，当然尚待进一步核实。

然而，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建议非但没有理所当然地得到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赏识和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恶意的指责。斯大林武断地说(伏罗希洛夫是完全迎合这种说法的)：采取这个纲领势必导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将用所

谓的"红色军国主义"的特有体系取代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就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所下的这个结论，是伏罗希洛夫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布的。会后，图哈切夫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请求斯大林重新审议他关于改组工农红军的建议。当时，他强调指出，苏联不仅需要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胜利中还要保存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其不致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的成果。

1930年12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再次给斯大林写信：

"……由于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在信中所定下的结论，便完全排除了我提供一系列有关发展我国国防力量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可能性，比如，我作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战略学总导演，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达六年之久，这次讨论竟被排斥在外。由此看来，我在这些问题方面的地位是徒有虚名的。但是，我和过去一样坚信，工农红军司令部毫无原则地歪曲了我手稿上写的建议……"

对如此热切衷恳的申述却毫无回音。斯大林只是在两年后的1932年5月给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承认处事有些急躁，没有正确地评价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组工农红军的建议。在信的结尾，斯大林请求原谅他改正自己错误太迟了。

我们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证明：当年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何等复杂而又何等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鉴于军事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未来战争性质的影响，

图哈切夫斯基对各种新型兵种，首先是航空兵、摩托化兵和空降兵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制订有关这些新兵种的战斗使用原则。

1931年末，图哈切夫斯基在写给陆海军人民委员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关于给步兵和骑兵师配坦克兵的问题。这项建议被采纳并在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得以应用。

1934年2月，图哈切夫斯基和乌鲍列维奇联名给伏罗希洛夫写信。信中根据演习和大演习的经验证明现代航空兵及其作战的能力。"……现代航空兵，"信中写道："能长时间切断铁路运输；消灭弹药仓库，破坏军队的动员和集结……如果交战一方不准备破坏对方的航空兵基地；可以连续空中袭击瘫痪对方的铁路运输；可以大量空降兵破坏其动员和集结；可消灭其燃料和弹药仓库；可以骑兵和搭乘步兵支援摩托化兵兵团快速行动以粉碎对方驻地和梯队，那他本身就有战败的危险。"图哈切夫斯基和乌鲍列维奇从这点出发认为，发展工农红军的主要决定环节是在最近几年内迅速增加飞机产量。他们认为1934—1935年间，红军应得到1万5千架作战飞机。

该信的作者同时也一再证明装甲兵在巩固国防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仍不断关心进一步改善步兵、炮兵、防空兵和其他专业兵种的建设问题。当时在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制订并实行了步兵师军的新体制。这种新的体制明显改善了步兵的组织编制，提高了他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了步兵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根据他的倡议还减少了工农红军当时装备中的火炮的类型。这在发展炮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减少火炮类型，这不仅减轻了军

工生产部门的负担，而且也减化了战斗使用，减轻了后勤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还是为发展海军和空降兵而采取许多重要措施的倡导者和积极执行者。

1928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关于海军在全国武装力量中的地位和任务”的报告。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发展海军过程中，应力求使水面舰队和水下舰队协调配套，使岸防和雷炮防御与海军航空兵协调一致。海军航空兵应符合现代战争条件下，在我们海域内进行战役的性质……”

1932年，图哈切夫斯基在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了一次试点性海军演习。通过演习实际验证了他对海战战术的观点。在关于演习结果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许多极重要的新观点和有关进一步发展海军的建议。“由于新型技术兵器在海战和空海战中的运用”图哈切夫斯基在这次报告中写道：“使同主力舰队的斗争方法(特别是在近海靠近岸基条件下)全然更新。由于采用高空和低空扫雷；高空布设水雷障碍；用可操纵火箭和鱼雷快艇实施攻击；以投掷小型发烟航空弹或用飞机投掷大批发烟弹，大规模布设烟幕屏障的办法蒙蔽舰上炮手观察和操纵，促使主力舰的快速性能及其火炮威力大大削减，甚至化为乌有。”

由于波罗的海舰队当时不具备相应的武器装备，M·H·图哈切夫斯基建议立刻着手突击研制强大的鱼雷舰和扫雷舰。他大力支持学者和设计师从事无线电控制火箭课题的研究。他将以掌握新型空海战课题为基础的必修课目，列入海军训练大纲。

M·H·图哈切夫斯基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掩护战

列舰免遭空中袭击的战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用了这种战法。"为了保卫战列舰，"图哈切夫斯基写道：免遭空袭应责成舰船承担下列任务：

"1)有随时可以升空抗击敌人攻击的飞机；

"2)有自动控制的高射武器；这些武器能对迅速移动的目标进行射击。"

M·H·图哈切夫斯基是发展工农红军空降兵的倡导者。1934年9月，在给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提意见时，他写道："空降兵的使用是应该特别考虑的。工农红军应拥有大量空降兵。"但是，考虑到这个新型兵种的未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括号里注明："……该是掌握数以万计空降兵的时候了！"。果然如此，图哈切夫斯基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兑现。1936年基辅和白俄罗斯军区大演习中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空降兵。

对空降兵的保障——这个问题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格外担心和忧虑。1934年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时，已经进行了从空中保障空降兵用油的尝试。M·H·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并建议通过几次试验性演习弄清额定消耗量。图哈切夫斯基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别洛夫简单交换意见后，便请司令员检查一下，看空降兵怎样同自己的飞机保持通信联系，飞机又怎样保障对他们的供应。

图哈切夫斯基每天处理有关发展各兵种事务的同时，还关注着干部——专家的培养。他是创造许多工农红军院校的倡导者。比如，1932年3月27日，他在呈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由于国防委员会连续决定迅速给工农红军装备坦克、火炮和其它技术兵器，

各种专业的军事工程师的需要量便急剧增加。这就要求工农红军军事工程学院派生出一系列独立的学院，首先应建立：摩托化和机械化学院、军事工程和军事化学学院。”他在这份报告里还建议在地方大专院校再多想些办法。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被采纳了。这些建议在发展陆海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M·H·图哈切夫斯基深入而具体地钻研了部队战斗训练的各方面问题。

1926年11月，M·H·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工农红军参谋长向陆海军人民委员呈报了一份有关该年度大演习总结和1926—1927年部队训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指挥员的训练，特别是在指挥战斗、部队战场机动、协同动作、后勤工作和司令部工作等方面的训练更为薄弱，党政工作也不具体。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工农红军司令部制订了具体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后来得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称赞。

在有关1927—1928年大演习的总结报告中，M·H·图哈切夫斯基再次写道：部队演练得还比较差，各级领导干部还没有掌握必要的独立自主处置问题的能力；各级指挥员遇到战斗情况不知所措，等待着指示。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1928年12月3日命令中均得到了反映。克服这些缺点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图哈切夫斯基早在给1934年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提意见时就写道：“指挥员的积极性是可嘉的，但主动性尚感不足。”

图哈切夫斯基对合同战斗的战术发展是十分重视的。1933年10月7日，就由他主持的、以“在狭窄地段上用加强步兵师突破敌筑垒地带”为题所进行的演习结果，他向伏罗希洛

夫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大兴趣。因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合同战斗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后来得到了正式认可并以条令形式固定下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现代合同战斗看作是唯有诸兵种合同作战才能取胜的战斗，看作是坦克应该发挥显著作用的战斗。M·H·图哈切夫斯基这些结论和建议之所以有重大价值、是因为这些结论是在苏军大量组建坦克兵部队的开创时期作出来的。

"……即将大规模运用的现代压制兵器"，M·H·图哈切夫斯基写道："能达成同时冲击并消灭敌防御的战术配置的整个纵深地带。"

这些兵器，首先是坦克能够：

1）压制敌防御火力配系，使其大部分火炮和机枪无法参预反冲击，并能保障进攻步兵和担负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能深入敌防御地带纵深；

2）破坏指挥体系，钳制和封锁敌预备队，以便在防御地带纵深战斗过程中各个击破敌战斗队形中的各梯队。

在这种情况下，步兵能否顺利前进将取决于坦克能否顺利前进。因此，应用炮兵主力支援坦克，待坦克开进其作战地域后，再支援那些在得不到坦克支援地段上的步兵。

总之，支援步兵靠坦克，而支援坦克则靠炮兵。

在报告结尾，一如既往，图哈切夫斯基又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合同战斗指挥和组织的切实可行的措施。鉴于在这次演习中，坦克冲击将伴随以火力准备。图哈切夫斯基写道："………这一方面可使炮兵继续研制各种条件下组织火力准备的形式并力求适用于冲击坦克的不同速度；另一方面能引起对坦克和坦克支援炮兵间联系的诸问题的格外重视。

“最后，使坦克部队掌握在能见度差的情况下活动并与强大炮兵协同作战的本领是十分必要的。坦克和炮兵间建立固定的联络方法事先应该原则制订出来。……有关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在敌防御纵深内的协同动作，应在战斗计划中按时间和空间预先协调好。”

在1934年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总结时，M·H·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必需训练部队掌握合围敌人，而且要彻底合围的方法；反之，也要掌握突击重围的本领。

当时，他还提出，摩托化兵团在战役纵深作战时，必须配备航空兵的问题。

1936年9月，M·H·图哈切夫斯基在讲评莫斯科军区大演习时再次针对这些问题指出了一系列致命的缺点：

“1)摩托化军队从正面突破敌防御地带时没有炮兵支援。造成的损失应该说是巨大的；

2)摩托化军行动迟缓，指挥不利……

3)摩托化军没有得到航空兵支援……

4)虽使用了航空兵……但任务不够明确……

8)通信联络不畅通……

9)空降兵的机降应该有歼击机掩护。

10)各级司令部的工作，特别是侦察工作、各个部队都很薄弱。……

11)伞兵跳伞时不携带武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图哈切夫斯基将其在部队军事训练方面的实践活动同他主持进行的巨大科研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部队大演习和各种试点性演习中。他反复验证了他所制订的有关战术学和战役学的各项原则。

由于新兵种的出现，便逐渐创造了以同时打击敌整个战术纵深的办法去消灭敌人的条件。鉴于这种可能性，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便研制了纵深战斗的理论并为了将这种理论贯彻到部队实际训练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此，M·H·图哈切夫斯基还制订了部队进行试点性演习的专用守则。

1933年9月14日，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哈列帕斯基写信给图哈切夫斯基说："……我来托洛茨基大本营已经几天了，一直在埋头研究进攻性纵深战斗的基本原则……

"我在搞这个课题过程中，我以您制定的'纵深战斗论题'为基础。可以使您高兴的是：您的理论研究、您的论题经过实战的验证，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肯定能站得住脚的。"

但是，应该指出，纵深战斗理论的实质和作用当时并没有立刻为所有人理解和重视。图哈切夫斯基为了使他的经验在部队训练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伏罗希洛夫当时对纵深战斗基本原则就不理解。他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会上曾尖刻地批评了图哈切夫斯基。

1933年11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迫致函伏罗希洛夫："……听了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后，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不管军队武器如何更新，战术依旧不变……"。这封信是以这样几句话结尾的："我之所以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全会后指挥员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议论纷纷。扬言要放弃新的战术样式，不再发展这些样式等等、云云。让我再重复一遍，这种论调同您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决定将出现的这种混乱情况向您呈报……"

1934年，在一次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C·C·

加缅涅夫说道："纵深战斗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战斗样式。这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来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同时或在接近的一段时间内，对敌前沿、炮兵部队和深远纵深实施突击。这确是一个问题。同时杀伤敌人，使其无法使用自己的预备队。"

实践充分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所制订的纵深战斗理论列为工农红军战术训练的主要课目并在尔后几年内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应该强调指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其一生活动中，一直遵循着有关共产党在建军中起领导作用的列宁原则。他在军队建设方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而且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和首长都要这样做。

1922年2月，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明斯克和维捷布斯克地域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方面军编成内各兵团师军长发出通函。通函中指出："为了成为一长制的首长，只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部队的政治生活，取得政治工作的经验，成为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采用一长制……"接着在信中下达了有关指挥人员必须广泛深入政治工作和提高政委专门军事训练水平的各项指示。在信的结尾强调指出：只有"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同心同德才有可能完成上述各项任务"。

M·H·图哈切夫斯基对发展苏联军事科学诸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基于对现代战争的正确理解，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战争不能单靠军队，而是要靠全国总动员。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不仅是正确地制定发展

陆海军的决策，而且是坚定不移地巩固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国家的动员准备能力。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学术著作是同他在巩固红军和领导红军对敌作战方面所取得的丰富实践活动经验紧密相连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现代战争的战争初期的问题、后续战役的问题、航空兵、摩托机械化兵和空降兵的问题均占有显著地位。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国内战争后期或直接在战后——在恢复时期和苏联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建时期写成的。当时，在红军中正在大力进行总结国内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的工作。基至过去战争的经验和苏联在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M·H·图哈切夫斯基积极参加了制订发展苏联军事学术的理论和实践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工作。他研究苏联军事学术时所持的立场，决非A·A·涅兹纳莫夫，A·A·斯维钦，C·Г·鲁基尔斯基，A·N·维尔霍夫斯基之流转为红军服务的一个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持的立场，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立场。

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理论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就其总的方向来看，接近于伏龙芝的观点。即坚持军事学术与一国的社会制度和它的生产基础相关的思想。图哈切夫斯基强调指出人和武器都是发展军事学术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武装斗争是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但也强调指出，战争并非政治的唯一手段，同时也不能单靠作战来实现。纵然军队的行动是不能排除的，但在战争中还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和其它等斗争样式。

在研制准备和实施武装斗争各种问题时，作者一直遵循

马列主义原理，即帝国主义者强加给苏联的战争是长期而艰苦的；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国的各种经济政治体制必将经受考验。他认为国家必须对这种战争做好准备。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不能企求凭一次突击消灭敌人。他探讨的在一个战略方向上一个接一个连续作战的理论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针对战争性质和实施战役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卫国战争经验的印证。但是，在他那篇《现代战略学诸问题》一文中，在谈到红军在占领资本主义国家领土上组织地方政权的实质和内容时暴露了一个错误观点。作者认为在被解放的领土上由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对苏联国内战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证明：被解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将由他们自己去选择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民主政权形式和社会体制。

M·H·图哈切夫斯基选集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未来战争的性质和进行战争的战略等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勇于创新地提出并解决了苏联战略学和战役学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现在仍然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虽然现在的条件和情况比起作者当时所经历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M·H·图哈切夫斯基的两卷集中收集了他关于未来战争的性质和战略，关于红军建设的主要著作，以及他有关训练和教育部队、有关部队训练方法的某些著作。

在这里无法对两卷集中所有著作都给予评论，因此我们想着重分析其中几篇著作。

这部著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篇，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

奇根据列宁的委托就使用军事专家和选拔共产党员指挥人员问题所做的报告。报告中分析了旧军队的军官层，谈到了利用旧军官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军队的可能性，提出了组建共产党员指挥干部队伍的设想和干部的任免晋升等程序。

1919年底发表的《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一文，旨在反对不承认国内战争经验具有军事学术价值的人物。文中极巧妙地揭示了国内战争的特点和阶级战略的实质。这是一篇以革命阶级立场在军事理论方面了解俄国国内战争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中的原则观点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1923年发表的《一场娃娃战争》一文中批判了妄图仅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军的思想。作者指出，为了达到战争的经济和政治目的，首先必须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文中提出一个理论：仅靠一次"精神上"打击，甚至一次突击都是无法彻底消灭敌人的，彻底消灭敌人要进行一系列毁灭性战役。

《向维斯瓦河进军》这篇著作是作者1923年2月7日——10日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补充学习班上所做报告的速记稿。众所周知，这篇文章一问世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军界都引起了很大争论，从而使读者更进一步正确理解1920年波兰战局。

在《组织战略》（1924年）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有关军队备战和战略任务的相互关系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否定事先能预见战争性质和对付整个战争战略的可能性。由于战争进程中条件和情况的变化，作者认为只有在战争第一阶段才能明确地确立战争的性质和战略。

《战役的工程计量》（1920年），《论防御》（1923年）

和《高级统帅部的问题》（1924年）等文章，作为在战略方面合理发展的一组文章阐明了准备和实施战役的问题。

1924年出版的《机动和炮兵》著作在两卷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文中提出了当时在军事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发展苏联炮兵的最迫切的课题。

在1926年写的《现代战略问题》一文中，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在战争进程中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变更战略的思想。他做了一个尝试，设想到二十年代中期苏联军事当局可能提出的苏联战略原则和国家备战的某些课题。该文中的新论点是否定了革命前俄国军事理论所固有的那种抽象探讨战略问题的态度，作者试图给战略问题奠定一个物质基础。

《战争是武装斗争的一个课题》一文，是给1927——1928年苏联大百科全书写的词条。作者阐述了他对战争性质和进行战争等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设想。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要求全国政治思想和经济力量总动员。

《新的训练任务》一文发表于1929年，引人注目的是：它实际上是红军在恢复时期战斗训练的总结，要求苏军干部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队技术装备可能取得显著进展情况而制定的1929年新版防战条令调整这个训练。该文中所阐述的某些原理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在给Г·德里布留克的《现代政治史范畴内的军事学术史》一书写的序言里，图哈切夫斯基以马列主义立场深刻分析了这部历史著作。在不抹杀该书的学术价值的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严厉批判了德里布留克的方法论基础和军事学说的错误。

M·H·图哈切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还揭露了斯维钦和维

尔霍夫斯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严重影响，在军事理论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新的战争问题》手稿存于档案之中，1962年才问世。它只是作者原拟书写巨著的很小一部分。在该文中，图哈切夫斯基想全面地探讨新出现的武装斗争兵器对过去战役战斗样式的影响，国家技术成就和工业成长对武器和军队发展前景的影响等复杂课题。

该文明显地反映了作者大胆和殷切希望发展苏军军事技术和苏联军事学术的意向。这个期望在今天，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同时，又不断改善武器，军事技术装备和出现崭新斗争兵器的时代是极其现实的。作者坚决要求与基于过去战争经验的固有观念大胆决裂；并且根据对国内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所做的深刻而真实的学术评价提出崭新的理论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客观上必将促使军事学术、部队组织机构和训练的原有样式发生变化。

这位苏联统帅给福勒的《改革战争》一书和毛利斯的《战略学》一书俄语本所写的前言是很引人注目的。这两部著作都是阐述战略问题和技术兵器在英军应用的问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以高度的党的立场揭露了《改革战争》和《战略学》作者的帝国主义和憎恨人类的哲学实质。比如，福勒主张为镇压殖民地各国人民推行化学战争的思想是一钱不值的。

图哈切夫斯基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真实本质，而且大胆地揭示了其它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的弱点。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清晰地说明，福勒那种放弃人的因素和过分强调坦克和飞机的作用的立场是何等的软弱无力；而另一

方面，毛利斯又轻视技术兵器的作用又何等的保守。顺便说一说，后者反映大不列颠参谋总部的官方观点。

但是，苏联统帅透过福勒那种不切实际的论点和毛利斯那种格外愚蠢的态度总算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过去（现在也是如此）所追求的主要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准备反苏战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号召苏联人民和他的战士常备不懈。

保存在档案中的手稿《作战艺术》和《论指挥形式的发展》，是作者1934年和1935年根据1929年野战条令和尔后的部队训练经验写成的。这两篇文章阐述了部队实际掌握纵深战斗理论和在纵深战斗中如何运用不同兵种的最重要课题。除掉上边我们已经谈到的问题以外，作者关于调整红军指挥人员战斗训练的论述也是引人注目的。对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作者都从历史发展的沿革上加以详尽地阐述。在这方面不仅看到正确思考已发生变革的根源，而且也看到正确判断苏联军事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在1934年写的《边境战役性质》一文中，作者指出："关于沿通往边境的铁路线大量集结军队和以大量军队进行边境交战的陈腐观念早已不适应现实条件和当今战争的手段。"考虑到航空兵、坦克兵和空降兵的发展，图哈切夫斯基预见到边境战区的致命弱点，为在边境地带和向边境集结大量军队动员遭受破坏的可能性。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不应像以往战争那样以军队主力实施边境交战，应以驻扎在边境地带的部队实施。他认为动员和集结主力的陈旧公式已经过时，应该彻底改变。

他写了一篇全面论述《工农红军36年新版野战条令》的

文章。这本条令一直用到伟大卫国战争爆发。虽然当时认为它已经过时并提出用1941年重新制订的条令草案取代它。草案中考虑了：1936年以来红军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变革；西班牙战争与远东日本人的冲突；1939——1940年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军队的军事行动等经验。

在这篇文章中，M·H·图哈切夫斯基根据积极进攻作战的思想方法——纵深战斗理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1936年的野战条令。因为纵深战斗理论已正式合法化并首次反映在这本条令之中。

这篇文章中格外重视：战士——人的因素和训练部队掌握高度灵活性，训练指挥人员机智果断行事和勇敢作战。这种提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技术蓬勃发展和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下有些指挥员表现出同我们精神格格不入的，即过分崇拜技术兵器的情绪。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不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31年至1937年写的《新的战争问题》、《边境战役的性质》和《论新版工农红军野战条令》三篇文章反映了图哈切夫斯基对战争、战役和战斗性质的最新观点。这些观点对澄清我们战前在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十分有益。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全面探对了新兵器对实施战斗行动方法的影响。根据当时的技术成就，他得出一个结论：未来战争将具有广泛机动性质，其速度和规模将要扩大。

在1935年写的《当今德国的作战》一文中，图哈切夫斯基强调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特殊危险。早在1936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前五年，他就提出要注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和他们进行的反苏战争准备。

只要粗浅地浏览一下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为发展苏联军事科学付出了多少艰辛劳动。将他列入我军军事学术创始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列宁读过他的第一篇学术著作《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读后亲手在该文上签字："列宁存书"。图哈切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和另一本书《阶级的战争》至今仍保存在列宁的个人图书馆中。

有120多篇关于战略、战役法、战术，教育和训练部队等各种问题的文章都出自图哈切夫斯基的手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据当时的技术成就，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提炼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理论原则。这些原理反映了20—3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的先进观点。

应该指出，M·H·图哈切夫斯基在领导军事学术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是工农红军司令部，工农红军监察总部联合军事学术协会主席，是国防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战争和革命》杂志的编委，是倡导和主持编纂《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发起人，直接参加《国内战争史(1918—1921)》的编纂工作；根据他的倡议，1925年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内组建了一个战争经验研究运用部。

苏联元帅M·H·图哈切夫斯基发表的著作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这点是勿庸置疑的。这些著作能帮助我们将校级军官更充分地运用党在组建苏联军队和在教育训练部队方面最宝贵的经验，从而促使我们完成巩固我苏维埃国家国防的任务。

但是，必须注意到，从图哈切夫斯基撰写这些军事理论著作时代至今，已经流逝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内，无论是我军，还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军队在发展军事方面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带来了重大影响。当前，由于新型兵器的出现在对未来战争性质的看法上产生深刻变化。因此，M·H·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在他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原则自然过时了。但同时也应承认他有些论述，特别是有关部队和司令部训练方法问题；有关指挥问题；有关新式兵器对部队组织编制和斗争方式方法的影响问题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使很多军队读者今天读起来仍受教益和启迪。

苏联元帅M·H·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活动，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结出了累累硕果。他在组织保卫苏维埃国家和巩固加强陆海军威力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M·H·图哈切夫斯基，从其多方面的贡献来看，是我军在发展苏联军事理论和建设我武装力量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领导者之一。这位著名苏联统帅所发表的这些学术著作，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

附件2

图哈切夫斯基和作曲家
德·肖斯塔科维奇

在有极大权力的人物中真诚喜爱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军中伟大的统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有创见的战略家，因此，人们都喜欢称他为"红色拿破仑"。

肖斯塔科维奇说："我们相识时，我才十八岁，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我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并不是年龄，而是地位。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已是红军高级指挥官，而我只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然而我表现得很有主见，不卑躬屈节，而图哈切夫斯基喜欢这样的人。我们交上了朋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这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交朋友，可是这友谊悲惨地被拆散了。图哈切夫斯基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有见识的人物。当然，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荣誉。他二十五岁就指挥一个集团军，二十七岁当上了司令员。他好象是命运的宠儿。他有声望、荣誉和高级军衔，直到1937年为止。"

图哈切夫斯基乐于引人注意。他知道他很漂亮。他总是穿得很华丽。肖斯塔科维奇喜欢他这一点，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穿得好。肖斯塔科维奇多少有些羡慕他的另一特点—垮不了的体质。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多病的青年，而图哈

切夫斯基却能把一个人放在椅子上，再把椅子举起来－包括它的坐客－用伸直的一只手臂握住一条椅腿。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处有一间健身房，里面有双杠和单杠。

图哈切夫斯基的某些著名军事行动，例如，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并不总是使肖斯塔科维奇欣喜若狂，可是肖斯塔科维奇常亲眼看到人们歌颂他的战功。在他周围，谄媚者太多。但肖斯塔科维奇保持着沉默。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胸怀大志、处事严谨的人。在这些特征方面，他象弗塞维洛德·梅耶霍尔德（先锋派剧院院长，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和赞助人；1939年，他作了一次主张艺术自由化的演讲后被捕，再也没有见到他）。

梅耶霍尔德喜欢军装，常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他为“光荣的红军战士”这个可敬的称号感到自豪。他特别喜欢大炮、勋章、战鼓以及一切军用的东西。那是梅耶霍尔德的弱点。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欢艺术。梅耶霍尔德穿起军服来显得有些傻气，但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图哈切夫斯基拉起小提琴时同样显得有些傻气，但使很多人陶醉（我们在和无害的虚荣心打交道）。

梅耶霍尔德也拉小提琴。图哈切夫斯基还以巨大的热情制作小提琴。他们都在可怕的死亡前不久想起小提琴。当然，那仅是一种巧合，生命的一个残酷的恶作剧。梅耶霍尔德，在等待逮捕时，后悔他没有成为一名小提琴家。他带着辛酸和恐惧说：“我现在要是能坐在某个乐队里，拉我的小提琴，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当时他六十五岁。图哈切夫斯基四十四岁，在被捕前说的几乎相同：“我多么希望象一个孩子那样学小提琴啊！爸爸没给我买过小提琴，他没

钱。我要是个小提琴家，情况就会好些”。

这种巧合使肖斯塔科维奇感到惊讶和恐怖。一位有声望的剧院院长和一位著名的军事领袖—突然都希望变得渺小，不受人注意的人物。这位大师和这位元帅甚至愿意和任何人，甚至和影院门前令人取笑的醉汉交换身份。但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乐于充当艺术赞助人。他喜欢发现“有才能的年轻人”，并帮助他们，也许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个军事神童，也许因为他喜欢显示他巨大的权力。

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图哈切夫斯基就要肖斯塔科维奇为他演奏自己的作品。他称赞某些作品，批评另一些作品。他常常要肖斯塔科维奇重复演奏—假若音乐使你心烦，那是个折磨。据此图哈切夫斯基大概真的喜欢他的作品。有时候肖斯塔科维奇想，假若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被斯大林下令枪杀，他的一生会变得怎么样呢？可能各方面都会不一样。可是，让我们丢掉幻想吧。

当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让他们用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折磨他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事先什么也不知道。他象其他人一样，是从一篇臭名昭著的报纸文章中知道这件事的。

1936年1月28日，肖斯塔科维奇到阿尔汉格尔火车站去买最新的《真理报》(肖斯塔科维奇当时正在作巡回演出)。他打开报纸，翻过一页—发现一篇文章：《混乱而非音乐》。肖斯塔科维奇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它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刊登在《真理报》第三页上的那篇文章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它没有署名，象一篇社论—那就是说，它表

达了党的观点。然而，实际上它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那分量要重得多。

有一种学派认为那篇文章是出名的冒牌货沙斯拉夫斯基（《真理报》的一名记者）写的。也可能不是沙斯拉夫斯基写的，因为语法太不通了。这篇文章出现在大清洗之前，那时毕竟还有些会写文章的人在《真理报》工作；他们不会在著名的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那一部分留下毫不相干的"交响乐的发声"一类说法。那些故弄玄虚的"交响乐的发声"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领袖就是这么说的。

《麦克白夫人》被赶下了舞台。组织会议把《混乱》灌进每个人的脑袋。人人都避开肖斯塔科维奇。那篇文章中有一个警句，说这一切"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他们都在等待这严重后果的来临。它象一场恶梦似的继续着。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朋友，斯大林认识的，认为他也许能帮一点忙，就不顾一切给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坚持说肖斯塔科维奇毕竟不是一个丧失了灵魂的人，除了那部受到光荣的机关报《真理报》以充分的理由作了批判的恶劣的歌剧外，肖斯塔科维奇还写过几首赞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音乐作品。

于是，斯大林光临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舞剧《清澈的溪水》在大剧院的演出。洛鲁霍夫已经在列宁格勒演出过这部作品，在那里它是受欢迎的。他应邀又把它搬上莫斯科的舞台。领袖和导师的文化活动的结果揭晓了—《真理报》在刊登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不到十天，又登了第二篇。它写得好一些，点缀的珍珠少一些，但并不使肖斯塔科维奇更高兴一些。

十天之内，在《真理报》上，受到了两篇社论的攻击—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如今，别人都确定肖斯塔科维奇就要

完蛋了。对那著名事件的预期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从那时起，肖斯塔科维奇被贴上"人民敌人"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不用他来解释。他被悄悄地、却又公开地称为人民敌人。有一张报纸作了如下报道："今天演出人民敌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

肖斯塔科维奇被召到莫斯科去表演挨批。他不得不向全世界宣告他作了自我批判。他全完了。这是个大灾难，它抹掉了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

肖斯塔科维奇能向谁请教呢？他去找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他的前途看来是灿烂的；几个月前，他当上了苏联元帅。他最近成功地访问了巴黎和伦敦（他代表苏联政府参加英皇乔治五世的葬礼）。

《真理报》每今都有关于他的报道。而肖斯塔科维奇却是个"麻风病患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图哈切夫斯基却同意见他。他们把自己锁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办公室里，挂断了电话。他们默默地坐着，随后，开始低声交谈。肖斯塔科维奇说得很轻，因为他的忧伤和绝望使他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图哈切夫斯基说得很轻，因为他害怕密探的耳朵。

图哈切夫斯基了解斯大林远胜于肖斯塔科维奇。他知道斯大林追人要穷追到底。在那些日子里，看来灾难是要落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了。图哈切夫斯基答应尽他所能地去做。他说得很谨慎，肖斯塔科维奇看到当谈话转到斯大林时，他在克制自己。但是他能做什么呢？说服斯大林别这么干了？斯大林毕竟没有请教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的雄心仍然是个谜。他想过要当个独裁者吗？干吗不想呢？现在肖斯塔科维奇思索着。但他怀疑在那

种环境里它会有实现的可能性。如今，众所周知，图哈切夫斯基是被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联合行动所毁灭的。但决不应夸张德国间谍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即使没有那些"揭露"图哈切夫斯基的假证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是要把他干掉的。德国人只是为斯大林所利用罢了。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军事方面的建议经常激怒斯大林，然而决定批准那个建议的恰恰又是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耍点手段。他和他的副手会同时出现在斯大林面前。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建议，而他的副手"纠正"他，这样做总是使斯大林很高兴。斯大林补充并发展这种"纠正"。他喜欢图哈切夫斯基是错的这样一个事实。最后建议被采纳了。但不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想法而是斯大林的。这又是一个说明斯大林想法来源的奇妙的例子。

他们有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斯大林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斯大林比他更聪明。那是胡说。……

图哈切夫斯基是孤独的。他没有朋友，只有奉承者及多情的远征的战友。图哈切夫斯基受到"老骑兵"布琼尼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非难，因为他坚持下一次战争将以坦克和军用飞机取胜。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但当过骑兵的那些人听不进去。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轻易地骑马飞奔巴黎和伦敦。

图哈切夫斯基，他论述在作战中应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意义，这对他们如同芒刺在背。斯大林和这些骑兵交谈比较容易，他们敬仰他。举例说，伏罗希洛夫虽然有不少不愉快的事情，但活下来了。当然，斯大林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开始说伏罗希洛夫是个英国间谍，但他记不得他说的是什么

了。于是伏罗希洛夫还是幸存下来了。

伏罗希洛夫喜爱合唱。他自己也唱，也许因此他觉得他是个音乐专家。他渴望给作曲家和演奏家提宝贵意见。乌克兰民歌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他常用微弱的男高音唱那些歌。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他，在一次接见后自己如何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一起唱歌。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谦恭地跟着领袖们一起唱。空中飘荡着可怕的不谐和音。斯大林当指挥，……当然，他们都唱醉了。

显然，在军事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纯粹是个门外汉，但他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听到许多这方面的事。图哈切夫斯基当然知道和肖斯塔科维奇谈论军事是愚蠢的，但他情不自禁。他们经常相会，而且常常一道出去。图哈切夫斯基喜欢开车到乡下去。他们离开车子，走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可以比较放心地自由交谈。

图哈切夫斯基要当艺术赞助人，但他头脑里转着的却是军事。肖斯塔科维奇喜欢他，又不喜欢他。喜欢他，因为他谈的是他熟悉的题目。肖斯塔科维奇对外行不感兴趣；他发现专家更富于同情。但图哈切夫斯基的专业是可怕的。他的职业无视死者。图哈切夫斯基竭力使之成功，他对军事的热情使肖斯塔科维奇反感。

由于从制服上可以立即认出他，他常穿便服进城。他的衣服总是裁得很得体。图哈切夫斯基喜欢看电影。他可以在为高干专设的电影室看电影。但他宁愿穿上便服，不带警卫，独自到普通影院去。他觉得这样更有意思。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到一家剧院去，看到钢琴演奏者是他原先的音乐老师，军校学员团的欧丹柯。老人的处境很可

怜。图哈切夫斯基决心帮助他，他走上前去作自我介绍。他说他想再跟他学习，年轻时学的课程很好，所以他至今还忘不了。

当然，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跟他的老师上课，但这位老人确实得到一笔相当多的钱。图哈切夫斯基预付了一年的学费，他要用一种亲切的、不带侮辱性的方法帮助老人。他喜欢显得亲切。

有一次肖斯塔科维奇和图哈切夫斯基去隐士住处，去看画。图哈切夫斯基当然是穿的便服。起先他们在博物馆周围漫步；后来，他们跟随一群有讲解员的人。这个讲解员是个年轻人，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图哈切夫斯基开始纠正他。他为讲解员作补充，应当承认，他正说到了点子上。

人们不再留神听讲解员，而只留神听图哈切夫斯基了。最后讲解员生气了。他不愿意和图哈切夫斯基说话。他走到肖斯塔科维奇跟前问他，“那是谁？”肖斯塔科维奇眼睛也没眨，立刻回答说：“图哈切夫斯基。”这象是晴天霹雳，起初讲解员不信，后来他仔细一看，当然认出是他。图哈切夫斯基的表情极为丰富。这位讲解员自然吓呆了；他为他的职业担心，怕他的孩子们要挨饿，假若图哈切夫斯基下一道命令，或者只是埋怨一声，他们就会解雇他了。

讲解员的愤慨变成了恐惧。他开始感谢图哈切夫斯基提供的宝贵材料。图哈切夫斯基慈祥地回答说：“学习，青年人，学习，永远不会太晚的。”说着，他们就向出口走去。图哈切夫斯基对这次经历感到高兴。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的警卫员发现有一个人完全喝醉了，坐在他的车子里。为了某种原因，他正试图拆卸门把。

这些门把是镀镍的，很亮。好吧，警卫员打算把这位公民带到“他该去的地方”。

图哈切夫斯基命令他们放走醉汉，让他去睡觉以便醒酒。原来他是作曲家阿森尼·格拉德科夫斯基，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著名的作曲家。他有一部相当成功的歌剧，经过长期间歇后，当时正在重演。由于它牵涉到一个军事问题(1919年的彼得堡防御战)，格拉德科夫斯基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有兴趣听听它。在请帖上，他感谢图哈切夫斯基没有送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图哈切夫斯基看了这部歌剧，但不太喜欢它。后来他沉思地对肖斯塔科维奇说，“可能我错放了他”。当然，他这是开玩笑。

在战争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常想到图哈切夫斯基。1941年7月在列宁格勒挖战壕时，他想到他。他们把肖斯塔科维奇送到福雷里医院那边，分成组，给他们每人一把铁锹。他们是音乐学院组，音乐家们显得很可怜，干得很糟糕。当然，人人都很努力。但是，他们算是什么挖沟人？这一切早都该做好了。时间应该早得多，干得也更在行。那就会更有效果。在防御方面，早些时候所做的那一点点，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干的。

当图哈切夫斯基坚持要增加飞机和坦克的数量时，斯大林称他为“浮躁的策划者”。但战时，在起初的惨败之后，斯大林理解了。在火箭问题上也是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时就开始搞火箭技术。斯大林后来把所有的火箭专家都枪决了，然后别人又不得不从零开始。

肖斯塔科维奇想知道谁在拉图哈切夫斯基制作的小提琴，假若它们还幸存的话。肖斯塔科维奇感觉到它们散发的

音响是哀婉动人的。肖斯塔科维奇在生活中很不幸，但有人比他更不幸。

…………

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悲伤和新的破坏，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忘掉战前那些可怕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从第四开始，是关于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事实上肖斯塔科维奇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不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它是关于斯大林所破坏的、希特勒仅仅毁掉的列宁格勒。

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都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许多朋友碰上了这种事。到哪里去为梅耶霍尔德或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不可能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肖斯塔科维奇把他的音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

…………

附件3

苏联检察机关通告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先后逮捕的M·H·图哈切夫斯基、N·Э·亚基尔、N·Π·乌博列维奇、A·N·科尔克、P·Π·艾德曼、Б·M·费尔德曼、B·M·普里马科夫和B·K·普特纳一案，已侦查完毕并提交法院审判。

上列人犯犯有破坏军人职责(誓词)、背叛祖国、背叛苏联人民、背叛工农红军的罪行。

侦查材料确认，被告等和自杀身亡的戈马尔尼克，同某个奉行不友好的对苏政策的外国军事领导部门保持着反对国家的关系。被告等为这个国家军事情报机关服务，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军事部门提供有关红军状况的情报材料，从事削弱红军威力的破坏活动，妄图在苏联一旦遭到军事进攻时造成红军失败，以便帮助在苏联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所有被告面对提出的公诉，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

本案将于今天，6月11日，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秘密开庭审理。特别审判庭由庭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法官B·B·乌里利赫同志，陪审员国防人民副委员、工农红军空军部长、二级集团军级Я·N·阿尔克斯尼斯同志，苏联元帅C·M·布琼尼同志，苏联元帅B·K·布留赫尔同志，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Б·M·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N·Π·别洛夫同志，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Π·E·德

边科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H·Д·卡希林同志，以斯大林命名的第六哥萨克骑兵军军长、师级E·И·戈利亚切夫同志等组成。

本案审理将依据1934年12月1日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原载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

于大娟译

附件4

苏联最高法院通告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依据1934年12月1日法律规定的程序，于昨天(本年6月11日)秘密开庭审理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Э·亚基尔、И·П·乌博列维奇、А·И·科尔克、Р·П·艾德曼、Б·М·费尔德曼、В·М·普里马科夫和В·К·普特纳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条16款、第58条8款、第58条11款一案。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由下列人员组成：庭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法官В·В·乌里利赫同志，陪审员国防人民副委员、工农红军空军部长、二级集团军级Я·И·阿尔克斯尼斯同志，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同志，苏联元帅В·К·布留赫尔同志，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Б·М·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И·П·别洛夫同志，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П·Е·德边科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Н·Д卡希林同志，以及以斯大林命名的第六哥萨克骑兵军军长、师级Е·И·戈利亚切夫同志。

在回答庭长乌里利赫同志根据宣读起诉意见提问，被告面对提出的公诉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所有被告对所犯罪行全部供认不讳。

法庭确认，上列被告为某个奉行不友好的对苏政策的外国的军事情报机关服务，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军事部门提供情

报，进行破坏活动，以削弱工农红军的威力，妄图在苏联一旦遭到军事进攻时造成红军的失败，以便帮助实现分裂苏联和在苏联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认为所有被告——M·H·图哈切夫斯基、Ц·Э·亚基尔、Ц·П·乌博列维奇、Λ·Ц·科尔克、P·П·艾德曼、Б·M·费尔德曼、B·M·普里马科夫和B·K·普特纳，犯有破坏军人职责(誓词)、背叛工农红军、背叛祖国罪行，并判决如下：剥夺所有被告的军衔及被告图哈切夫斯基的苏联元帅军衔，对所有被告处以极刑——枪决。

(原载1937年6月12日«真理报»)

于大娟译

附件5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9号命令

工农红军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同志们！

本年6月1日到14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在政府成员参加下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我作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破获一个叛卖性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的报告，这个组织在红军中长期从事秘密活动，进行卑鄙的、破坏性的暗害和谍报活动。

6月11日，这些不耻于人类的间谍叛徒集团的主要背叛分子和头目，已被送交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受审。送交法庭受审的有：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Э·亚基尔、И·П·乌博列维奇、А·Ц·科尔克、Р·П·艾德曼、Б·М·费尔德曼、В·М·普里马科夫和В·К·普特纳。

最高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处死人民的敌人！对背叛军人宣誓、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军队的背叛分子的处决只能而且必须如此。

全体红军当听到法院对叛徒应予的判决，当听到这个公正的判决得到执行时，都感到如释重负。如此卑鄙地欺骗自己的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可耻叛徒被消灭了。

苏联法庭已经不止一次地使被揭露出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集团分子、特务分子、间谍和暗杀者受到了

应得的惩处。这些人是在凶残的法西斯分子、工农事业的叛徒托洛茨基的指挥之下，为了外国情报机关给的几个钱而从事叛卖活动的。最高法院还适时地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业塔科夫、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匪徒和其他人，作出了无情的判决。

但是现在看来，在反革命阴谋家、间谍和特务分子的名单上还不止当时已经判罪的那些罪犯。他们中还有许多人伪装成老实人，逍遥法外，继续从事肮脏的叛卖活动。

包括在这些直到最近尚未被揭露出来的背叛分子中的，就有隐藏在红军中的间谍和阴谋家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前国防人民副委员戈马尔尼克是个叛徒和胆小鬼，由于害怕交付苏联人民法庭受审已自杀身亡。

前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前军区司令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前院长科尔克、前军区副司令普里马科夫、前干部部长费尔德曼、前驻英陆军武官普特纳和前航空化学后援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艾德曼，所有这些人全部都属于高级领导干部，在我军担任很高的职务，受到政府和党的信任。他们全都是变节分子、间谍和祖国的叛徒。他们无耻地践踏苏联宪法。

这个集团的最终目的，是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消灭我国的苏维埃制度，推翻工农政府，在苏联恢复地主资本家的专制统治。

法西斯阴谋家们为了达到这个背叛性目的，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他们准备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中进行一切可能的破坏活动，妄图破坏红军的威力，使之在未来战争中遭受失败。

他们以党员和工农红军首长的崇高头衔作掩护，向苏联的敌人出卖我国的军事秘密，破坏红军的威力，千方百计以加速外部敌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进攻。

他们妄想以自己的叛卖活动，以直接的叛变和对前线的技术、物资供应和作战指挥进行破坏，以此在发生战争时造成红军的失败和推翻苏维埃政府。他们指望得到他们的主子——某个外国的法西斯军事集团的帮助，为此他们准备奉送出苏维埃的乌克兰，肢解我们的国家。

这些叛徒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可能从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那里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大搞欺骗活动，害怕人民和红军战士识破他们的真面目。

这些人民的敌人被当场抓获，他们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供认自己从事叛卖、破坏和谍报活动。

同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总参谋部保持直接联系的组织者、领导人和间谍，已经被揭露，并受到苏联司法机关理所当然的惩罚。

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权忠实可靠的支柱，他无情地揭穿自己健康肌体上的脓疮，并正在迅速地加以清除。敌人失算了。他们等不到红军的失败。红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战胜的。世界法西斯这一次也承认，它的忠实代理人戈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之流，以及其他叛徒和资产阶级走狗，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他们将遭到咒骂和被遗忘。

同志们！

红军现在和将来都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胜利了的人民血肉相连。我们正在消除自己队伍中的法西斯间谍这

类坏蛋，今后也决不容许再发生这一类可耻的事情。消除我军的败类，会使我军变得更加强大。军队由于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垢正进一步得到巩固。

红军必须，也定将拥有忠诚不渝、效忠工人、农民事业的真正自己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

红军全体人员，从战士到高级首长，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统一、强大、完整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我们这支优秀军队的行列里，现在和将来任何时候都将没有变节分子、背叛军人宣誓和背叛祖国者的容身之地。

同志们，我们要百倍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提高和大力改进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加强自我批评，迅速彻底消除人民敌人破坏活动造成的后果。

打倒叛徒法西斯分子！
处死间谍和变节分子！
我们光荣的工农红军万岁！
我们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万岁！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K·伏罗希洛夫

（原载1937年6月13日《真理报》）
于大娟译

附件6

图哈切夫斯基生平活动年表

1893.2.16　生于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县亚历山德罗夫斯科耶庄园。

1904.　图哈切夫斯基一家迁居至奔萨省弗拉日科耶庄园。

1909.　迁居莫斯科。

1911.　由普通中学转入第1莫斯科武备中学。

1912—1914　就读于亚历山大军官学校。

1914.7.14　获少尉军衔，开始在谢苗诺夫禁卫团里服役。

1914.9.　随该团开赴前线。

1914.9—1915　期间，因作战勇敢、无畏先后荣获六枚军功章。

1915.2.19　被俘。

1916.　因多次企图越狱被押进英戈尔城堡第9号牢房里。

1917.8.10　越狱成功，返回俄国。

1917.12.　被选为谢苗诺夫团的连长。

1918.4.5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1918.5.27　西屏护军莫斯科防区政治委员。

1918.6.19　派往东方面军。

1918.6.26　任命为第1集团军司令。

1918.7.4　和俄共(布)辛比尔斯克省委主席И·M·瓦烈吉斯一道在共和国里首次动员旧军官加入红军。

1918.7.11　穆拉维约夫逮捕M.H.图哈切夫斯基。平定穆拉维约夫叛乱。加伊指挥的辛吉烈耶夫集群突围成功，向辛比尔斯克首次发起进攻。

1918.8.25—9.11　进行辛比尔斯克战役。

1918.9.12 攻占辛比尔斯克。

1918.9.9—10.2 进行梅列克斯战役和塞兹兰战役。

1918.10.3 攻占塞兹兰。

1918.10.7 攻占萨马拉。

1918.11.28 攻占别列别伊。

1918.12.28 任命南方面军司令助理。

1919.1.20 任命南方面军第8集团军司令。

1919.3.23 任命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司令。

1919.4.28—5.3 开始布古鲁斯兰战役。

1919.5.4 攻占布古鲁斯兰。

1919.5.9—5.12 进行布古利马战役。

1919.5.13 攻占布古利马。

1919.5.25—6.19 进行乌弗姆战役。

1919.6.25—7.12 进行兹拉托乌斯特战役。

1919.7.13 攻占兹拉托乌斯特。

1919.7.19—7.29 进行车里雅宾斯克战役。

1919.8.7 授予M·H·图哈切夫斯基红旗勋章。

1919.11.4 攻占奥姆斯克。

1619.12.2 授予第5集团军红旗勋章。

1919.12.22 任命M·H·图哈切夫斯基为南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司令。

1919.12.28 授予荣誉金质武器。

1920.1.31 任命为高加索军区代司令。

1920.2.16—3.27 进行北高加索战役。

1920.4.29 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

1920.5.22 M·H·图哈切夫斯基被列入具有高深军事教养人物的行列：“转入总部名人录”。

1920.7 进行伊古缅—明斯克战役。

1920.7.23—8.14 进行华沙战役。

1921.2.2 在保留西方面军司令职务的情况下，任命为高等军事教学委员会委员。

1921.3.5 在保留西方面军职务的情况下临时担任第7集团军司令。

1921.3.8 第1次强攻喀琅施塔得。

1921.3.17 第2次强攻并占领喀琅施塔得。

1921.4 在保留西方面军司令职务的情况下担任坦波夫省军区司令。

1921.4—5 粉碎安东诺夫匪帮。

1921.8.5 担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

1922.1.24 担任西方面军司令。

1922—1923 当选为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4.4.1 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

1924.5.27 兼任海军人民委员部劳动定额委员会委员。

1925.2.17 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部军区司令。

1925.11.13 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

1926. 《现代战略问题》一书出版。

1927.1.29 兼任海军人民委员部鉴定委员会委员。

1927.12 就工农红军改装问题致函斯大林。

1928.5.5 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1929—1930 建筑卡累利筑垒地域。进行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一书出版。编辑《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三卷。

1931.6.19 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军械部部长。着手撰写《战争中新课题》一书。

1933.2.21 荣获列宁勋章。

1933.11.7 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受阅部队。

1934.2 在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34.6.21　担任苏联副国防民人委员。

1935.11.20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命令，授予M·H·图哈切夫斯基苏联元帅最高军衔。

1936.1.15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作有关国防的报告。

1936.2　赴英法访问。

1936.4.9　担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兼任重新组建的工农红军军训部部长。

1937.5.11　解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担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

1937.5.26　开除工农红军队伍。被逮捕。

1937.6.11　被以叛国罪处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名帅之死——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内幕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